

编 者 说 明

这本文集是李剑白同志在担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我省经济建设实际问题的部分论文，个别篇章是离开社会科学院以后撰写的。

剑白同志参加革命后，曾从事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在担任我省和哈尔滨市党政领导职务期间，在继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注重结合我省经济建设的实际，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

一九七九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剑白同志在担任省委书记的同时，兼任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党的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转移，理论界面临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艰巨任务。为此，他提出创办院刊《学习与探索》，号召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为振兴黑龙江经济，撰写文章；同时，他身体力行，撰写了大量的论文。

在这些论文中，体现出一个老党员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厚的理论根基和理论联系实际治学精神。为撰写这些论文，剑白同志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及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理论，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亲身参加科研实践，深入调查研究，大胆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省的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及我

省的经济建设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因此，剑白同志的这些论文，在当时为繁荣被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搞得荒芜、凋落的北疆理论论坛，奉献了一篇篇力作。今天，重读这些论文，虽然有当时历史的局限，难免带有一些历史痕迹，但很多见解却仍有新鲜之感。仔细品味还不时为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我省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现代化建设、科学技术、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设想、建议及灼见所折服。因此，把这些论文编辑出版，对于我们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于我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了解省情及农业、贸易、科技等工作是有一定借鉴和指导作用的。我们也能从中学到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发微的严谨的治学精神。

本书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城市经济、农业经济、贸易经济、人口与劳动经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几个部分，每个部分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黑龙江省经济学会第一次经济理论座谈会纪要》，主要是根据剑白同志的发言整理的。座谈会在推动我省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把《纪要》作为本书的附录收入。

本书收录的论文和讲话，基本按发表的原样排印，有的篇章作了一些删节和订正。

编者

1985年9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经济理论

- 论物价的稳定和调整…………… (1)
- 物价与产品成本及企业盈利…………… (12)
- 论比例和计划…………… (28)
- 论计划与实施…………… (44)
- 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探讨…………… (57)
- 深入实际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69)
- 关于经济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82)
- 价值规律与价格改革…………… (91)

第二部分 城市经济

- 加强城市经济研究充分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 (104)
- 以现代化观念认清哈尔滨的战略地位…………… (118)

第三部分 农业经济

- 关于海伦县农业现代化试点情况…………… (124)
- 从海伦基地县的实践谈如何搞农业现代化…………… (133)
- 农业现代化要从良性循环上搞突破…………… (145)
- 系统工程与农业现代化…………… (156)

第四部分 贸易经济

- 深入开展商业经济理论研究…………… (172)
- 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学术研究…………… (186)

第五部分 人口与劳动经济

- 加强劳动保护、搞好安全生产…………… (204)
- 努力开创劳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214)

加强职工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	(231)
认真贯彻十二大精神 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	(236)

第六部分 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

重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45)
充分发挥科技咨询服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49)
发挥科协组织的作用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258)
加强科技情报工作 为经济发展服务.....	(266)

附 录

黑龙江省经济学会第一次经济理论座谈会纪要.....	(278)
---------------------------	---------

第一部分 经济理论

论物价的稳定和调整

为了调整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央已经做出决定，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降低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还要适当提高生铁、煤炭等原材料、燃料的出厂价格，并且要保持市场物价稳定，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当前，调整物价和稳定物价正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要调？能不能稳？调和稳是什么关系？人们各有所见，也并非无所忧，本文准备就这些问题，谈些看法。

(一)

什么是物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人们劳动的生产物采取了商品的形态，商品的价值采取了货币的形态。所以，所谓物价，也就是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马克思提出：“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罢了。”^①然而，价值本身并不直接表现为价格，而是经由一定的过程转化为价格的。马克思说：“只要仔细看看这种价值的货币表现，亦即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他们就会发现这里谈的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6页。

一个过程，而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经由这个过程获得独立的和一致的形式，换句话说，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经由这个过程表现为同一的社会劳动量。”（同上）在价值向价格转化的过程中，由于竞争、供求关系、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及其价值的变化，以及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国家的政治形势等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而使得价格经常背离价值，和价值不一致。所以，价格这个经济范畴，比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更具体、更鲜明地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各种社会经济的结构的特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通过价格机构在流通过程中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利用抬高物价的形式，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侵吞工人的必要劳动。他们利用抬高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和原材料、初级产品价格的形式，来掠夺农民小生产者和落后国家、地区的人民。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在高物价、高房租、高税收的压抑下拼命挣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医治的痼疾。

解放前的旧中国，广大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受着物价不稳之苦。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更象脱缰野马，恶性上涨，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人民在盼望解放的同时，也盼望着过物价稳定的生活。

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了稳定物价的方针，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很快就制止了物价恶性上涨，彻底结束了旧中国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历史。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物价，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当作稳定物价的前提和出发点。我们实行了“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的物价管理体制，强调物价大权在中央。我们用较充足的物资稳定了货

币，每发行一元人民币，有七、八元物资做保障。我们是低工资政策，人民收入并不多，多年来提高工资的范围和幅度又不大，但是，由于物价比较稳定，人民高兴。近十多年，尽管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但我们坚持了稳定物价的方针，还是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而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没有受到更大的损害。

(二)

稳定物价是我国物价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需要稳定物价，我们也能够稳定物价，这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保持物价稳定，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合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加强经济核算；有利于我们的国民经济搞好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有利于我们的国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如果物价严重不稳，人民的生活就不安定，积极性就要受到影响。经济形势不安定，也要影响到政治形势不安定。现在，我们正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保证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顺利转移，保持物价的稳定就更为必要。我们不是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吗？我们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物价上的表现，就应该是坚持稳定物价的方针。这合乎国情，顺应民心，在这一点上不能动摇。

当然，对稳定物价的方针不能做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不能理解为所有商品的价格长期固定不变或物价长期冻结。绝对固定不变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物价也不会有绝对的稳定，绝对的稳定也不好。我们所说的稳定物价是相对的稳定，即在一定时期内，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价格和社会全部商品零售价格的整体，没有较大幅度的涨落，相

对地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这里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价格水平，包括用于衣、食、住、行方面的主要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行业、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的稳定；一是社会全部零售商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对稳定物价，只能做这样的理解。如果从所有种类商品的价格的长期趋势来说，物价就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变动的，是需要调整的。但这并不排除在一定时期物价应稳定在一定水平上。

我们的物价是在旧中国的物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价格和比价关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各种商品的价值及其相互间的比价关系也就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要在物价上得到反映。所以，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还要对物价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适当地调整，这也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决定物价的除了社会必要劳动量外，还有许多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为了贯彻具体物价政策的需要，对某些商品的价格有时也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以发挥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消费的调节作用。

我们调整物价，是根据客观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经主管部门严格审查批准，按计划规定的范围和幅度进行的。对物价调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涨价，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它包括调高和调低两个方面，也就是把有些低得不合理的适当提上去，把有些高得不合理的逐步降下来。我们调整物价，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关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由于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还存在着整体利益同局部利益、这一部分人民的利益同另一部分人民的利益的非对抗性矛盾，当调整物价影响到某一局部或某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时，国家要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补救，如允许某些生

产、经营单位有政策性亏损，给某些行业、企业或消费者以一定的补贴等。这些情况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都是存在的。

我们既要坚持稳定物价的方针，又要对物价进行调整，那么，物价的稳定和调整是什么关系呢？两者是不是矛盾呢？物价的稳定和调整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不应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我们所说的物价稳定，是建立在对各种不合理的价格进行合理调整的基础上的稳定，如果对极不合理的价格不做必要调整，就不利于保持整个物价的稳定，必要的合理的调整，会为稳定物价奠定更加巩固的基础。我们所说的物价调整，是在保持市场物价总水平和基本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基础上的调整，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有利于对各种不合理的价格做合理的必要的调整，而任何调整都不应对整个市场物价水平造成突出影响。这里我们说的是在一定时期之内的物价的稳定和调整的关系，至于较大范围、较大规模的调整，以至物价体系和制度的改革，则应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同国民经济其它方面的改革，如工商管理体制改革、工资改革，同时进行，不宜匆忙。这种调整和改革，也不是否定稳定物价的方针，而是使价格的稳定建立在更加坚实合理的基础之上。

现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还存在着两种价格：一种是计划价格，一种是非计划价格。由国家各级物价部门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是我国物价的主体，起主导作用。非计划价格，包括议购议销价格和集市贸易价格，是从属的，要受计划价格的制约。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计划价格，关于议购议销价格和集市贸易价格问题，不属本文范围，留待以后再谈。

(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合理价格和比价关系，在稳定物价前提下，进行过多次调整，取得了相应的成绩。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祸害，极大地阻碍和破坏了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当前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在物价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就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来说，剪刀差还是偏大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和扩大趋势是相当严重的。“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①建国以来，经过多次调整，这种剪刀差已逐步缩小。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十多年来，剪刀差仍然偏大，甚至有所扩大。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品价格偏高，尤其是农用工业品质次价高，影响了农民和生产队的收入，农民生活得不到改善，集体生产单位无力扩大再生产，这是我国农业长期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工业内部，在原材料、燃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某些基本原材料和燃料的价格偏低，某些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偏高。这有好的一面，有利于加工工业的发展，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于某些原材料、燃料工业的发展，造成二者发展脱节，不相协调。在农业内部，也存在着粮食和某些农副产品之间，以及某些农副产品相互之间的不合理比价关系。这些不合理的价格和比价关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极不适应的，如不加以调整，势必影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对这些不合理的价格和比价关系做必要的合理调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前提，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中央已经做出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8页。

定：要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要以粮价为中心安排好农业内部各类产品的比价关系；要适当提高生铁、煤炭等原材料、燃料的出厂价格；并且要保持市场物价稳定。这是一项符合客观经济实际，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重大经济措施和政策措施。

提高农副产品购价和一部分原材料、燃料的出厂价格，会引起销价以及与其有关的其它一系列产品价格的连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物价能不能稳住？有一种意见主张，既然农副产品的购买价格和某些原材料、燃料的出厂价格提高了，相应地这些农副产品的销价，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销价，受到某些工业原材料、燃料提价影响的工业品的销价也要提高。因之，职工的工资也应随之提高，“水涨船高”，大家都涨，合乎规律。这种看法，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讲可能比较符合价值规律与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但由于当前国力、财力所限，工资问题涉及面又太复杂，不容易行得通，很可能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因此，多数同志觉得太冒险，应该力求稳定，慎重行事。而且这种作法也不利于调整原料产业与加工业比价上的不合理，水涨船高，比价等于不调。

当前的市场物价，不仅应该保持稳定，也是能够保持稳定的。三中全会指出：“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的补贴。”为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各级有关部门已经做出了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主要是：（1）粮食（包括食油）销价一律不动。由此产生的亏损，由财政按定额直接拨款补给经营单位。（2）群众生活

必需的其他农副产品（包括居民生活用煤）的市场销售价格，也要坚决保持稳定。因提高购价而造成的政策性亏损，由财政部门核定政策性亏损指标，拨款弥补。某些必须提价的，在工资没有调整之前，要给消费者以适当补贴。（5）因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和某些原材料、燃料价格而影响工业产品成本增加，造成工厂亏损的，主要通过工厂开展增产节约加以解决。其中必须调整出厂价的，要区别不同情况：属于工商总的有利润的产品，通过调整工商利润解决；工商总的亏损的产品并且应该减税免税的，按照国家规定减税免税解决；不应减免税的，由财政部门给工业或商业部门亏损补贴。总之，是坚决稳住产品的市场销价，保持不动。（4）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次要消费品，必须提高市场销售价格的，要搞好综合平衡，有升必须有降，并作到降大于升。这几条落实好了，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价格和社会全部零售商品价格总体，基本就稳定在一个水平上，从而使城市职工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证。

（四）

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社会主义企业所生产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包括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劳动者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商品价值的这三个部分表现在货币形态上，就转化为价格构成的四项要素：即生产成本、流通费用、利润和税金。生产成本包括了商品价值里面的前两个部分。流通费用实际是发生在流通过程中的成本。劳动者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价格形态里分解为利润和税金两个部分。在现实经济过程中，生产成本又具体划为固定资产折旧，原材

料和燃料动力消耗，工资和工资附加、管理费用等各项成本要素。利润和税金又进一步分解为工业利润、商业利润和工业税金、商业税金等项。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某些原材料、燃料出厂价格提高，影响到以这些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商品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整价格构成的几个要素之间的数量比例，仍可维持商品的价格不变。如前所述，国家对一些原材料涨价影响的产品，正是用调整利润和减免税金等办法，来维持其销价不动的。这实质也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积累来维持零售商品价格的稳定，同时也就是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也正是价格做为国民收入再分配杠杆的作用之所在。

通过对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的构成要素的分析，我们还看到，虽然做为成本的一部分的原材料的价格提高了，但可以通过合理的节约使用这些原材料，减少物资消耗、降低单耗、提高成品率、降低废品率的办法，即充分发挥其使用价值和效能办法，来弥补这种提高对单位产品成本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工时和机器设备，节约管理费用，在同样的时间里用同样的机器设备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即降低产品成本中的固定资产折旧、工资和工资附加、管理费用等部分。总之，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产品成本就越低。这样，由于原材料提价而使成本增高的部分，会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得到部分的或全部的抵消。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使成本降低的部分，超过了原材料提价使成本增高的部分，还会增加企业的盈利。

为此，就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经营管理，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充分发挥现有机器设备的效能，合

理使用原料材，努力增产，厉行节约，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只是当前稳定物价的重要保证，而且由于社会产品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会为将来物价的进一步稳定和合理调整，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五)

近期以来，随着国家对部分物价进行计划调整，以及物价纪律的松弛，有些地方刮起了一股“涨价风”，自行提价，变相涨价，使消费者受到损失，引起人民群众的正当不满。此风一度甚盛，甚至被认为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浪头不小”、“涨风大，稳风差”，弄得人心不安，影响很坏。现在，各地物价部门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进行了物价大检查，大整顿，重申物价政策，严明物价纪律，坚决煞住这股不正之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当这股涨价风受到抵制和被制止的时候，也有人拿出“理论根据”来进行辩解。我们有必要对所谓的“理论根据”做一点分析。

“这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哪一条规律呢？据说是价值规律。说是既然原材料的价格提高了，成本的价格就一定得提高。我们说，你的这个“理论根据”是不对的。价值规律在我们这里是在社会主义诸经济规律的整个体系中，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以及按劳分配的规律等，共同起作用的。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考虑到所有这些规律的需求，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不能脱离开这些规律，甚至违背这些规律，孤立地谈价值规律的作用。即使只就价值规律来说，也得不出原材料价格提高，成品的价格一定要涨的结论。对事物要做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生前曾经盛誉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着眼点主要是强调要学会算帐，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果。如果

认为原材料价格提高，成品价格就一定要同比例随之提高，那只能是对价值规律的十分庸俗的理解。

“这是为了扭亏增盈”。某些企业长期亏损，确属事实；这些企业扭亏增盈，也实为必要。造成企业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国家允许的政策性亏损，更多是经营管理不善。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防止企业用政策性亏损去掩盖经营性亏损，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于自己也不光彩，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改善经营管理，努力增产，厉行节约，降低成本。试问，你用提价或变相提价的办法来扭亏增盈，可谓走了捷径，“立竿见影”，但这究竟是扭亏增盈还是转嫁亏损呢？

“这是为了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据说，不提价收入就要减少，得到的基金、分成就少，职工的奖金和福利就少，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错，职工的生活福利问题要关心，物质利益原则要贯彻，但不能为此而忘掉了另一个原则，即维护公共的大众的利益的原则；不能为本单位少数人的利益去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原材料提价造成企业收入减少影响到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或因其它原因造成的各行各业之间收入的不平衡，从而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不平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过程中逐步解决，不应靠提价来解决，只靠提价也解决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物价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范围以内的大问题，受法律的保障。稳定市场物价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关系到全党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关系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广大城乡人民生活的改

善。因此，必须把合理地调整价格同哄抬物价严格区别开来。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以价格的调整为前提的，各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价格的变动是合乎经济规律的现象。但这和不靠增产节约而是单纯涨价来坑害消费者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的是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调整价格，要制止的是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涨价风”。

原载1979年147期《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物价与产品成本及企业盈利

本文拟就物价和价值规律、成本、盈利等有关理论与实际问题，做一些探索。

(一)

物价是由什么决定的？具有什么样的规律性？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经济理论问题。中国历史上，在两千多年前就曾发生过许行和孟轲的著名论战。许行主张“市贾（价）不贰，国中无伪”。孟轲则主张“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见《孟子·滕文公上》）但他们都提不出“市贾（价）不贰”或“物之不齐”的科学根据来。各种商品的价格，由于许多极端复杂情况的影响而高低不同，时涨时落，不断变动，因而使人们觉得价格是由纯粹的偶然的情况决定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2页）这个首要任务是马克思完成的，他

找出了这个规律。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它的高低涨落固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归根结底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受价值规律支配的。“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资本论》第三卷第198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从而决定商品的价格，是不以商品生产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过程的客观必然性。

“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资本论》第一卷第92页）

商品的价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价格的变动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供不应求，价格就要上涨到价值以上；供过于求，价格就会跌落到价值以下。随着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动，商品的价格总是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不断地围绕着价值上下摆动。这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价值规律做为商品生产的最基本的规律，从开始出现商品交换时起，已经在长达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时期内起着支配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人们可以通过自觉活动有计划地安排和调整物价。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是否仍然存在，仍然在物价的确定上起支配作用呢？由于林彪、“四人帮”假社会主义理论的干扰以及我们一些供给制、平均主义分配措施实施时间较长，并受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造成一些假象，仿佛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不是商品经济，仿佛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截然对立的两种经济形式，因而对价值规律和商品价格等问题产生了许多误解。其实，社会主义社会实

行计划经济，但它又是商品经济形式的社会，“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14页）。事实上，从我们的计划经济中把商品生产和它的价值规律排除是不行的。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成本、价格和盈亏。我们的生产要核算，我们的分配要计价，我们的交换要按等价原则，违背不得。违背了就要受惩罚。想从计划经济中排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徒劳的。计划经济并不排斥商品经济，它应该而且也可以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价值规律仍然存在，仍然在物价的调定上起支配作用。

在私有制商品生产情况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的价格通过无政府状态的竞争，不断地接近它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人们在制订和调整计划价格时，一定要考虑这个规律的作用，按照这个规律办事。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受客观规律的惩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批评苏联物价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时曾经说过：“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在价格政策问题方面还存在一些紊乱现象。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经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植棉者的谷物的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的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感到惊异，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而一吨谷物的价

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总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话来。因此，中央只得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降低谷价，提高棉价。假如这些同志们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那我们就会使植棉者破产，就会没有棉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15—16页）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时，也曾说过：有一个时期，在农业内部的比价关系上“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6页）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物价的本质及其高低涨落变化的，归根到底仍然是价值规律。我们必须按照它的要求办事。

我们强调要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制订价格，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价格政策要使价格和价值绝对一致，这是不可能的。国家在规定产品的价格时，除了价值规律以外还要考虑到许多复杂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要使价格和它所反映的价值大体一致；同时我们还可以有计划地通过价格与价值的一定范围内的不一致来对生产进行调节，表明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需要奖励生产的提价，需要限制生产的减价。我们还可以通过价格的高低来调节流通，平衡供求，指导消费。在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和消费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生产供应能力充足有余的商品，适当降低售价，可以鼓励购买；对一时供应不足的商品适当调高售价，可以限制需求。某些滞销商品，价格一调低，销路就打开了。东西少的时候，价格贵一点，供应和需求的平衡也就

保持住了。我们还可以通过价格与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背离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相互关系。上述这种在一定范围内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也是我们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是按价值规律要求办事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决定商品的价值。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每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在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的范围内，和商品的价值是一致的。“农民和卖东西给他的人本身都是劳动者，交换的物品也是他们各人自己的产品。他们在生产这些产品时耗费了什么呢？劳动，并且只是劳动。他们为补偿工具，为生产和加工原料而花费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资本论》第三卷第1016页）通过交换“每个人必须大体上收回成本。”（同上，第1017页）只是在生产者的个别劳动耗费和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不一致的情况下，他的生产费用才和商品的社会价值不相符合。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做为商品生产者的是资本家，商品的价值和资本家的生产费用便不一致了。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包括不变资本耗费、可变资本耗费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表现为成本价格和利润这样的转化形态。这是因为，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部分，耗费的是工人的无酬劳动，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只有不变资本耗费和可变资本耗费，才是资本家的耗费。所以“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

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资本论》第三卷第30页）这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便被掩盖起来，而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剩余价值部分，则表现为全部预付资本通过商品售卖带来的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资本论》第三卷第44页）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商品经济形式的社会，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构成，仍然要表现为产品成本和企业盈利这样的转化形态。不能把价格、成本和盈利等价值形式看成只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实际上它们是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所共有的经济范畴，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但又具有着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具有着和资本主义不同的质的和量的规定性。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包括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劳动者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三个部分。新创造的价值所以还要分化为二个部分，是因为除了通过按劳分配直接满足劳动者自己的需要外，社会还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积累和满足集体的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性的需要。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基层组织，又是共同占有公有化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集体单位。企业要通过价值形式进行经济核算。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区分，必须在企业的收入分配中体现出来，这就使得商品价值的前两部分即补偿价值部分，取得了产品成本这样的独立形态。而全部劳动耗费形成的价值和产品成本之间的差额，即是劳动者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部分，就表现为企业的盈利。

在资本主义社会，成本价格是资本家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消耗，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些范畴所体现的都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资本家总是在牺牲劳动者的情况下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积累资本，加深和扩大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是积累起来的公共财产，支出活劳动的是摆脱了剥削的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6页）社会主义的企业盈利是劳动者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产品的货币表现，它被用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和增进人民生活福利。“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一书的评论》第40页）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成本和企业盈利这些范畴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绝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这些范畴和资本主义的有关范畴混同起来。如果看不到两种社会制度下这些范畴的本质上的差别，那显然是错误的。同样，如果认为资本主义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就不能有，也是错误的。林彪、“四人帮”借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大搞极左，极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本核算和企业盈利，显然更是错误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成本价格和利润，如同商品的价格一样，是在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激烈的竞争自发地形成的。这是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

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而保留了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商品生产，并赋之以社会主义的内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范畴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计划形态，它们以计划价格、计划成本、计划利润的形态出现并作用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生活之中，这是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正是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这种计划形态，由于它所反映的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所以又必须具有适应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些计划形态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要由实践来检验。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统一，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以计划形态出现和起作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显著特征。

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中，价格、成本、盈利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态。这些具体形态，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使得它们在物价的调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组织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杠杆。

(三)

“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资本论》第一卷第52页)为使计划价格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反映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我们在制订和调整价格时，就要以正常合理经营条件下的部门平均先进成本为基础。这种平均先进成本，在一般情况下，大体相当于全行业的中等成

本。这样，中等水平的企业就能正常地补偿自己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获得合理的利润；消耗少，个别成本低的先进企业于补偿消耗之后能获得较多的盈利；而消耗多，个别成本高的后进企业获得的盈利就较少，或可能使生产费用支出得不到全部补偿，出现亏本经营。所以，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以平均先进成本为基础调定价格，既能保证实现大多数企业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的合理补偿，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又能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促使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果，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

加强成本管理，搞好成本核算，是稳定物价的重要措施和物价管理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物价才有条件稳定。如果某种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还可以降低这种产品的价格。在价格维持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产品成本的降低意味着企业盈利的增加。

加强成本的管理和核算，重要的一条是核实成本。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费用是多种多样的。这许多费用，哪些应计入产品成本，哪些不应计入产品成本，哪些是成本费用，哪些不是成本费用，是有严格的明确的界限的。马克思指出：商品的成本价格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账簿上的项目，而是一个现实的经济范畴，“这个价值部分的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中，会经常发生实际的影响，因为这个价值部分会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地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耗费的各种生产要素。”（《资本论》第三卷第33页）可见，成本是补偿价值。只有构成产品实体的原材料消耗；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有助于产品形成的辅助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固定资产折旧，工资和工资附加；以及同产品的

生产销售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才能计入成本，属于成本费用。当前，一些部门和企业，超越补偿价值的范围，把许多非成本因素挤入成本，以致成本不实，削弱经济核算，使计划价格的制订失去科学根据，这一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认真对待，切实解决。

根据成本构成的各项因素，社会主义企业降低产品成本的途径，在生产力合理布局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下，主要是：（一）节约、合理使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用同样的消耗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以降低单位产品的消耗数额。当前，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譬如全国机械工业重点企业的钢材利用率，去年为百分之六十五点八，如果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即可节约钢材近五十万吨。全国冶金、电力等八个行业四百多个重点企业的燃料、电力消耗指标，如果全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就可节约各种燃料一百万吨、电力一百二十亿度，^①这都可极大的降低成本。在这方面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是否先进合理，对节约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降低产品成本有决定性的影响。设计上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设计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节约必须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有实际意义的。否则便只能是以次顶好，危害消费者。（二）充分利用厂房、机器、设备，降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折旧费用。厂房、机器、设备等是企业的固定资产，企业的折旧提成是根据固定资产的价值按一定的比率计算的。提高了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就会降低单位产品中的折旧费用，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为此，就要合理利用厂房面积和加快机器运转、合理组织生产，加强技术保养，减少机器设备的检修时间和停歇时间，提高完好率、开工率和工作效率。当前，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在增加新的先进生产设备的同时，特别要搞好

现有生产设备的挖潜、革新、改造，使同等的生产设备，发挥更大的效率。（三）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中的工资份额。资本家用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日和提高劳动强度等加重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节约可变资本支出；我们不能那样做，而只能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用同等数量的活劳动耗费，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减少单位产品成本中的工资份额。这就要求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同时尽量采用适合实际需要的先进生产技术和 管理技术，改进生产组织和管理方法。现在，我们正在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我们自己也日益以更多的先进机器设备武装各个行业，认真学习和掌握这些先进技术，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四）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效率，改进运销工作的方法，缩减企业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从而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中这些费用的份额。当前，切实加强和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杜绝损失浪费，加快资金周转，认真解决资金、物资的呆滞和积压问题，对降低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要尽快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掉的定额管理制度，使企业的料、工、费各项消耗，都有先进的技术经济定额可循。定额管理是成本管理的基础，平均先进成本必须建立在平均先进的技术经济定额的基础上。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单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资本论》第一卷第 579 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 计划经济，使得社会主义不只在单个企业，而且有可能就全社会国民经济的整体，来考虑和安排降低产品的成本。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做不到的。当前，调整被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解决许多企业开工不足和原材料、燃料、动

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就具有从全社会范围考虑和安排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意义。改革管理体制、实行专业化协作，改变目前许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经济效率很低的情况，也会使各个企业和整个社会的成本大大降低。在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某些生产能力超过实际需要的行业里，实行择优排产，保证优质高产低耗的企业任务饱满，供应充足，而把那些劣质低产高耗的企业关停并转，也是从整个国民经济角度考虑和安排的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措施。生产单位提高产品的质量，有助于使用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生产单位生产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的质量提高了，使用单位就能利用它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从而降低单位产品中生产资料的消耗，降低成本。在这方面，保证产品的品种规格对路，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成本是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综合性指标，降低成本不只对稳定物价、增加盈利有重要作用，而且企业各项经济活动和管理工作的好坏，最终都会在产品成本中表现出来。所以，不断降低成本是社会主义企业全体工作人员的经常的重要任务。当前，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运动，搞好增产节约，努力降低成本，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计划价格是由产品成本和企业盈利两个部分组成的。我们制订的计划价格，一定要反映成本，保证能补偿成本。“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

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资本论》第三卷第45—46页）所以，计划价格的最低界限应不低于该一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保证企业的成本消耗，“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在这个基础上，正确规定企业盈利及其各种具体形态的合理数额和比率，是制订计划价格中较为关键的一环。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提出资金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工资利润率等不同计算基础来确定产品价格，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产值利润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在税金方面，关于税种和税率，也多有探讨，本文不拟涉及这些问题。我们要说的只是，计划价格的制订，应以在一般情况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在同等的经营管理条件下获得大体相同水平的利润，较为合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些部门和行业的所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放在平等的水平上，使他们的收入确实反映出企业的经营好坏，使他们在经济收益上对国家尽同等的义务，本身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相互间的关系，加强经济核算，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充分调动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性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的计划价格要反映社会平均先进成本，并保证企业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订得过高，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就可以在补偿成本之后多得利润，而以这种产品为生产资料的企业就要增加成本支出，少得利润，甚或补偿不了成本，发生亏损。反之，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订得过低，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就要少得利润，甚至补偿不了成本，发生亏损，而以这种产品为生产资料的企业则于补偿成本之后可多得利润。这种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引起的利润过多过少和成本过高过低以至成本补偿能否全部实现的情况，都不反映各该企业经营效果的好坏。在其产品为最后

产品即消费资料的情况下，价格的高低还会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程度，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这种情况也不利于经济核算，利润过高的企业，会由于利润得来的容易，就有可能积压和浪费资金，不注意精打细算；而那些利润很少甚至亏损的企业，则会在经营管理、资金周转和再生产的进行上发生困难，同时会由于它们的经营成果得不到正确反映而影响积极性。所以，保持一个稳定的能够反映各类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耗费和合理利润的价格水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上述这种情况，当前在我国物价领域内，确是存在着的，有的还比较严重。这是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价格体系，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解放初期，又照搬了国外一些不尽正确的东西。我们虽然对这些不合理价格做过多次调整，但仍有待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同时，由于生产和销售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产品价值的变化，需要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在价格上得到反映；一种新产品的出现，对其价值的计算未必准确，对其比价关系的考虑未必周到。这些情况，也造成了我们物价的某些不合理。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极大地干扰破坏了我们的物价工作，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在物价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当前，对不合理的价格做必要的调整，已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前提和组成部分。现在，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主要是长期过于偏低的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生铁、煤炭等重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做必要的调整。同时，为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采取了切实的措施。这必将促进这些产品生产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

应该指出，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我们制订的计划价格，要和价值大体一致，同时，对价值规律的正确运用，

也包括利用价格与价值的一定范围的背离来调节生产、流通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所以，有时我们又必须使某些产品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其价值。价格高，则企业利大，价格低，则企业利小。还应该指出，企业盈利的大小，也不只取决于价格的高低，还取决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即企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在同等经营管理水平上，企业所处的自然资源条件优越，较之其它企业会得到级差收益；企业因国家给的投资多、设备好、生产条件优越，也会比其它企业多得盈利。在以上几种情况里，企业盈利的多少，都不反映其本身经营活动效果的好坏。这种盈利上的差别，又不能完全通过价格杠杆的调节来解决，有的还是由于运用价格杠杆对生产、流通和分配的一定调节作用而引起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税收杠杆来起调节作用。出于政策需要而订价高的产品，可用提高税率的办法，将企业过多的盈利上缴国家。出于政策需要而订价低的产品可区别情况，适当降低税率，有的甚至可以免税。企业由于自然资源条件优越和国家给予的生产条件优越而多得的盈利，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的渠道将之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税收作为杠杆，与价格杠杆配合，能调节企业盈利，促使企业保持合理的利润，并使企业间的利润水平大体接近。

当前，在国民经济某些部门、行业、企业之间，利润差别很大。如以一九七八年销售利润率为例：石油利润率为百分之四十，其中大庆为百分之六十九，新疆为百分之四十一，玉门为百分之二十；电力利润率为百分之三十；冶金利润率就很低，鞍钢为百分之三十二，马钢为百分之十六，西钢为负百分之七十九。在钢铁行业中，钢材利润率高，铁矿石、生铁利润率低；纺织行业中，印染利润率高，纺织利润率低。^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营管理水平的

差别，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差别，价格的不合理，也有税制上的问题。没有充分运用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因此，在调节不合理的价格时，也应对税收的不合理之处做适当的调整，使二者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以利于建立基本稳定的合理的价格体系，保证各行各业在同等经营管理条件下，把主观努力取得的经济效果建立在可比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如实地评价每个企业对国家的贡献大小，并为过渡到“自负盈亏，财政自理”，扩大企业财权，创造真正的权、责、利三结合的条件。

国营企业的盈利分解为税金和利润两种形式，有利于保证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和企业经济核算的贯彻，并对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三方面的利益，具有着调节作用。现在国家采取两个办法，通过两条渠道，来提取国营企业的盈利。一是通过税收取得经常收入；一是通过上缴利润，把企业实现的利润再集中到国家财政。这就发生了一定的矛盾。由于税金和利润是成本与价格的差额，在成本、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税大利必小，税小利必大。管税的部门强调税收，管利的部门强调上缴利润。由于税金是“硬性”缴纳的，即或企业亏损，也必须及时纳税上缴预算；同时预算又拨款弥补企业的亏损。如我省一九七八年煤炭亏损四千五百五十八万元，纳税五千二百一十二万元；农机亏损六百零八万元，纳税七百六十四万元；电力亏损二百万元，纳税一百九十二万元。^③这既不利于经济核算和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又虚假地扩大亏损额，无益地增加缴拨款手续。由于上缴利润是“软性”缴纳的，企业财权过小，又要保证必要的开支，就难免“化、挤、冲、摊”。这是一种吃大锅饭的办法。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前提来考虑，应该把这种“二元制”的办法改为“一元制”的办法，即只采用税金一种形

式，不再通过上缴利润的渠道提取国营企业的盈利。制定不同的税种和税率，力求合理。每个税都有特定的意义和作用。纳税后余下的盈利部分即为企业利润，留归企业自己支配。这样，就充分地利用了税收这一经济杠杆，有利于合理地组织国民经济，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解决了上述矛盾。

利润和税金及其各种具体形态的数额和比率的确定，在物价的调定上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同时也具有很大的灵活作用。这次调整不合理价格，为了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我们在切实加强物价管理和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采取了调整工商利润、冲减利润、减免税金、财政补贴、允许购销倒挂等措施。这些措施，有的就是运用了企业盈利的各种具体形态在价格构成上的调节作用，今后仍须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范围内发挥其作用。有的则是我们为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付出的代价，如补贴和倒挂即是。这种代价，我们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妥善解决，以使我们的物价运动更符合客观规律。

① 见余秋里《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② 见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关于企业财政改革说明及工业交通财务司负责人在全国经济核算讨论会上的报告材料。

③ 见黑龙江省工交企业汇总决算资料

原载1979年20期《学习与探索》（内部版）

论比例和计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并且要集中几年时间进行国民

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为此，回顾建国以来的计划工作，探讨比例和计划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实践证明，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形态的共同规律。在不同的社会里，这一规律的实现有着不同的形式。马克思指出：“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①任何社会的存在，都要有衣食住行等方面需要的生活资料产品，也要有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产品，这些产品的需要量是不同的，各种产品之间要有个比例，这就要求社会把自己的总劳动按比例地分配到各种产品的生产上去。具体的比例关系可以改变，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是永远存在的，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而日益加强，特别是在社会化的大生产情况下，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成为维持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进行的必要的基本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分割成各个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私人占有的企业，每个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都为追逐利润而经营生产，社会劳动如何分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整个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盲目的竞争，通过商品价格的

涨落，自发地实现自己的作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不断的动荡、危机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经过比例关系的不断破坏，才能够自发地、强制地、勉强维持着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

但是，就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就一个资本的权力所控制的范围，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又都是必须而且能够加强计划性和组织性的。当前阶段，由于资本集中程度的提高、垄断组织规模的扩大、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运用，使得资本主义的企业内部和垄断组织内部的组织计划性更严密了，而且能够对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行情变化作到有比较准确的估算和预测。为垄断财团服务的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日益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也在编制这样或那样的调节国民经济的计划，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某些目的。这里边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或借鉴之处。但以上所述的任何情况，都没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都没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为攫取高额利润而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都没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排除盲目性，不可能具有排除为资本家谋私利的、真正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比较完备的计划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从根本上消除了生产社会化和产品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就克服了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间的根本利益对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联合成为统一的整体，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具有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而成为社会的经济中心。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有计划地安排社会

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有计划地分配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这种以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需要为目的的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也要求有计划地使各部门、各企业按照适当的比例密切配合，协调发展，以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的人力、财力、物力，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有计划性的经济，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通过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的形式实现的。恩格斯早就指出：

“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②

实行有计划性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会使计划具有规律性，计划就是规律。这是不对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通过计划调节的形式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可能性，也具有着这种必要性，但计划本身并不是规律。规律是客观的。计划是人们制订的，是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主观的东西。这里边就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有计划不一定符合按比例规律的要求。我们的计划再好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总会有不完善的地方。它只能不断地接近客观。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不能完全排除自发性，并不能保证我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特别是当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和公有制还需要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更增加了我们在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方面的艰巨性。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制订的计划，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可能和客观规律比较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的经济计划工作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要求，我们的国民经济就按比例高速度

地向前发展；如果我们在计划的指导思想、体制和方法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问题，不符合甚至违背客观规律的要求，国民经济计划中主观提出的统一的计划和客观的应有的正确的比例就可能出现脱节、矛盾甚至冲突，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使我们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害。

(二)

建国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我们国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虽然我们基本上是学习苏联当时的体制和方法，从事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但是，由于我们注意实事求是，注意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平衡，全面安排生产和生活、生产和建设、积累和消费，强调搞好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和外汇平衡。“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③所以，计划安排大体上是符合客观的比例关系的。同时，一些小型建设项目和次要产品的生产都未列入国家计划，而是在计划指导下通过市场去调节。这样，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协调的发展，生产迅速平稳地增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脱离了客观实际。在计划安排上，一再提高指标，把本来安排在一个时期才实现的任务硬要在一年、二年内完成。这时，还把“以钢为纲”的口号绝对化，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工业计划，都是“以钢为纲”来安排，即先确定出一个钢铁生产的高指标，一年之内“翻番”，然后推算出其它的指标，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家都向钢看齐，提高指标。为

保证这些高指标，基本建设战线就不得不拉长。由于指标高、战线长，物资供应满足不了生产和建设的需要，确定计划时就只给任务，不给或少给原材料，叫“留缺口”。这种“高指标，战线长，留缺口”的计划的理论根据，就是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简单地套用在经济建设上，否认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有的相对平衡，以为“留缺口”的计划就是积极平衡，会调动短线部门的积极性去赶上长线，否则就是机械平衡、消极平衡。同时，把那些强调客观规律，主张实事求是的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当时甚至有的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还批判所谓什么“唯条件论”，否定条件，不要条件，片面地强调人的思想，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结果，就产生了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在这时，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利用了我们的失误，大造反动舆论，否定综合平衡和商品货币关系，抓住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鼓吹反动的平均主义，刮起“共产风”。结果，彻底破坏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人民生活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困难。而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又加重了这种困难。

面对严重的形势，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地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个方针和指导思想，大力压缩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重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了一批建设项目和重工业企业，加强了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支援，精简职工，使一大批劳动力重返农业第一线。同时，纠正了“共产风”，比较注意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经过大幅度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得到了恢复，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平衡，从而扭转了经济困难局势，一九六三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并继之以稳步的增长。

遗憾的是，我们在实践上并没有始终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当国民经济刚刚好转起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那些正确的经济方针与政策加以否定，以致被林彪和“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等人所利用，变本加厉地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极左路线。他们以高举为名，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搞到了形而上学绝对化的顶点，极端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无视客观规律，以致国民经济名为有计划，实则是处于半计划以至无计划状态，使得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其间虽然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进行过抵制、纠正，但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根本扭转那种局面。

粉碎“四人帮”以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能短时间内消除干净的。我们对于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当前，国民经济中比例失调的现象还很严重，这主要表现为“两长三短”，即基本建设战线长，加工工业战线长，而农业、轻纺工业和原材料、燃料、动力工业则处于短线，落后于实际需要。其实质是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积累率偏高，消费不足。我们基本建设同时进行的项目过多，规模过大，大大超过了我国物力财力的现实条件和可能，许多工程长年形不成新的生产能力，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有待于利用一段时间进行认真的调整。

(三)

总结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我们制订的计划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的比例关系规律的要求时，国民经济就协调平稳地高速度发展。当计划不符合或是违背客观规律时，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甚至严重比例失调，物资奇缺，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为了使我们的计划符合客观比例规律，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就必须切实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如列宁所说“经常的、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①

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主要任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把国民经济做为一个整体，不只就某一产品、某一部门、某一地区，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分析考虑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符合客观实际的安排，以期能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为要搞好综合平衡，使我们的计划符合按比例规律，就必须从当前的实际条件出发。要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具体任务和现实的经济条件，从当前进行的社会生产中最合适的比例关系，合理地分配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期既保证简单再生产，又促进更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这就既要看到需要，也要看到可能；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左”倾冒进，把计划放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高速度只能产生于国民经济这架巨大机组的和谐运转之中，离开了合乎客观实际的国民经济的正确比例关系，就不可能有高速度。要扩大再生产必须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即上一年度的社会产品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以后能提供出若干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的余额。这个余额是有一定数量的。这个数量是客观的。我们的扩大再生产指标，特别是基本建设指标，是受这个数量制约的。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找出合乎当前实际条件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最优比例关系，但不能脱离现实，不顾甚至破坏必要的比例关系去追求高速度，那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高速度。更不能压缩人民群众的消费，牺牲现有机器设备的更新维护，去大搞基本建设。这样做，从长远观点看，不但不能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破坏了，还有什么高速度呢？当前，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形势很好，人们的积极性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提供的急躁冒进，离开实际，违反规律的沉痛教训，应该特别引起注意。党中央强调要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工作，作为向现代化进军的第一个战役。打好这一战役，必将为整个四化建设的高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出发，进行统筹安排。不能单纯以某一种产品的发展要求出发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当然，在安排计划时，根据实际需要、根据客观比例要求，在一定时期，突出某种产品或产品系列，这是允许的。但是，不能脱离实际地把它绝对化长期固定化。过去我们曾经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但是由于绝对化、长期固定不变，结果，不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快，钢铁生产本身也长期徘徊不前。实践证明，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个部门和环节都涉及整个体系。一个部门的生产 and 再生产，要以其他部门相应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条件。一个部门生产和再生产的扩大，又要以其他部门相应的扩大为前提。每个部门的生产规模，增长速度，都处在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积累、消费的相互关系之中。因此，不能脱离实际的绝对的突出某个部

门、某种产品为“重”，来否定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那种不顾现实条件和客观比例关系，指望用突出一种产品的生产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不可能的。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一个从何着手安排计划的问题，按比例要有一个比例中心。这个出发点和中心的选择，应该反映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考虑到社会现实的经济条件，服从计划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最终产品即主要是满足劳动者个人和社会共同需要的消费资料为出发点，将之做为中心，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较为合适的。任何生产都是脱离不开消费的，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消费需要（其中当然包括必要的国防），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从最终产品出发制订计划，那么首先就要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有利于正确处理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从而更好地做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平稳健康地高速度发展。这种方法更符合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

能不能以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做为“高指标、战线长、留缺口”的理论根据，来否定综合平衡呢？不能。国民经济是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中向前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所谓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意思是说，任何旧的平衡都会被突破，要求建立新的平衡；新的平衡也不是静止的，它建立起来后又会被突破，又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而旧的平衡的打破，必须继之以新的平衡的建立。我们的计划工作任务就是在绝对的不平衡中不断地求得相对的平衡。如果不是这样，旧平衡打

破之后不继之以建立新的平衡，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总是处于被破坏不协调的状态下，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呢？关于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讲的很清楚。他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日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⑥在计划平衡上的“左”倾思想不正是这样吗？搞高指标、大计划，故意留“缺口”，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犯了错误，可却还在那里自认为是“积极平衡”呢！积极平衡应该是，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具体任务和现实的经济条件，从当前不断进行的社会生产中找出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最优比例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地高速度的发展。不能把故意破坏平衡，保持和扩大不平衡的计划措施，看做是积极平衡。这种计划措施，只讲需要，不讲可能，破坏生产正常进行所必需的比例关系，不顾客观条件地强不能而为之，连完成计划所必要的物资保证都不具备，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还有何“积极”可言呢？

有人说，如果不按长线进行平衡、制订计划，那就是迁就落后，消极保守，认可被短线拖住后腿，只有按长线平衡才是积极的平衡。我们说，在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由于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总会有长线和短线的不断出现。我们的计划平衡工作该当怎样对待呢？这就是要具体地分析长线、短线各自形成的原因和促使它们向平衡转化的根据和条件。不只分析这种根据和条件的质的方面，还要

分析其量的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综合平衡，既要看到需要，又要看到可能，既要积极，又要可靠。这样，把短线调上去是积极平衡，把过长的长线调下来，也应该被看成是积极平衡（而且实践证明在计划上留有余地创造条件使各单位有超产可能，这是制定计划中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很好办法）。这是因为，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破坏国民经济必要的比例关系的所谓“积极平衡”，只能是“假积极、真消极”。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遇到的严重问题正是在于，有些过长的长线，尤其是基本建设的长线调不下来。三十年的经验完全证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是我国经济不平衡的最重大的原因。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就意味着积累过高，超过实际可能，结果造成不仅影响生活，而且影响简单再生产，这就是客观的惩罚。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彻底解决。这是当前的调整工作能否见效的关键问题，也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加快实现的长时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还有人说，计划上留下的“缺口”会调动积极性，促使“短线”去赶上“长线”，所以是积极的。我们说，剩余劳动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为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积累的各种物质要素又必须具有一定的比例。超越社会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和积累的规模，不顾其各种物质要素的比例关系，在计划上留下的“缺口”，不但不会调动起什么积极性去把它平衡起来，“无中生有”，而且在实际执行中又必然要冲击本来没有“缺口”的那部分，使之出现新的不平衡，乱自己的阵脚，加重比例失调。所以，它只能助长盲目性，和社会主义的计划性背道而驰，那里有什么积极平衡？真正的积极平衡，不是要留“缺口”，而是要留有余地，以应付计划执行过程中由于计划不周和情

况变化出现的不平衡，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在制订计划时要注意留有余地，其意义就在这里。

(四)

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一条规律。在商品生产社会里，人们的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态，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还原为同一的抽象劳动。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⑥所以，在商品经济中，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和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同时存在共同起作用的。它们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面反映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

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联结成为统一整体，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性，使得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通过社会有计划调节的形式实现自己的作用。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和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又具有着各自的经济利益，这又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存在并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起着调节作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经济的计划形态，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和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从而对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和价值规律的调节，是共同存在并互相联系着渗透着起作用的。

剖析我们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计划平衡工作的“左”倾思想，就是忽视和违背了价值规律。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受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的严格限制，对社会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四人帮”竟然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是“异己的力量”，总是要“摆脱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不断地诱使企业和经济部门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样，就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对立起来，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绝对化，忽视和违背价值规律，国家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的过多、过细、过严，有些明明是统不了统不好的，也硬是去统。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果是把经济工作统死了，甚至做茧自缚，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所以，在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中，毫无疑问，首先要搞好计划平衡，通过国家有计划的调节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要求；同时，也必须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以计划平衡为主，辅之以市场平衡，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正确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比较平衡的高速度发展。这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认真探讨，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的问题。从原则上说，我们考虑，一般地应该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些方面。

我们制订的计划价格，要符合商品的价值，反映价值的变化，物适其值，等价交换。计划价格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根据这种价格进行的综合平衡，制订的经济计划，就能够较为正确地反映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如果计划价格脱离实际，通过这种价格进行的综合平衡，

制订的经济计划，就不能真正符合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要求。在我们的计划里，做为实物指标来安排的是商品，而如果价值指标又不符合这种商品的实际价值，那么这种计划当然难以兑现了。

为使计划价格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物价就不应该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应实行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必要调整的方针。并且除主要的重要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外，应允许地方和企业对某些产品及某些产品的一部分为计划价格有一定浮动之权，允许企业之间，购销双方之间协商价格，实行统一价格，浮动价格、协商价格相结合的体制。

商品经济有以区别于它种经济形式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是为交换而生产，通过市场交换满足交易双方的需要，解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实现社会再生产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在商品经济社会，离开了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价值规律也是通过流通过程发挥其对生产的调节作用的。所以，我们的计划管理一定要适应这个特点，做到货畅其流。一切不太注意市场情况，不从交易对方需要出发安排生产，以及人为地限制商品流通的范围，阻碍流通的正常渠道，加多流通环节，延缓流转速度等做法，都必须改变。

既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分配仍然要采取价值的形式，那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就应该利用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关的经济杠杆，诸如价格、利润、工资、奖金、信贷、利息、税收等价值范畴。这些价值范畴，体现着国家，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相互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利用这些范畴作为经济杠杆，规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就会把三者的利益关系结合起来，使企业单位从

本身及其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考虑，沿着国家计划规定的方向来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经济生活都纳入国家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在我们的计划体制里，应该既有国家的直接计划，又有间接的计划。国家的计划指标，对于地方计划和企业计划，有些是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有些则应是可以调整的指导性指标和参考性指标。要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对于间接的计划则主要是利用经济杠杆去促其实现。

价值规律的作用是离不开竞争的（包括评比、检查和劳动竞赛）。竞争是由于人们的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这一关系决定的，商品价值的形成和实现都是商品生产者相互竞争的结果。竞争奖励先进，惩罚落后。所有制不同，竞争的性质也不同，奖励和惩罚的方式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只要我们合理组织，因势利导，妥善安排，竞争对改善经营管理，活跃经济生活，促进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大有好处的；对打破产销脱节，货不对路，一方面产品积压，另一方面产品脱销的局面是大有好处的；对改变价廉物美的商品少，质次价高的东西多，官商作风，“大一统”天下等局面，是大有好处的。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规律。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必须确认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赋予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有的经济权利，这就是决定自己的生产，供销活动的必要的权利，在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必要的权利。目前按“条条”、“块块”的管理方法应该改为主要是各种经济组织和企业单位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国家下达的计划，大多数应当是指导性和参考性的，应同企业进行协商，主要由企业自己决策，凡是企业自己能办的事，尽可能让企业自己去

办。这样，企业单位有必要的机动的余地，其经营成果同本单位和成员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才能够积极主动地按照社会需要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使供产销密切结合，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合理的分配和使用，从而提高经济效果，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①企业的这种自主权，是受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所制约，以服从国家统一计划规定的目标和方向，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为前提，以不逾越做为统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单位为界限。这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单位，至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其本身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其做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的经济权利更应得到充分尊重不予侵犯。

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68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19页
- ③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 ④ 《列宁全集》第三卷561页
-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5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94页
- 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3页

原载1979年24期《学习与探索》（内部版）

论计划与实施

在《论比例和计划》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关系；回顾了建国以来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还就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发表了几点意见。那篇文章，主

要是从制订计划的指导思想、体制和方法方面论述的，意犹未尽。做为它的续篇，本文拟主要从计划的实施，从一年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实施，再做一些探索。

(一)

国民经济计划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斯大林在苏联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曾经说过：“编制计划不过是计划工作的开始。真正的计划领导只是在计划编制以后，在进行了实地检验以后，在实现计划、修订计划和使计划精确的过程中才展开。”（《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301页。）这个论断很有见地，说明了组织计划实施过程的重要性。要想使计划实现其作用，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就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采取有效的措施，要加强检查和监督，并要及时发现问题加以调度解决。这种组织计划实施的过程同计划制订的过程一样，都是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过程。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施计划？过去，我们在制订计划时强调计划的国家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和指令性原则，说这些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原则。在组织实施计划时同样强调国家性、统一性和指令性。我们的计划，主要是依靠国家各级行政领导机构的权威，采用指示、命令、规定、下达任务、督促检查以及表彰惩处等行政方式和行政手段，有时还加上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和手段来实施的，即用行政方法来实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是综合性的经济工作，应该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单纯的行政方法同经济规律的要求不相适应。这种方法容易从政治需要上考虑多，而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考虑少。并且，经济权利、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相互脱节。往往造成上级部门对下发号施令，搞瞎指挥，

硬派任务 脱离实际。下级部门对上则争投资，争物资，争设备；推生产任务，推上交任务，推外调任务。企业在执行计划时，又往往只对上级负责，不对市场负责，不对用户负责，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果，缺少实现计划的内在动力。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既然是经济工作，主要就应该用体现经济规律的经济方法来组织实施，把经济方法和必要的行政方法结合起来。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用经济方法实施计划，也就是要运用商品经济固有的价值范畴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物价、工资、税收、信贷、投资、物资供应等各项经济政策，利用价格、成本、工资、利润、利息、税金、奖金、罚款、补贴等各种经济杠杆，来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调节企业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调动企业和职工实现国家计划的积极性，从经济权利、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的结合上，从国家的整体利益、生产单位的集体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个体利益的结合上，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制订经济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但是，计划的作用范围和计划的精确程度，是受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还不高，远不是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就使得我们的经济，还不能把全社会的生产无所不包地、准确地纳入计划，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预言的，“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19页。）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加以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情况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要把整个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纳入统一的国家计划，用计划去调节，是脱离客观实际条件，根本做不到的。

当年列宁曾经说过：“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473页。）斯大林也曾说过：“轻视计划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是错误的。可是夸大计划原则的作用，以为我们已经达到能够计划一切和调节一切的发展阶段，那就更加错误了。”（《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71页。）这就需要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在实行计划调节的同时，有一种补充的调节机制，以求社会生产更接近于符合客观比例规律的要求。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这就是商品经济固有的市场调节机制。我们必须看到，在我们的经济中，哪些是必须计划、可以计划的，哪些是无须计划、难以计划的，对于主要的、重要的生产和建设实行计划调节的同时，其它部分则通过补充的调节措施，即利用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去进行调节。

国民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众多因素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不断变化的，其中还包括有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这就会使我们按合理比例制订的，本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与客观实际出现差距，出现不平衡的环节，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75页。）这种差距和不平衡的环节，不只来之于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也会来之于计划的实施过程本身。当前我们计划工作中的“三差”——量差、价差、运差，因而造成帐面与实际不一致，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计划安排上是平衡的，但是由于“三差”的结果，实际上就不平衡了。况且，如我在《论计划和比例》一文中已经说过的，“计划本身并不是规律。规律是客观的。计划是人们制订的，是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主观的东西。这里边就

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有计划不一定符合按比例规律的要求。我们的计划再好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总会有不完善的地方。它只能不断地接近客观。”“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制订的计划，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可能和客观规律比较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计划或多或少地不符合实际，与实际有差距，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出现薄弱环节，产生长线和短线，形成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有一种反应和校正这种现象的机制，以便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并据以进行调度，使计划趋向于同实际相一致，符合客观比例，达到平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就提供了这种机制。市场是计划的最灵敏的检验器。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使计划、市场和调节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计划一经付诸实施，即是作用于市场，市场就会发生反馈调节作用，发出信息，把计划同实际的差距反映回来，促使我们根据这些信息，采取措施，进行调度。如运用经济政策和价值系列的杠杆作用，开展增产节约，动用或增加储备，调整进出口，以及部分地甚或全部地修改原计划方案，以不断地求得平衡。这就说明实际上市场在那里起作用，我们的计划是依赖了很大的市场因素才得以实施的。长期以来，虽然强调什么都要搞计划调节，许多还是靠了计划外的因素，即市场因素，所谓“留缺口”、“地方自筹”、“企业自筹”、“计划外工程”等等，不就是要靠市场去调节吗？采购员满天飞，拉关系，走后门，挖墙角，以物易物，显然是市场在调节，只是由于我们不承认市场调节，它就因其非法而以这种非正常的变态或病态，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罢了。这些现象实际上是当计划不周，政策失误，计划措施没有很好地体现和符合按比例规律的要求时，以偶然性形式出现的对计划的被迫的补充，它强迫着我们按客观规律的要求去办。

根据以上对计划实施过程的分析，我们看到，商品经济固有的价值范畴和市场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存在着市场调节，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二)

过去，我们总是依靠行政方法，实行统一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高度集中的单一的计划调节，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既不能把所有企业的产供销完全衔接起来，又不能对市场信息作出灵活的迅速的反应，还不允许企业根据这些信息自行调整。结果是把经济统得很死，企业的产供销往往长期脱节，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得不到平衡，社会财富遭致巨大的浪费。

去年以来，我们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展了市场调节，不只生活资料产品，许多生产资料产品也开始进入市场，这是我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跨出的重要一步，于搞活企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哈尔滨市工业生产情况来看：一九七九年在许多种主要产品国家计划任务调减的情况下，由于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市场调节上作文章，找门路，取得了较上年度增长百分之九点六，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好成绩。这一年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四十九亿三千六百万元，其中属于市场调节的产品产值达八亿二千四百多万元，占全部产值的百分之十六。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部门，市场调节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五十二点九。按国家今年计划初步落实的情况来看，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有百分之十五左右，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

市场调节使企业面临着市场上的择优选购和企业间的竞争，具有着根据市场需要和本身利益安排生产和推销产品的

权利，这就克服了计划高度集中带来的弊病，许多只靠国家计划调节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问题，通过市场调节解决了。市场调节弥补了国家计划任务的不足。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制造厂，是生产配套农具的骨干企业，一九七九年初，计划订货任务不足，全年要减产三分之一。他们面向市场，从农村实际需要出发，增产适销对路产品，仅五吨拖车一项就投产五百台，结果不但没有减产，年末还盈利五万元。市场调节也解决了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不足。集贤县农机厂今年承担省计划产品脱谷机链轮八千个，需要十二毫米炭结中原钢板五吨，在上半年订货会上没有订到货。省物资部门开展市场调节，他们在金属材料公司举办的金属材料专业调度调剂会上如数选购到了这种物资。开展市场调节还校正了计划调节的失误，使那种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货不对路造成积压，而社会上需要的产品又往往供应不足或无人生产的现象，开始得到克服。哈尔滨理发工具厂生产的理发推子，几年来严重滞销。一九七九年初，工厂积压十五万把，商业积压二十万把，上级有关部门仍下达十五万把的生产任务。他们通过市场调查，坚决把理发推子停下来，改产电热梳子和电热钳子，受到了市场欢迎，避免了计划失调。实行市场调节还疏通了流通渠道，使物资紧张与物资积压同时并存的局面正在消除。黑龙江省金属材料公司今春召开大型专业调度调剂会，拿出二百多吨库存物资，供各行各业自由选购，其它企业事业单位也把暂时不用的钢材七千四百吨、有色金属一百二十六吨拿出来，成交总金额六百五十多万元，解决了一些企业的急需，也卸掉了一些企业的包袱。总之，一年来的市场调节，促进了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的实现；促进了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的改组、企业的联合、以及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

推行市场调节，同扩大企业自主权一起，给了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很大的冲击，使体制改革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开始从种种陈规积弊中闯出一条路来，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计划体制在变。按现行体制，计划由国家制订，企业只能执行国家下达的计划。现在，许多企业事实上有了补充计划权，即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制订补充计划。这种补充计划，国家也承认其为企业计划的一部分，并且往往列为国家的正式计划。哈尔滨第二电机厂，年生产能力为二十万瓩，今年按国家计划订货合同只及三十五分之一。他们通过开展市场调节，拿到了二十四万瓩的订货合同，这部分生产，经一机部核准，已确认为部里的计划。物资体制在变。打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框框，也打破物资部门独家统管的局面。实行了生产资料商品化和物资部门企业化。广开流通渠道，把计划分配和自由买卖结合起来，由统购统配一种形式变为统购统配、物资企业选购经销和生产企业自销三种形式。开设了物资展销会和生产资料交易商场，自由购销多余物资、计划外物资和自产自销产品。各地的生产资料服务公司还开展代购、代销、代加工、代托运和调剂业务。商业体制在变。过去一直沿用三大改造时期通过国营商业控制私营工业的办法，实行统购统（包）销制度。这种制度把工业卡得很死，商业也被动。并且，以产定销势必造成产需脱节，生产难于适合社会需要。商业上的再一个严重问题是独家经营、“大一统天下”。这种体制早已感到不适应，统不了还硬是去统。现在开始放手了。以产定销正在改变为商业部门按照市场需要制订采购计划，工业部门按照商业部门的采购计划制订生产计划。统购统（包）销正在发展为统购统（包）销、商业选购、工业自销、代购代销、议购议销等多种形

式。集体商业、个体商贩、农工商联合企业、贸易货栈、集市贸易等多种商业组织形式和流通渠道正在得到发展。商业网点增多了。商品流转环节在减少，流向在趋于合理。独家经营的垄断思想和官商作风已有所克服。许多商业部门的同志反映，“形势大好，工作难做”。“形势大好”属实，“工作难做”就要分析难在哪里，过去那种“老独一处”式的工作，确实难以做下去了。我认为这也应该属于“形势大好”之列，因为它意味着旧的一套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挑战，再也维持不下去，新的更好的工作就要应运而生了。其它如财政税务、基本建设、银行信贷等体制，也都在孕育或试验着变革，譬如流动资金实行全额信贷，基本建设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等等。这些虽然只是初步的，实行全面的改革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条件，但却是健康的，有希望的，使人感到高兴，受到鼓舞。

以上分析市场调节的作用没有怎样涉及农业。在我国农业中，集体所有制占着主要地位。运用价值规律，通过经济手段，开展市场调节，对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三中全会以来，农副产品的调价，集市贸易的开放等措施，调动了社队和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出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去年，我省在大旱之年夺得较好收成。现在，主要城镇已经一改多年来猪肉禽蛋限量供应的历史。这方面的材料和论述很多，本文就不多谈了。

过去我们对市场机制的作用重视不够，而存在许多问题，去年以来，强调开展市场调节，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但是，对市场机制的作用估计小了不行，估计太大也不行。东欧有些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由于过多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计划失去必要的控制，而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借鉴。在市场

调节开展起来之后，必须要加强计划指导，搞好综合平衡工作，以使经济生活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当前在市场调节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商品好干、利润高，就一拥而上，许多厂家都去搞，有很大的盲目性，自发性。譬如哈尔滨理发工具厂由于理发推子滞销，改产的电热梳子和电热钳子，成了受市场欢迎的热销货，仅六个月时间，全国就有二十四家厂家上了这种产品，又造成了新的滞销。近一个时期，全国正出现一个生产家用电器“热”，也“热”及了我省。洗衣机，全省有二十家工厂在制造；吹风机，二机局系统便有七家生产；电熨斗，不包括二轻系统也已有六家生产。类似的问题，如绞肉机哈尔滨就有六、七家工厂生产，外地也在大量生产，有些商店摆着几个省生产的绞肉机卖不出去。目前，这种“打乱仗”，盲目发展，以致重复生产，造成浪费的现象，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亟待发挥和加强国家计划调节的作用，并要搞好调查研究和市场预测预报，以指导、协调和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做到综合平衡。

马克思曾经说过：“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68页。）现在我们看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正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经过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终于走出了一条道路；探索到了这种形式。

（三）

我们的计划体制，怎样处理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中长

期计划与年度计划、部门计划与地区计划的关系，这是在进行体制改革时所必须考虑的。

扩大企业的计划权限，把国家计划和企业的计划结合起来。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意味着把全社会经济的计划性同各经济单位活动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国家计划部门的宏观经济决策和基层企业单位的微观经济决策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国家的计划和企业的计划结合起来。去年以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和开展市场调节的实践，已经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认为，这就是要扩大企业的计划权限，赋予企业必要的计划权力，让企业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以及本身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利益，编制计划，报经主管单位备案或审批，即可组织实施。国家应预先把国民经济发展趋势、比例要求和有关的控制数字告诉企业，供企业制订计划时参考；并应按期公布详细的统计资料，便于企业了解经济动向、市场供需情况，随时调整企业的经济活动。国家计划的重点应放在中长期计划上，年度计划在中长期计划控制数字的指导下，以企业计划为基础，进行协调，平衡确定。国家应主要用经济方法，结合必要的行政方法，来组织计划的实施，引导企业实现国家的计划。

搞好远景规划，把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结合起来。从组织计划实施的过程，我们觉察出，现行的计划体制，存在着计划的阶段性与生产建设的连续性的矛盾。现代化生产和建设，要求连续进行，并且一般周期都比较长，有许多不是一年内能完全竣工的。我们的计划则是按年制订的，不问执行的情况如何，基建项目、物资供应合同和财政拨款，到年末都“一刀砍”，下一个年度计划再重新安排，而下一个年度的计划又迟迟定不下来，影响了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同时，开展市场调节的实践，我们也看到，许多企业的

经济活动由于缺乏对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了解而存在盲目性。并且，在当今时代，科技进步及其对生产与需求的影响，生产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与完善，人口发展与人材培养以及生产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是长期的过程。一些重大项目从开始研究到广泛运用，规模越来越大的基建项目从设计、施工到投产，赶超先进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等社会目标的实现，都必须长期持续不断地进行才能奏效。因此，必须加强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搞好长期计划和中期计划，并把长期计划、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结合起来，互相协调，而把国家计划工作的重点，放在中长期计划上。这样，才能提高计划的质量，实现既定的计划目标，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地按比例发展。中长期计划要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为目的，切实搞好综合平衡，留有充分余地，保持相对稳定。它主要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目标，重大比例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建设规模，生产力合理布局，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等等。年度计划以中长期计划为依据，在企业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平衡确定。只要中长期计划中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也就有了保证。即使年度计划在执行中出现了不平衡，也比较易容调整。为了解决生产建设连续性与计划阶段性的矛盾，还要改变过去基建投资、供货合同、财务拨款等年末“一刀砍”的办法，应允许年末结转。一些重要项目的建设 and 设备制造，要采取按中长期计划，按设计进度，一次安排逐年分交的办法，中途不改变计划。

加强区域规划，把部门计划和地区计划衔接起来。现行体制，编制计划主要依靠中央各部，在中央各部的基础上搞

平衡，在许多方面只管中央一块，不管地方一块，只注意部门平衡，忽视地区平衡。地区综合部门由于集权体制的限制，对具体平衡工作也无能为力。这种部门计划与地区计划不相衔接的情况，同做为有机整体密切联系着的国民经济是矛盾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最后要落实到地区平衡上，特别是随着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市场调节的运用，地方的经济权限扩大了，发挥地方经济优势的问题提出来了，加强地区综合平衡就更为重要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的计划制度就应该强调区域规划。按照地区特点，首先搞好地区规划，在地区规划的基础上，搞好部门计划，把部门计划和地区计划衔接起来。地区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地区发展规划的制订，要在全国长期规划的总体设计里，根据地区的经济特点和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发挥地区的优势。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从社会化生产和全国范围的商品交换的角度，并且把视野扩大到国际市场，选择经济效果最好的区际经济联系和区内经济综合发展的最优部门结构。这种结构，大体由三类部门组成：一类是利用本地区最有利的自然、经济条件建立的专业化生产部门，这是全国的重点，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重点；二类是围绕专业化部门发展的，包括为其协作配套和综合利用其副产品、“三废”的部门；三类是能充分满足以上两类部门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结构部门，包括燃料、动力、运输、道路、仓储、给排水、环境保护、生活必需品以及生活服务部门。在进行地区规划时，要有以城市为经济中心的思想。城市是历史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协作以及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各种业务活动的中心。这种中心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又有着不同的层次。小城镇是它所联系的一定范围的中心；中等城市则联系着若干个小城镇

而为较大范围的中心，大城市则是更大范围的中心，而众多中小城镇则围绕着它构成经济上的群落。这样，以大城市为经济中心，建立起城市与城市间、城市与乡村间广泛的商品联系和经济协作，由此形成地区的平衡。而只要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是协调的，全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会是协调的。

原载1980年47期《学习与探索》（内部版）

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探讨

遵循社会主义生产的目地，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是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如果离开这个基本出发点，各自强调本部门本地区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基建战线“你长我不长”，明下暗不下，而人民生活的改善则被忽视，生活欠账得不到偿还，这样，国民经济的调整也就会落空。这是一个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一些看法。

一、生产为了消费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决定的

人们为了生活才进行生产。生产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目的性本来是明确的。由于生产资料出现私有制，这个本来明确的目的，被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追求的狭隘目的所歪曲和掩盖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资产阶级组织生产的目的成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生产的目地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即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什么生产的目地有这种变化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生产资料归谁

占有。劳动人民处于被雇佣、受剥削的地位，生产资料变成剥削劳动的资本，生产的目的不可避免地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相反，劳动人民是生产的主人，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没有剥削，生产的目的就必然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首先是劳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条件下的公有制，商品交换程度低，自给性程度高，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明显的。在生产力水平较高条件下的公有制，商品交换程度高，自给性程度低，生产的目的往往由于“见树不见林”而被忽视了。比如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老解放区从事生产活动的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物质基础发展到现在，生产力已具有较高水平，商品经济发展了，生产社会化程度高了，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只看到直接的目标是完成计划，忽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

由于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于是有些部门和企业自觉不自觉地生产而生产，片面强调重工业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忽视再生产原理中消费资料增长是生产资料增长的重要的制约条件。忘记了生产的增长不是目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正如斯大林所说，“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我国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自己武装自己比较多，武装农业、轻工业、建筑工业比较少，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比例失调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如1978年我国钢材消费量中，用于农业仅占15%，用于轻工市场仅占11.7%；生铁消费量中，用于农业占3.6%，用于轻工业占1.1%；耗电重农轻重的比重是：11.5%、12.9%、53%，有人推算，

如果78年少产300万吨钢，轻工业用电，就可以得到保证，不用“停三开四”，影响轻工业生产。又如机械工业的金属切削机床，数量已超过日本，由于原料不足已有机床不能充分开动，还继续用钢材生产这类机床。钢坯、机电产品积压，农业、轻工业的主机不足，配件更少，这种又长又短的产品，此起彼落，时而长线变短线，时而短线变长线。不仅浪费了有限的物资，积压了资金，减少了国民收入，而且规格、品种、质量不对路，不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说到底，是没有真正弄清楚发展这些产品的生产目的性，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全面地促进生产的发展，满足社会的需要。

实践证明，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必须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掌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价值规律。

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者是社会主人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与“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相适应的。但这种把需要当作目的，并没有全面说明为什么要进行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两重性包括价值与使用价值两个方面。价值是以使用价值为承担物，使用价值通过价值交换才被承认。所以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商品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诚然，使用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使用价值愈多，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就愈高。但只讲使用价值，忽视交换价值，也就很难持久地达到生产的根本目的。因为交换价值的实质是投入生产的劳动量所生产的生产物在进行等价交换时的客观基础，是社

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离开这个基础，就是没有价值观念的生产、“得不偿失”的生产，不仅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也不具备。如我省的小钢铁、小氮肥的亏损就是如此。从66年到78年小钢铁投资49,300万元，产生生铁127万吨，亏损54,700万元，平均每吨生铁亏损400余元，每元投资亏损1.17元；小氮肥投资15,000万元，亏损15,000万元，每元投资亏损1元。从价值看，意味着投入小钢铁、小氮肥的劳动量远远超过生铁、氮肥所公认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通过价格反映出来）。按生铁实际平均价格计算，这种投入和产出劳动量的比例，大体上是3:1。从使用价值看，产生生铁物化劳动所消耗的是许许多多的使用价值的消失，才产生生铁一种使用价值，煤、焦、电、铁矿石、耐火砖、高炉、鼓风机等实物消耗与占用，以及对劳动力维持再生产生活资料的补给都消失了。这种投入生产所产出的生铁的使用价值，少于一般水平下应当产生的使用价值数量，长期下去造成物资短缺，这是造成国民经济实物形态比例失调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我省长期缺少钢铁、化肥，也是促成不得不在这种亏损状态下进行生产的客观原因。

由此可见，生产的正常进行，离开使用价值就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离开价值这个杠杆就不能使生产不断的完善，以实现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社会的需要包括生产的消费与生活的消费，生产的消费是物化劳动的价值补偿，生活的消费是吃、穿、用、住、行等消费资料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所以生产的消费最终结果是为了生活消费的增长。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产是消费的手段。只看到使用价值，忽视价值这个杠杆，就达不到生产的目的，或不能全面达到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目的在于从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来满足人们

生活的需要；价值规律的要求是价值增殖的生产，即投入生产凝结在生产物中的劳动量必须低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目的在于创造更多的剩余生产物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只有讲求经济效果、合乎目的的生产，才能真正满足消费，生产的目的才能真正实现，这是由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决定的。

二、弄清生产的目的是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前提

社会总产品有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两种形式。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是社会总产品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所提供社会的各种使用价值，后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所消耗的价值及新创造的价值之和。原有使用价值的消失与新的使用价值的产生，劳动消耗的价值补偿与劳动创造的新价值，都是通过生产才实现的。积累是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扣除满足社会消费之差，消费是活劳动的报酬与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用于满足社会消费之和。积累与消费也都是通过生产才发生的。由此可见，生产既是创造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条件，又是产生积累与消费的根据。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在什么时间、地点、结构、条件下生产，对使用价值与价值、积累与消费都起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中阐明了剩余生产物是积累的源泉，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并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分为七个方面：

1. 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2. 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3.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4. 用来支付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这部分支出应日益减少）；

5.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这部分支出应日益增加）；

6.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7. 劳动者个人所得。

社会总产品科学地分配为这七部分，虽然是当时针对“不折不扣”劳动所得的《哥达纲领》进行说理批判的，但对社会主义的分配，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假设社会总产品两大部类的价值结构如下：

$$I\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II\ 1500C + 750V + 750m = 3000$$

$$5500C + 1750V + 1750m = 9000$$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原理的七个部分再假设的数值分解如下：

1. 生产资料的价值补偿为 $I\ C + II\ C$ ， $4000 + 1500 = 5500$ ；

2. 用于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为 $I\ m_1 + II\ m_1$ ， $400 + 300 = 700m_1$ ；

3. 用于预防不幸事故发生的部分为 $I\ m_2 + II\ m_2$ ， $40 + 30 = 70m_2$ ；

4. 用于支付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管理费用为 $I\ m_3 + II\ m_3$ ， $80 + 60 = 140m_3$ ；

5. 用于满足共同需要部分为 $I\ m_4 + II\ m_4$ ， $400 + 310 = 710m_4$ ；

6.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为 $I\ m_5 + II\ m_5$ ， $80 + 50 = 130m_5$ ；

7. 劳动者报酬为 $I\ V + II\ V$ ， $1000 + 750 = 1750V$ 。

还可以进一步弄清几个有关概念的数量关系：

国民收入（净产值）= $V + m$ ，即 $1750 + 1750 = 3500$ ；

积累基金 = 剩余生产物价值 - 社会消费基金， $m - (m_2 + m_3 + m_4 + m_5)$ ，即 $1750 - (70 + 140 + 710 + 130) = 700$ 。

消费基金 = 社会消费基金 + 个人消费基金，即 $1050 + 1750 = 2800$ ；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为 $700:2800$ ，即 $20\%:80\%$ 。

从上面的一些数量关系来分析，可以证明：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费，剩余生产物，都是通过生产活动才产生的。有效地生产才能保证各项经济目标的实现。但是，只有把生产的目的明确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时，每项生产活动才是有效的。还可以看出：生产是创造国民收入的源泉，国民收入是劳动报酬与剩余生产物的源泉，剩余生产物是积累的源泉，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这种循环往复的公式如下：

社会总产品—扣除：已消耗生产资料

(9000) (5500)

↓

国民收入—扣除：劳动者生活资料

(3500) (1750)

↓

剩余生产物—扣除：社会消费的资料

(1750) (1050)

↓

积累——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700) (200)

↓

用于追加生产的投资 (500)

用于生产的投资，扩大再生产后的价值结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为：

$$I \ 4273C + 1068V + 1068m = 6409$$

$$II \ 1607C + 802V + 802m = 3211$$

$$5880C + 1570V + 1870m = 9620$$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增长6.88%，国民收入增长6.85%，剩余生产物增长6.85%，积累增长6.85%，消费增长6.85%。虽然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可能是这样的均衡比例，但成比例增长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国三十年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就在于只注意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原理中所指出的“两个源泉”，忽视了生产是国民收入的源泉，国民收入是剩余生产物的源泉。这种忽视，导致重生产、轻生活，甚至脱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于是在生产中不讲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考核国民收入的增长；在国民收入分配上，长期稳定工资，用挤消费的办法去扩大剩余生产物；在剩余生产物的分配中，又只注意积累的提高，忽视科学、文化、教育、卫生、行政等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在积累的使用上，又不顾非生产性（如职工住宅、校舍、科学机关等）的建设，尽量扩大生产性投资；在生产性投资中，不考虑最终产品生产的设备需要，而是尽量武装中间产品的设备需要，大而全，小而全，完工时期越来越长，胡子工程越来越多。这种在林彪、“四人帮”干扰下，不从实际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造成了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使我们受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这是必然的。

全国工业生产中，从49年到78年，重工业增长90.6倍。整个轻工业只增长19.8倍。我们黑龙江省重工业增长38倍，轻工业只增长19倍，每年购买力的增长超过轻工市场供应量增长的3倍。日用工业品的自给率只占53%，有些品种、规

格、花色还不对路，没有竞争能力，有的是20年“一贯制”，有的是粗制滥造，不考虑用户需要，造成商品积压。种种事实充分证明，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后果是严重的。

重工业一股劲的优先增长，轻工业长期是短腿，其结果两大部类的按比例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从事重工业生产的工人，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体力得不到恢复，生产就受到影响；轻工业生产的设备（特别是维修配件等），生产资料得不到补偿，生产能力就很难达到。由于生产受到影响，国民收入不能迅速增加，积累与消费的合理比例也就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前提。

三、搞好积累与消费的合理比例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集中反映生产与基本建设、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以及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涉及到国家、集体、个人的目前与长远的利益。归根到底，是统筹兼顾国家建设速度与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遵循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按经济规律办事，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就统筹兼顾做的好；反之，只顾一头，就顾此失彼，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仅建设速度欲速不达，而且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

第一，积累率（或积累比例）的高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数量界限，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些同志对积累偏高不觉高，等到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时，又不得不提出控制积累率在一定限度内的主张。其实这是“舍本逐末”的表面解决，不是“釜底抽薪”的彻底根除。如有的部门、地区、企业把实现的税收与利润当作“积

累”，这种未经社会扣除——再分配的企业纯收入并不是真正的积累。用企业的税利作为积累就夸大了积累，这是不对的。又如有的单位，从需要出发，先定投资项目，再筹集资金与物资，只要把项目列入计划，不怕资金、物资留缺口，这是违反剩余生产物是积累唯一源泉这个经济规律的。再如过去把“先生产，后生活”绝对化，这实际是挤消费的办法。正由于对积累率高低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为24.2%；第二个五年计划达到30.8%；59年到60年甚至高达40%，70年到78年仍保持33%，其中78年为36%。这样高的积累率是在国民收入低水平下出现的，就更增加了生活欠帐。拿基本建设投资来说，本来战线就长了，财力、物力、人力都很吃紧，仍然没有限制地争项目。58年基建投资比57年增加86.5%，已经超过了限度，59年又比58年增加32%，60年又比59年增加14%。当前调整基本建设投资阻力很大，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前面已经指出，再生产原理中的“四个源泉”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数量界限。用于生产性的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是不能超越剩余生产物满足社会消费的差额。超越这个数量界限，势必造成建设规模大，材料、设备供不应求，不仅扩大再生产不能实现，简单再生产也将受到影响；超越这个数量界限，势必挤了消费，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是在人口自然增长的条件下，不提高工资，就意味着相对降低了人民生活；超越这个数量界限，还破坏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平衡，即有钱无物，分配落空。

第二，消费多少既要符合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又受价值规律所制约，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消费资料分为三类：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按照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首先是保证人们对生存资料的需要，这是最低的

数量界限。其次是满足文化、科学等消费资料的需要。享受资料是较高级的消费品，是相对来说的，随着生产的发展是逐步提高的，这也就是基本经济规律中所指出“日益增长的需要”。所有这些消费资料是生产的目标与出发点，安排生产建设也要把消费当作目的。究竟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多大比例，基本经济规律的回答是抽象的没有数量界限的，只是日益增长的需要。价值规律通过价值量的核算，结合基本经济规律要求，就可以作出具体回答。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应当一年比一年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国防建设，行政管理，应当一年比一年发展。在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计算出满足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的最低限度与提高水平，就可以确定消费水平与消费基金。比如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品消费量和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目前我们的国民收入水平很低，消费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不可能提高太快。同时，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以消费品的实物多少为基础的，脱离消费品现实数量提高消费基金的比例，是空洞的，不能实现的。

第三，积累与消费的合理比例基础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积累与消费的分配是在国民收入范围内进行的。积累多，消费就少，积累少，消费就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相对数值。相对数值离开绝对数值就难判断合理性。比如国民收入减少（如天灾、人祸的年代），消费的比例再高，消费的绝对数值低于生存资料的需要时，也不能认为是合理的。相反，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时，消费的比例虽然较低，但保证了生存资料与发展资料的需要，就应该说是合理的。关键是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增长的途径：（1）降低生产资料的消耗，如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降低原

材料消耗，采用廉价代用材料，等等。（2）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在等量劳动量的条件下，尽量提高单位时间的生产额。为提高技术、改进劳动组织，合理组织生产，等等。

（3）扩大生产规模，即追加投资，扩大生产人员。这种条件必须按“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的原理办事。

※ ※ ※

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调整是关键。所谓调整，是调整经济结构与国民经济不合理的比例关系。为了统一认识，首先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其次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按经济规律要求调整好。当务之急是切实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把有限的国民收入与有限的积累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每元国民收入、每元积累资金的效果。近十年来，投资效果是很低的，不仅完工时间一般项目由过去的三—四年增加到了七—八年，而且每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仅占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半左右。这种损失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几乎相当于五年的国家预算收入。我们研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目的在于筹集更多的积累基金与努力增加更多的消费基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服务。显然，对符合客观实际的、合理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寻求的结果，其数量可能比希望的要少，但这是可靠的现实可能的高速度。否则，离开实际，主观追求高比例，欲速则不达，实践已经作了回答。按合理比例制定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各种条件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还会出现许多不平衡的环节，这要在计划实施过程中随时采取措施加以调度。当然，上述探讨是只就国内条件而言的。如果加上外来因素，如我们引进外资和进口设备，就必须有国内相应的资金和物资等条件予以配合，这样，积累消费比例以及扩大再

生产的诸因素的平衡，就会以更为复杂的形态出现，这也是必须在认识上和实践中认真解决的。

原载1980年38期《学习与探索》（内部版）

深入实际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指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九六一年夏，刘少奇同志到我省视察二十多天。当时，我也曾陪同少奇同志到一些单位视察。少奇同志对我省林业生产、林区建设和其他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了一系列指示，其中很多意见，是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称赞这次调查研究说，少奇同志带了个好头。

少奇同志视察我省，过去没有公开宣传，广大群众不十分了解它的情况。十年动乱中，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黑白，恶意诬陷，甚至说少奇同志是来黑龙江“网罗个人势力”，把当时省委的不少同志打成所谓“反党叛国集团成员”，以写林业采育结合为题材的话剧《松涛曲》（原名《登高望远》）被打成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剧作者和其他一些同志也受到株连。这种罪名，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才得以彻底洗刷。

刘少奇同志此行，究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还是一次马列主义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少奇同志的一系列调查结论，究竟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货”，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见解？让我们回顾事实，看看历史的真面目吧。

在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我们还缺乏经验，还需要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真正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九六一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峻考验的一年。由于接连两年严重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以及我们在经济工作指导上有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战胜这个困难，为了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一系列决策，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这年“七一”，刘少奇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着重谈了这个问题，要求全党干部“自觉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这就是必须象毛泽东同志一贯所说的那样，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的环境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从客观的实际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讲话号召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以便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刘少奇同志身体力行，继五月间湖南农村调查之后，从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日，在我省伊春、牡丹江、大兴安岭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林区，进行了周密系统的考察，同时还视察了哈尔滨、鹤岗、佳木斯、齐齐哈尔的一些重要工矿企业和大庆油田。少奇同志这次调查研究，用具体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的榜样。

少奇同志当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不顾年高，不辞辛劳，一连多日奔行于高山林莽之间。那些天，林区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森铁小火车也不安全。陪同的同志建议天晴再进山考察。少奇同志却视若等闲，笑着说：“战争年代，下雨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率领大家按日程赶路、考察。每到一地，他穿着雨衣、胶靴，拄一根树枝，爬山涉水，踏泥泞、钻密林，视察采伐、集材、运输、造林、加工各个环节。他不满足于第二手材料，对重要问题，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去看。

少奇同志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请教。他请同行的东北林学院教授周重光同志讲述林学知识；称赞伊春的一位领导干部是“打火专家”，跟他仔细探讨能否变火灾为“火利”，促进森林更新。他每天工作长达十几小时，甚至在行路休息的时候，也抓紧同工人、专家、基层干部谈话和讨论问题。少奇同志高瞻远瞩，循循善诱，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据中央机关随同少奇同志视察同志讲，少奇同志从北京出发之前，他所在的党支部专门开了会。少奇同志说：“这次去黑龙江，任务就是考察林业经济。现在国家很困难。国务院发了通知。我们这次出去，要严格遵守纪律，不能搞特殊化，不能给地方添麻烦。”到我省后，少奇同志又叮嘱省委同志告诉各地，对他们一行不要额外招待。他和随行的同志就在火车上食宿。在伊春、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城市停留时，当地邀请少奇同志下车稍事休息，他为了不给地方上添麻烦，一概谢绝。少奇同志穿着布衣布鞋，饮食简单。在离开伊春的时候，地委的同志想请少奇同志带点林产品作纪念，跟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商量。那位同志说：“少奇同志规定了纪律，不接受礼物”。经再三请求，才留下两

棵栽在木板钉的花盆里的小松树。

二

我国是个少林国家，而黑龙江省“得天独厚”，森林面积和木材蓄积量分别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黑龙江林业状况如何，对国家建设关系至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我省林业，发展迅速。但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有些“高指标”、“瞎指挥”之风，直接冲击林区，出现了过量采伐，只伐不育，管理不善，浪费严重等问题。

少奇同志在这次视察中，紧紧抓住更新造林和资源利用这两个根本性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为我省林业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少奇同志指出，林业工作的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他说：

“一方面山上有资源，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各方面需要。如何把资源和需要结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从中央林业部到管理局、林业局，你们都要做这个工作。”

从小兴安岭到张广才岭，从完达山麓到大兴安岭腹地，少奇同志反复强调这一思想，教育我们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把林区的一草一木都利用起来为人民造福。在伊春的一次参观中，少奇同志看见不少小径木、梢头木和枝丫横躺竖卧地丢在采伐过的迹地上，马上当做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他对身旁的林业局负责人说：“要惜木如金啊！关里有的地方找个镰刀把都不容易。”少奇同志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在视察期间对小径材利用问题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了解到，小木材生产费工，收购价格低，影响收入，企业和工人都不愿意搞。为此，他和干部、工人们研究，能否在工资和价格方

面加以调整？譬如，工人生产小木头，定额和工资不能和大木头一样按立方米计算，而应考虑到耗费的工时。国家收购，小木头价格要提高，大木头要降低；销售价格则要倒过来，大木头贵，小木头便宜些。回到北京之后，他还专门派入到伊春林区就此作过专题调查。

少奇同志强调“做林业工作，一定要有建设共产主义的思想”。他说：“林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林业建设是共产主义建设，不仅为了现在，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为了子孙后代为共产主义明天。”又说：“毛主席讲，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这个少林大国还要做长期的艰巨工作。”

我国森林更新，应该靠天然，还是靠人工？在少奇同志视察之前，各林区没有统一的提法。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看苗圃、看人工营造林、看采伐迹地、看天然次生林，看成功的，也看没搞好的，看了南坡又看北坡。边看边和大家讨论，有时就坐在树林中的草地上，开现场讨论会。少奇同志认为，我国森林资源不多，天然更新太慢，要十几年、几十年，红松甚至要上百年，因此必须强调人的因素，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他指出：“掌握住自然规律，就能人定胜天。林业是自然规律很强的事业，既是农业，又是工业，要搞好，就要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他赞成人工更新为主，对次生林也要进行人工抚育，促其生长。经过少奇同志的调查研究，森林“以人工更新为主，人工促进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的方针，写进了当时正在制定的《林业三十条》。

为了搞好森林更新，少奇同志提出，要把任务和政策统一起来。林业干部反映，当时国家压的采伐任务太重，往往过量采伐，造成采育脱节。少奇同志说：“要把任务减下来”，

“任务要和政策统一起来”，“尽可能使林业局不大搬家。有的非搬不可，也只能调走一半。你少砍一点，再栽一点树”。采伐时，不能只考虑一时的经济效益，还必须考虑到怎样有利于水土保持、森林更新。针对更新造林成活率不高的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可以采取由林场、工段、职工家属包栽、包活、包抚育、包成林的办法。“这一块，给多少钱，过三五年后，活一棵、一百棵、一千棵给多少钱。……或先给一半，过二三年成活了再给一半，会更把握些。”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卓有成效。翠峦林业局根据少奇同志指示精神，从一九六二年起，更新造林实行“定包制”，到一九六六年检查，从头到尾定包营造的五万零六百七十亩，保存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点七，超过全省更新造林平均保存率的一倍。十年动乱中把“定包制”作为“三自一包修正主义的翻版”批掉了，更新造林保存率骤降到百分之二十点四。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除了采伐迹地更新，少奇同志还很注意群众性植树造林活动。有一次，他跟负责林业的领导同志谈起周总理提出的“青山长在，永续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目标。他说：“植树造林，是扩大再生产。这一点，石油、煤炭都不能，林业能。搞得好，可以做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

少奇同志为了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在我省林区倾注了多少心血啊！

三

在视察林区时，少奇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提醒我们要注意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大家知道，解放后，几经大的变革，搞社会主义改造，应该说，当时的生产关系状况是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基本相适应的。但是，那几年，

我们办事情还总想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什么都想由国家统起来，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夸大了，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我们一时又缺乏自觉。所以，少奇同志的及时提醒，使我们豁然开朗。

少奇同志在生产关系方面谈得最多的，还是所有制问题。他指出，根据我国现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全民、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他说，“不搞三种所有制，三种所有制不配套，经济就不活。”“要有全民，有集体，有大集体和小集体，还要有个体，这些都要。它们各自占多大比例，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来决定。”

少奇同志教育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三种所有制。他说：“人民政府和党委如不尊重所有制，势必搞乱，破坏所有制。只要所有制一动摇，其余一切都动摇了。”

关于分配，少奇同志反复讲，要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一再告诫说：“我不赞成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不能鼓励大家去做艰苦的工作。”

少奇同志不赞成林区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统起来。他说：“林区社会组织，还要很好研究。工人要吃饭，要生儿育女，光靠全民所有制是不行的。集体所有制，少数个体的，都要。完全包下来不行啊！”

他看到林区有些地方，过伐、皆伐，只伐不育、重伐轻育的现象十分严重，没有长远打算的思想，继续下去，林子光了，林业局就要大搬家。他从伊春到大兴安岭，从所有制和分配方面调查其原因，同干部、工人商量解决办法，最后提出了著名的建设营林村的设想，即划分林区，安居民点，经营森林。他说：“如一个林区三千公顷，定居十几户，由国家投资给盖上房子，开好地，供给些牲口、农具，头一年供给粮食，第二年粮食自给。每户给开二亩地，一亩半集体

的，五分自留地，自己再开一点，一共三亩地。除种这些地以外，每个劳动力管三百公顷林子，十个人就可以管三千公顷。三十平方公里范围，形成一个小合作社，这个地方按规章制度包给他们，木材国家收购，采山货可以自己出售。这样，他们自己有了吃的，国家的林子也管起来了。国家还可以节省工资。”少奇同志跟工人座谈时，大家很赞成这个办法。

经过几年试行，营林村建设的效果很好，经验是成功的；而在往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中却夭折了。搞营林村建设很有成绩的负责干部，竟然遭到揪斗，有的含冤而死。受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整个林区生产被统得死死的，一种所有制，只强调发展全民经济，不发展集体经济。林业经济路子越走越窄，“有许多事没人干，有许多人又没事干”。

极左路线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把靠近社队的疏林地也统统收归国有，使社队造林无地，用材无林，造成林农对立。这也是乱砍滥伐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今天，当我们重新提出并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重温少奇同志十九年前就这个问题的谈话，是很有益处的。

在一次会议上，欧阳钦同志谈到：过去让老百姓进山砍树，起山火他就来报告；不准他进去，他就不爱护了。有位同志还反映：西部有些防护林砍掉百分之四十，而有个村子听说果树不归公，家家都种果树。少奇同志听了，很感兴趣。他说：“现在，一方面劳动力不足，采了栽不上；另一方面，人多的地方，又把树都砍光了。这是生产关系没搞好。要彼此都有利，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自己，他就搞了。”

“要解决所有制和生产关系问题，造林不给钱怎么行？要有人就要栽树，栽树就有收入。”“栽树要和群众利益结合起

来。国家的林子可以交给他们分级管理，也可以包给他们一部份。”“国家投资，教给技术，群众包栽包活，这样可能栽的多，栽的好”，“慢慢地使他看着林子长起来，那就有感情了。”“群众造林成本，可能比国营造林便宜些。”

少奇同志赞同划一部分山林给公社，还告诉欧阳钦同志，黑龙江省委应当拿出经验来。少奇同志说：“每一个公社、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住户都可以造林。”“黑龙江地多人少，一个人造一亩林子，是不会妨碍耕地的。”他提出：“是否给群众搞一点自留山？”“利用荒山造林，每户划给二亩地，山地、坡地、岗地、河流两岸、铁路两旁、房前屋后都栽上树。”

近两年来，我们大家都在研究发展林业的问题。少奇同志十九年前对我们说过：“生产关系搞得适当，凡是有人、有山的地方，都可以造成林；有人、有山造不成林的，就是生产关系没有搞好。”少奇同志这些话，是继续解决好这个问题的钥匙。

四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陈伯达、张春桥之流，借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鼓吹取消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大刮“共产风”。

那几年，我们头脑太热，也跟着干了不少傻事，使党吃了亏、国家吃了亏、老百姓吃了亏。而当时我们对所犯错误甚感茫然，还自以为主观愿望是良好的。为此，少奇同志对我们省委书记说：“人家发疯的时候，你们没有那么发。当然，人家发疯你一点不发也不可能，发一次也好，这样就有了教训了。”什么教训呢？少奇同志说：“没有一个人违反了客观规律，不受到惩罚的，不管你是什么人。聪明人惩罚

一下就回头。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不要重犯，快点纠正过来。”

在往后十几天的视察中，少奇同志又多次向我们讲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必须坚持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原则的问题。

有一次，他问明林区物资供应紧张的原因，尖锐地指出：“把东西调走，换回来的只是一大堆票子，怎么能行？”

“砍木头的人，不穿衣服，没有肥皂用，就不能砍木头。”

“你拿走我多少煤炭、木材、石油、粮食，你就要拿进多少东西来保。”“不是讲计划安排吗？计划根据是什么？根据就是这个：你要我这样多，我要你那样多，这叫等价交换。”

“这不是待遇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说平等就没有力量，只是说计划安排也没有力量。这是客观规律问题。这是不能违反的。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这是简单再生产的规律，还不是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上讲了的。如果破坏这个规律，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木材就要降下来，煤炭就要降下来，油就要降下来，要这样提问题才有力量。”

在说过这番话以后的第十二天，从牡丹江返回哈尔滨途中，少奇同志又进一步解释：“越是生产东西多、拿出东西多的地方，越是货币投放多，因而商品供应和购买力的差距也就越大；相反，生产东西少的地方，货币投放也少，商品供应与购买力的差距也小。”“因此，安排物资供应时，应该有重点，就是对生产物资多、拿出物资多的地方，应多供应些物资。”“物资应按照货币投放比例进行分配。”“否则，就造成生产东西多的地方，不仅无法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下去。”“你不给他东西，他也就生产不出东西给你了。”

怎么解决问题？少奇同志指出：“要不你投资搞轻工业，要不你调给我轻工业品，不然没有办法。”“整个经济是个整体，是不能分开的。分轻工业部、重工业部是人为的，是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整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比例关系是客观的。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有些人还没有感到切肤之痛。”他还说：“提出这个问题，也不会马上解决。但是作计划，要有这个指导思想，有等价交换的思想。即或暂时不能解决，也有了根据。一年解决不了，二年、三年、五年总可以解决。”

在伊春林区邀集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少奇同志仔细地问了职工生活情况，问有什么困难？有的说，在林场干活费衣服、费鞋子，有钱也难买到；有的说，林区寒冷，工人露天作业，收工后想喝点酒也没有……。少奇同志当即告诉随行的负责人员帮助解决。

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极其重要，确实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没有解决好，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解放前，我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经济，发展畸形。建国后，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发展很快，轻工业的发展则远远没有跟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全省重工业产值增长三十八倍，轻工业只增十九倍，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从市场供求看，我省工资总额占全国第一位，农民收入也较高。近几年，我省日用工业品生产虽有所发展，但自给水平一直很低，只能满足需要的一半。同时，品种不全，花色单调，质次价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样，反过来又延缓了我省经济的发展，正如少奇同志当年所预料的那样，现在我们已经感到“切肤之痛”了！

五

我们这些人，经过民主革命，对于革命比较熟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多。当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时候，党的领导怎样适应新的情况？党的组织怎样抓生产建设、经济工作？当时，少奇同志就这个问题向我们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在伊春林区干部会上，少奇同志说：“你们的领导，什么叫先进？什么叫英明？无非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工时得到充分利用，成本降低，材料节省，质量更好，造林成活率更高，政治上大家心情舒畅。这就叫做领导水平高。”这是少奇同志根据党的“八大”路线，从经济到政治，并且把两者统一，对我们这些做党委领导工作的同志提出明确的要求。这同后来林彪、“四人帮”鼓吹政治与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那一套反动东西，是根本不同的。

少奇同志强调要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说“党要管党”，“要管方针政策”，“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党委只讨论重要问题，一般问题交行政去管。党委决定后，出面的还是厂长、主任去做。党委要少干涉这个树怎样砍法，那个林子怎样规定。”“要管大事，不要管小事，业务工作要由林业局长去管。”“但是，不能提支部领导下的段长负责制。军队的政委制到团一级，营连则不同了。”“党支部要保证监督完成生产任务，贯彻政策。”

视察中，少奇同志问到一些技术问题，我们有些干部往往答不上来。他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很好完成生产任务。”“党委书记、主任、厂长，大部分是老干部或老工人，绝大多数是好的。”“你们要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要找专家，找教授和大学毕业生共同研

究。我们没有业务知识。总是外行不行，要由外行变成内行。”后来，他还对我们省委书记讲了提高人的思想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同发展生产的关系。他说：“生产力的因素，第一个是人的因素。人的政治思想好，团结的好，就能发挥积极性。再一个是人的生产技术。我们讲生产力革新，必须首先革新人，革新人的政治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人有了政治思想的革命，又有了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再加上有了机器，那生产就发展了。”少奇同志的这番话，是非常深刻的，即使在当前，对于指导我们搞好四化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少奇同志很注重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不但要求我们重视和培养知识分子，而且提出选拔一批知识分子参加领导班子，担任领导工作。他说：“每个林业局应当有机械师和林业工程师。林业局副局长至少有一个林业大学毕业生，林场应当有中等林业学校毕业的副场长。”“将来机械化，比例要越来越大。”“工段很重要。工段长也应当分批训练，使他们懂得林业技术。或者调林业大学、中等林业学校毕业生做工段长，他们负责技术，建立技术责任制”，“怎样组织好连续生产，不出事故，他们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

少奇同志在视察中，处处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说：“我这次到林区，不仅要听土专家的意见，而且要听洋专家的意见。”为此，他请了东北林学院的周重光教授做为他视察时的林学顾问。少奇同志在林区视察十七天，回到哈尔滨已经很劳累了，又特意到东北林学院去看望教师、看望学生，并合影留念。少奇同志的言行，同后来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形成的对照是多么鲜明；同我们今天为了建设四化而采取的依靠知识分子、改变干部队伍成分、

扩大专业干部比重的步骤，又是多么一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刘少奇同志视察我省已过去十九年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极其丰富的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今天，当我们回顾少奇同志这次视察时，他根据党的“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对党的方针政策所作的深刻阐述，对我省林业和其他方面经过深入调查所提出的指导性意见，特别是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那种求实精神，仍然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导，成为我们现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一步揭示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典范。林彪、“四人帮”的诬蔑，泯灭不了真理的光辉。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将永远受到我省三千万人民的怀念，将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为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去努力奋斗。

原载1980年5月16日《黑龙江日报》

关于经济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从去春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来，党中央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各方面，确定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普遍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情况是好的，成果是显著的，我们省也是这样。这是有目共睹、大家都承认的。最近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又提出了制订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预示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宏观经济学中生产目的论、比例失调、工资物价等问题，国内正在

展开讨论，当前经济界思想解放，十分活跃，是很可喜的现象。为了正确贯彻党的政策，推进经济改革工作，我们必须提高干部和群众对于党的经济政策的认识。我这里，准备就几个有关的经济理论问题，讲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讲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主义是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出发，设想社会主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有商品经济，但是因为受实践的限制，对此阐述得不多。斯大林同志亲自领导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上都有很大贡献，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但是又不彻底，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有人说是半个商品经济。我们建国以来基本上就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导思想来组织生产和流通的。加上我们自己在长期战争年代实行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所形成的影响，我们在思想上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范围的认识，是很不够的，甚至是排斥的。因此，确定的许多经济政策、措施，是不利于甚至是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一些当做是社会主义的不可更改的原则。在具体工作中，甚至也发生过无偿平调农民的产品和劳力的现象。

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存在着不同的公有制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就是几种经济形式并存。不同经济形式之间的产品，只能以商品的形式来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关系，是商品货币关系。就是在全民所有

制内部，产品也是以货币的形式进行核算的，企业之间产品的转移，也是以货币的形式来核算计价的，这种转让又关系到交换双方企业职工的具体利益，所以，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实际上也是商品交换，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过去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现实和客观的必然。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当然，这种商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根本不同于那种以雇佣劳动剥削、剩余价值榨取和盲目生产、无计划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新型商品经济。我们的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它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在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规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和价值规律，主动地和自主地进行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的。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我们就必须克服过去那种统得过多过死、企图缩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和种种做法。要认识到，我国过去经济很不发达，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现在农业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经济，商品率很低，大约只占百分之二十。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必须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尊重价值规律，我们的经济政策、措施，必须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把经济搞活。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我只讲讲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一个是竞争问题。

过去我们光讲计划调节，说计划调节是规律，说国家计划是法律。一个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靠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来规定，统得很死，严重束缚了企业的手脚。我们国家这么大，社会需要这么复杂，几万几十

万宗产品，都靠计划部门来安排，显然是搞不好的，结果常常是需要的没有生产，生产了的不适合需要，需要多的生产少了，需要少的反倒生产多了；计划的制订和调整，常常很难反映社会需要的迅速变化。由于产销不能直接见面，造成不对路产品大量积压，而另一方面市场供应紧张，既影响了生产的健康发展，又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不便。特别是近两年调整、改革中，国家对有的企业下达的生产任务，有的只占他们正常生产条件下的百分之三、四十。我省许多大厂，其中包括军工厂，国家安排的计划，多数吃不饱。这样，企业在计划外的部分，就得自己找米下锅，靠市场调节，就是通常说的“自己找食吃”。这就说明，光有计划调节是不行的，必须还要有市场调节，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也是吃了苦头后才认识的。

过去我们不允许社会主义条件下有竞争，害怕竞争，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并把没有竞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思想和做法，使企业缺少搞好工作的外在压力，不重视技术改革，忽视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很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必然要有竞争。允许这种竞争对于提高质量，革新技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服务态度，鼓励先进，促进后进，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哈尔滨有两个化工商店，一大一小，小的虽然人手少、条件差，但服务周到，管理得好，门市兴旺，商店盈利；大的人多，条件好，但管理差，服务态度不好，门庭冷落，商店赔钱。通过这种竞争，促进大的向小的学习，很快转变了后进面貌。这就说明了允许竞争是大有好处的。当然，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所有制不

同，我们的竞争是有限的竞争，是受国家计划和政策控制的，不是无政府主义，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在竞争过程中虽然也有淘汰，但这种淘汰，是对企业的一种整顿，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或转产，而不会导致破产，造成失业。

其次，讲讲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大的政策和理论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很关心的问题。

我们允许几种经济成分并存，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长时期以来，我们有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就是所有制越“大”、越“公”，就越先进。在工业企业中，总认为“全民”优于“集体”，“大集体”又优于“小集体”。在农村人民公社中，总认为公社所有优于大队所有，大队所有又优于小队所有。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方面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急于过渡，追求高、大、公，而对生产力水平和状况却很少考虑；另一方面，就是反复不断地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去消灭所谓落后的经济形式，不断地对个体经济给以打击，说什么“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结果，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搞得很死，供应紧张，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多困难。这种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基本原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许多行业、部门，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在这些行业和部门中，搞全民所有制就不如搞集体所有制甚至少量的个体所有制更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比如，修鞋、做衣服、小吃铺、零售青菜和水果等，个体的经营环节少、成本低，就优越于集体的，更优越于全民的。实践表明，在现阶段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允许少量个体经济的存在，对于发展生产、方便生活、活跃经济、安排就

业，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大家在近一、二年中都感受到了。

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人们认为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而害怕个体经济，打击个体经济。回想我们社教运动以来，不都是不断在限制削弱小自由，搞单打一吗？实践证明，这种认识和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看个体经济的性质，不能光看私有制这一点，还要看它同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其发展方向也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个体所有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在我国三大改造完成前的个体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现在的个体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体经济，也不同于三大改造完成前的个体经济。它是在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受国家指导的个体经济。这种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辅助经济。当然，如果我们管理不当，它也会带来一些消极方面的东西，但只要我们正确地加以引导，加强对它的管理，消极的东西是可以防止和解决的。

现在，有些同志担心，允许几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不是右了，是不是倒退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在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允许少量个体经济存在，完全适应当前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怎么能说是右了呢？我们一定要明确，只有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才是最优越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行业中，都各有其优越性，都是不可互相代替的。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不强求一律。允许有人先富，就是允许先冒尖。可是有的同志看到真有冒尖的倒害怕了。当前，在经济领域中，有少数人利用我们制度、政策、

法令不完善和管理工作中的某些漏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随着制度、政策、法令的逐步完善和管理工作的加强，这种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只能是个别的，不可能造成社会上的两极分化。还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由于具体经济条件不同，经营管理得好坏不同，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群众中出现了收入差别暂时拉大了的现象，这是正常的。允许一些人先富起来，就能推动我们的经济更快地发展，为更多的人富起来创造经济条件，进而逐步缩小富裕程度上的差别，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总要有先有后，用先进的带动后进的，这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这种收入差别暂时拉大的现象，也不能看作是两极分化。至于说这是倒退了，我看也不能这么说。按照我国经济状况三大改造完成后，也还需要保留一些个体经济。陈云同志在八大发言时就提出要保留一部分个体户，要把经济搞活。可惜，陈云同志这个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几次运动，就把个体户都刷没了。以哈尔滨市为例，五六年时还有一万多户个体工商业者，“文化大革命”中全给打掉了。现在，也只恢复了三四千户，这怎么能说是搞过了、倒退了昵？！

第三，讲讲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我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中央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慎重考虑、反复研究，并经过了一系列的试点之后，才作出的重大决策，它对我国今后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应该肯定，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建立的这个公有制、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先进的，是非常好的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是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但是，过去它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有问题。过去，在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许多明显的、每个人都痛切感到的缺陷和弊端。比如，吃大锅饭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职工个人之间，搞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而且也存在于各个企业之间：完成任务和不完成任务一个样，盈利和亏损一个样，盈利多和盈利少一个样，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本身、与职工的个人利益没有什么联系。这就使得企业和职工不大关心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状况，不注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损失浪费惊人。又比如，效率低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企业每办一件事情，无论是花一点钱，增添一点设备，改革一项技术，增减几个人，都不能自己做出决定，至于确定或改变生产的数量品种和型号，就更没权了，都是层层请示，层层报批。这就助长了经济领导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能迅速反映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生产技术改革缓慢，科研成果和新的技术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来，有的甚至被搁置起来；生产中的故障和经营中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排除和解决，影响了整个生产的运转。有些用几个小时就能解决的问题，却往往要花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再比如，我们社会主义的工人是生产的主人，但实际上原有某些管理制度中，职工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却没有什麼权力，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以上这些现象的形成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有毛病。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模式搞起来的，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学习这些经验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一些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的

做法沿袭下来的，但后来都没有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民主原则加以必要的改造。这种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统得太多太死，企业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应有的主动权，从而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制度缺少内在的动力。这种体制，使我们不可能全面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不可能把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使我们不能贯彻经济效能的原则，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合理地、科学地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有效地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充分发挥人力、财力、物力的作用，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使我们不能贯彻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尊重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得不到充分体现。一句话，这种体制，长期以来成为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严重障碍。

因此，改革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就要下放权力，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让企业拥有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真正独立经营和独立活动的必要的自主权。过去一年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这方面只是迈出了一步，就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后，不单要普遍推广，而且企业自主权的内容还要继续扩大，不仅利润分成，还要逐步扩大在供产销、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还要试行收税不收利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自负盈亏。现在，有些专家正在研究有关微观经济学问题、所有制问题。看来，对全民所有制形式议论很多，认为经济的发展，不一定由集体过渡到全民，不能搞穷过渡。今后，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深入发展，企业的民主管理问题将会日益突出起来。经济民主必须与政治民主相辅而行，没有民主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搞不好的。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个很复杂、牵动面很广、关系到广

大职工、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一定要作周密的考虑和准备，审慎地、有步骤地加以实行，在实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苦乐不均现象等等，我们应该通过调查研究，妥善地予以解决。

（本文是作者1980年9月26日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第三部分）

价值规律与价格改革

自觉地依据价值规律进行价格改革，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人们极为关心和注目的事情。如何依据价值规律进行价格改革，一些同志从理论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在改革的实践中也大胆地进行了一些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效果。本文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与同志们一起作些探讨。

（一）

价值规律与价格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人们要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就必须与他人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即商品交换。商品具有两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商品在交换中反映出其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的基础是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交换不是依据劳动者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量来进行的，而是依据劳动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的。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这种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市场上只有通过货币及价格，才能具体地实现交换。价值规律

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只要存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而作为体现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就必然承担着商品交换和分配的职能，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就必须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及价格的重要作用 and 职能。

可是，过去由于受“左”的影响，长期以来在理论上基本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实践上也只是在生活消费品部分上承认市场与交换的存在，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因而，常常把计划经济同价值规律绝对地对立起来，甚至把价值规律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物，认为它只起自发的破坏作用，并且人为的加以限制。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一伙把价值规律完全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搞是非颠倒、令人啼笑皆非的大批判，甚至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也当成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批判，妄图加以所谓的限制。由于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曾长时间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了“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作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同时还指出：“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才恢复和明确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及其重要作用。上述这些，一方面表明了我们党

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了，提高了，在实践和发展的基础上，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搞好价格改革指明了方向。

要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搞好价格改革，我们有必要认真探讨，为什么过去否认价值规律和忽视价格作用，能被人们接受并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中？我认为，除了受“左”的影响外，从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受僵化经济模式的影响。建国后，我国由于缺乏搞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基本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作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经济建设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把这种模式教条化，不能根据我国后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僵化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把计划经济同价值规律割裂开来，过分强调集中，统得过死，给社会分工的发展造成种种限制，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不能很好的发挥各自的经济、技术和自然条件的优势，国民经济机体被分割为无数“大而全”、“小而全”自给自足的单位 and 各自的条条块块，以分配（统购统销统配）代替交换，以内部调拨取代流通，否认交换在社会化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机能，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商品的现实问题。只强调算“政治帐”，不重视实际经济效益。同时，还把指令性计划作为调节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唯一手段，窒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经济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机能。只承认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和计划调节，否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和利用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否认生产企业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商品生产

者的地位，否认企业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由此造成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经济利益与生产者关系不大，特别是企业的经营好坏与自身的经济利益不相联系，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就使价格的高低对社会和企业的生产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而也就不存在价格同社会劳动消耗相适应，以及同市场状况相适应的内在要求。

第二，受稳定物价的价格政策的影响。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基本稳定物价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遭受了十二年通货膨胀的苦难。解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情况仍很严重。因此，当时国家把控制物价，稳定金融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实行稳定物价的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并对当时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实现经济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优势，经济建设开始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就应重视和发挥价格杠杆的功能和作用，不断地调整物价，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系统，生产要素不断发生变化，产品价格也随着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及时调整物价，是经济发展一种内在的客观要求。但是，我们多年来的物价工作并没有很好地按照这一客观要求办事，仍把稳定物价作为基本方针（当然，这与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以及低工资和基本上冻结工资有关），虽然在此期间，也进行过几次物价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价格不合理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已经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应该

指出的是受稳定物价方针的影响，有的人至今不清楚调整和改革价格的必要性。

第三，受市场求大于供状况的影响。过去，由于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商品供给量不足，物资紧张，许多东西计划供应计口出售，东西少，网点少，群众靠站队买东西。市场趋势长期是求大于供的“卖方市场”，企业只要能生产出产品，就可以销售出去，产品的价值就可以从各方面得到实现和补偿，有的人甚至误认为“供不应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因而稳定物价就成了物价工作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国家对企业又实行产品包销，价格高造成库存积压由国家负担，价格低于成本由国家财政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特别是生产企业管理人员无须研究价格。有时为了缓和供求矛盾，国家还采取了许多违背价值规律的作法，如长期冻结价格；用派购、计划收购等行政措施，把东西收上来；通过各种票证解决供求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排除影响；用补贴倒挂的办法排除价值变动对价格的影响，等等，这就使价格起不到调节的作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方针和政策，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广，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商品生产有了新的发展，许多东西多起来了，市场趋势开始逐步由求大于供转向供大于求（在某些方面），由“卖方市场”开始部分地转向“买方市场”，这一变化的出现，动摇了靠吃大锅饭过日子的人们的靠山，原来那种“统购包销”，在这种变化中显示出了不少的弊端，原以为是保障供给的奇方妙药，这时反而成为保护落后，难于忍受的财政负担，使人们开始重视研究价值规律和价格。

由于受上述几方面原因的影响，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就不可能很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价格的作用，并久而久之，

习以为常,造成了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组织和领导经济活动,而不善于用经济办法,特别是不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价格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要肃清这些影响,确立起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及重视价格作用的概念。

(二)

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改革价格,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的客观要求。这里首先应该肯定和说明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调整物价和改革价格体制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可喜的成绩。在价格调整方面,一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产品价格偏低的情况有所变化,工农剪刀差有所缩小。二是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调整了八类副食品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百分之三十左右。三是调整一些重工业产品和煤炭价格,主要是生铁和钢材(小型材、管板、成材)价格有所提高,煤炭由亏损到微利。四是调整烟酒和涤棉布价格,主要是调整了名牌高档烟酒的价格,缓和了供求矛盾。经过一九八三年全面调整纺织品价格,使涤棉布和纯棉布的比价趋于合理。这些调整,不仅收到了一些明显的经济效果,也为后来改革价格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在价格管理体制方面,这几年也迈出了步子。首先是改变了由国家统一定价的单一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计划价格,调拨价、奖售价、议价、企业自行定价和自由价格等多种形式;其次是对价格管理权限开始下放,有些定价权中央下放给地方,有的直接下放给生产部门和经营部门,还有的下放给企业。上述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改革价格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and 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再加上价格改革尚在摸索试行之中,因

而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还存在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不同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的情况十分突出。这主要表现在：（1）在同类商品中，没有充分体现按质论价的原则，真正实行优质优价，劣质劣价，同质同价，分等论价。以自行车为例，永久、凤凰、飞鸽名牌车，与一些质量较差的杂牌自行车，在售价上相差无几，有的甚至接近这些名牌自行车的价格。（2）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从利税率上看，石油、化工、电力都比煤炭高许多倍。（3）主要农产品价格倒挂，使国家财政负担过重。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提高粮棉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后，现在国家平均每经营一斤粮食赔一角钱，每经营一斤食用油赔八角钱。这是国家财政出现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4）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仍然很大。据一些资料反映，农产品提价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仍分别高于和低于价值的百分之十左右。（5）能源、原材料价格偏低，加工业产品价格偏高。扣除税金以后，全国重工业平均资金利润率为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其中采掘工业为百分之三十七点六九，原料加工业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九二，制造工业为百分之三十点八七。原料加工业平均比采掘工业高一点三三倍。（6）交通、公用工业和一些服务行业收费低，利润小。如浴池大部分都赔钱或盈利甚少。房租过低，房租费不够维修费，城镇住宅盖得越多，国家负担越重。近几年，国家每年用于住宅投资平均都在一百亿元以上（不包括企业自筹资金），而统计全国二百七十三个城市，每年收回的房租总额只有五亿元左右，仅是管理费和维修费用的四分之一左右。当前，在价格体制上仍存在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如有的商品天（津）南（京）海（上海）北（京）一个价，一年四季一个价，使价格很难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因为价格

不合理，有些产品已经供大于求，但由于价格低，市场上却表现为供不应求，造成人为的浪费；有些产品本来供不应求，但由于价格高，市场上却表现为供过于求。价格是关系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方面和生产的各个领域的大问题，不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就会限制计划、流通、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就不能使价格成为经济核算和正确评价企业经济效果的标准，不能鼓励企业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不能保障城乡的物资顺畅交流，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也会严重妨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特别是会造成我们仍不能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

由上可见，为了使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协调、健康、稳步的发展，改革现行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体制，已经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现在党中央决定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我们要从思想和理论上提高对改革价格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自觉性，积极投身于这一实践中来。

(三)

怎样依据价值规律，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意味着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广泛的调节作用，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是通过价格及其变动来实现的。列宁曾经说过“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4页）价值规律是制定价格的根本依据。离开价值规律，物价工作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在价格改革中，必须把符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作为基

本出发点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目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刚刚起步。所谓价格体系，就是由一系列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互相联系的价格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改革价格体系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要想有效地控制这个工程正常运转，实现预定的目标，就必须注意和考虑各种价格之间的联系性和相关性，同时，还要善于从总体上把握其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方面。改革现行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主要应解决有些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又不反映供求关系和某些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确定科学的定价依据和实行多层次的价格形式，以及制定合理的比价关系。

一、应以成本作为商品定价的基本依据和最低的经济界限。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的构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耗费掉的生产资料价值 C ；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V ；劳动者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 m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构成，主要也包括三个部分：即物质资料耗费的支出；劳动报酬（工资）支出和利税。前两部分支出是成本，我国实行利改税后，后一部分主要是税金和企业积累。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看，在正常情况下，企业要实现简单再生产，必须在出售商品时，收回物质消耗和劳动报酬的支出，以及起码的维修和福利基金。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有较大盈利。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定价格应以产品成本作为基本依据和最低经济界限。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价格时曾经指出：“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

资本价值就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5—46页）成本价格是价格的最低界限，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原理对于制定社会主义价格同样适用。同时，只有以成本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和最低经济界限，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企业的物质资料支出和劳动报酬支出得到补偿，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因此只有进行价格体系和体制的改革，才能创造出扩大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良性循环的条件。

应该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以成本价格作为定价的基本依据和最低经济界限，指的是社会的平均成本，而不是个别企业或个别产品的单位成本。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生产同种商品的各个企业生产条件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别，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也存在差别，产品的个别价格也有高有低。而社会对同种商品只承认相同的社会价值。所以，制定价格时必须以社会成本为依据，使价格能补偿正常生产和合理经营条件下的部门平均成本，并在这个基础上，保证国家、生产单位取得合理的税收和利润。

虽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社会价值不可能直接绝对地计算出来，但各个商品的生产部门的平均生产成本，一般是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来的。因为在全国或一个省、市、区都能找到统计资料，部门的成本统计资料也是现成的。还因为价格构成成本只是主要方面和基本依据，同时还要考虑利税、供求关系和价格政策等因素。过去大家争论比较大的是价格中盈利部分如何确定，大体有四种不同意见，即平均工资盈利率、平均成本盈利率、平均资金盈利率、综合盈利率。我认为，实行第二步利改税，由过去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把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固定

下来以后，以哪种方法求得利润都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税率一旦确定以后，虽然要不断进行调整，但一般的说来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有较多的盈利和较好的经济效益，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降低成本。因此，实行以社会平均成本价格作为定价基础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二、要实行多层次的价格形式。我国价格体系不合理与以往多年来几乎是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的单一形式有关。近几年通过价格调整，逐步形成了以计划价格为主体的多种价格形式。实践证明，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我们进行价格改革摸索和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今后要使价格能反映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就应按《决定》中提出的要适当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要求，建立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多层次的价格形式。这实际就是反映了价格体系改革要经过许多过渡的阶段，经过若干年的时间，不能一次完成。从我国实际经济状况和已有的经验看，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指令性价格、指导性价格和自由价格。

指令性价格的具体形式就是统一计划价格。这是对纳入统一计划范围内商品实行的价格，由国家制定，有的价格可分别由中央到县一级根据物价管理权限的规定分级制定。在制定指令性价格时，既要考虑商品的价格基本符合各自的价值，也要考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还要考虑供求关系和有关的经济政策和价格政策。使之同国民经济经发展相适应，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宏观上起计划调节作用。这种价格要体现指令性的特点，要严格执行。同时，还要保持相对稳定，对不合理的价格要及时调整。

指导性价格，目前主要有三种具体形式，即浮动价格、

协商价格、议购议销价格。浮动价格是由国家规定浮动幅度，允许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国家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对价格进行上下浮动。这种价格主要是以国家统一计划价格为轴心，由国家统一规定上下浮动的最高界限和最低界限。它的特点是比统一计划价格有灵活性。协商价格主要用于生产和经营同一种商品的工商企业。这种价格由工商企业双方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和市场供求状况共同协商议定，它比浮动价格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议购议销价格，这是近几年来较普遍实行的一种价格形式，它对调剂余缺、活跃市场、平抑物价、满足需要，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价格形式可以作为商业部门经营购销业务的一种形式。这三种价格形式，都要接受国家计划指导，但其主要好处是企业有一定的自由权，可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的情况，调整自己的价格。这应作为我们实行指导性计划的配套办法，不断地扩大实行范围。

自由价格，具体形式是城乡集市贸易价格、小商品价格。这种价格不受国家计划限制，完全受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变化支配。但它受计划经济的制约和影响，是计划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近几年来开放城乡集市贸易的实践证明，它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这种价格形式可以长期实行下去。

三、要合理地制定某些商品之间的比价。商品比价是指同一市场、同一时间，不同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其实质是不同商品价值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生产、消费收益高低的对比关系。确定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比例，最主要的是要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符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这样才能使各种商品比价基本合理，使生产者在正常经营的条件下得到大体的平均收入，使国民经济真正能按比例协调的发展。解决某些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的问题，是价格改革的一项重

要任务。我国商品的比价，主要是农产品比价、工业品比价和工农业产品比价。这些方面由于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和历史上的原因，都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如农业产品中粮食一直价格偏低，经济作物偏高；工业产品中原材料价格一直偏低，加工业产品价格偏高；工农业产品中，农业产品价格偏低，工业产品价格偏高。由于这些比价不合理，造成在生产上往往是什么来钱多、盈利大，就往什么上用劲，使国民经济不能协调的发展，同时，还挫伤了一部分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在价格改革中，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上，确定某些商品之间的合理比价关系。同时也要考虑供求关系、人们的消费习惯，以及历史情况等因素，最大限度地求得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价基本合理。在商品比价确定之后，还要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不列入计划管理的产品价格，它们的比价关系应在市场上自由形成，这同样能够调整和引导生产的发展，还能够为计划内商品比价关系的调整提供一套参照系数，促进生产各部类各行业之间比例关系合理化。

改革价格体系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及措施，应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国家财力负担的可能，在保证人民实际收入逐步增加的前提下，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起步阶段，要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方针，通盘考虑，瞻前顾后，走一步，看一步，积小胜为大胜，积战役胜利为战略胜利，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改革中既要着眼于解决现存的主要问题，又要着眼于长远，为今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打好基础。

第二部分 城市经济

加强城市经济研究 充分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城市经济学会成立，这在我省经济理论界和经济战线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它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省城市经济研究工作已迈开了可喜的一步。城市经济学会的诞生，必将有力地促进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探讨，促进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从而推动全省农工商经济的全面发展。

深刻认识城市经济研究的重要意义

城市，是人类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就是市场，“日中为市”，市总是同商品交换联系着的。城市的形式和发展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了城市，城市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条客观规律。

城市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都是以城市经济活动的效益为其基础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作用愈来愈大；同时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愈来愈多。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生产力、科学技术、城市建设比较发达的国家，很重视城市问题和城市经济的研究。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原因，他们研究的进展不是很快的，有些问题即使研究出来

了，也往往很难解决，陷入恶性循环和纠缠不清的矛盾之中。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城市经济研究和其他城市问题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是大有可为的。

现在，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抓经济建设，实现四化。城市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集中的地域，是农工商经济链条上的联结中心，同时又是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中心，是创造人类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坚实阵地。因此，我们要胜利地完成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发挥城市的主导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开展城市经济研究，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在我国，因长期受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影响，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城市经济水平比较低，特别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左”的思想影响，城市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抓城市建设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发展城市经济，抓市场调节被视为“扩大城乡差别”、“搞资本主义”，硬要搞“消灭城乡差别”，要城市向农村看齐。过去一个时期，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搞“先生产，后生活”，这在一定时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但问题是搞得时间长了，就只有生产没有生活了，欠账欠得就多了，造成目前城市建设比例失调，各方面比例失调。例如：哈尔滨的几个面粉工厂，“文革”期间有人为了“消灭城乡差别”都给拆掉了，现在我们不但要重新修复，还得建设新的制粉厂。整个黑龙江省的面粉加工也很紧张，精粉不够用，还要从北京、上海调入。过去说哈尔滨是“油、酒、米、面、铁、木、皮”，那是讽刺哈尔滨在旧社会没有啥东西。可是今天你油、酒、米、面都紧张，市长天天为老百姓加工主食操心，一过年就为二斤精粉发愁。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由于前些年急于消灭城乡差别，恨不得把哈尔滨变成农村。结果，城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经济越搞越死，城市的作用大大削弱了。很长时间里，城市工作所以被动，是同这种状况分不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几年努力，这种状况开始有所好转，补了一些城市的欠账。例如，商业网点数比过去增多了，住宅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市场安排也比过去好得多了。所以，我们今天抓城市经济研究工作，也是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通过对城市经济活动、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认识和运用城市经济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开展城市经济研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市落后面貌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这是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应该有决心、有志气、有毅力担起这一重任，完成这一使命。通过我们奋发努力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不仅要对整个学术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且让世界各国人民看到中国有希望，人类有希望。

研究城市经济，不只是新时期新形势的需要，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战略意义。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作了许多阐述。以后，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在《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一文中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后来，斯大林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大城市不会灭亡，而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

发展的中心。”在我国，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也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城市和城市经济的论述，对于我们研究城市经济问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和其他一些原因，经典作家们关于城市经济，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城市经济，还未来得及作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和系统的论述。因为伟大的先驱没有接触到这些实际问题，我们也不能苛求他们。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讲的那样：“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城市和城市经济的论述，要特别注意同我国城市经济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作用思想的运用，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去创建、丰富、完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理论和城市经济学体系。我们搞城市经济研究，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崭新事业，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研究城市经济的现实意义，是由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所决定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不断发展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归根到底，在于它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经济效果好。恩格斯在讲到大城市的作用时曾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集中，二百五十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二百

五十万人的力量增加了一百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03页）。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恩格斯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发挥这种作用不是自发的，而是要加以研究，因势利导。不是说，越是大城市经济越是发达。在一些生产技术很发达的国家，它的大城市有的不但不膨胀，而且有相反的趋势，城市人口反而在减少。现在看来，世界上正是发展中的国家，倒是大城市有膨胀的趋势，如墨西哥、巴西，在非洲、亚洲许多国家也有这种现象。我国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是十分突出的。据一九七八年统计，我国三十八个大城市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三的大中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一九八〇年统计，全国百分之四十二以上的城镇人口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业总产值集中在四十五个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里。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十五个中心城市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点五，人口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七点八，而拥有的工业企业却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一一点六，全民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二，工业总产值（按一九七九年不变价）占全国百分之三十七点一，工业企业利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百分之三十六，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八点七，拥有的大专院校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一一点二。从我省城市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据一九八〇年统计，我省已有十二个城市、一百零四个城镇，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城镇工业产值占省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八。其中哈、齐、牡、佳、鹤、鸡、鸭、大庆、七台河、伊春、绥芬河、黑河等十二个城市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八，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一。十二个城市中，哈尔滨居于首位。工业总产

值占全省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三，拥有的工业企业占全省的百分之十七点四，固定资产占全省的百分之十九点五。有一些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定的地位。哈尔滨生产的发电设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轴承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三十五毫米电影机占全国百分之八十，轻合金、量刃具、工具、电表仪器、四十八行播种机等在全国名列前茅，亚麻织品在全国是“独生子”。生产的大批成套发电设备供给国内二十多个省、市，有的机电产品远销世界五十多个国家。我们要注意发挥大城市的作用，但是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不能再盲目发展，要控制。大中小城市（镇），要有一个梯次、纵深的配备，有比例地合理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大城市的作用。

以上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城市经济搞得好坏，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也更加说明，我们研究城市经济，繁荣城市经济，是符合客观实际要求的，是投资少、见效快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路子。

研究城市经济，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马克思说：“消灭城乡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第57页）。我们研究城市经济，从根本讲，就是要发展城市经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为消灭城乡差别这一长远目标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实现“社会统一”的共产主义战略目标。但是，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条件，还远远没有达到消灭城乡差别的程度，必须通过不断的长时期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当然，我们要有一个长远观点，就是说从现在起不要再造成城乡对立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限制大城市规模，适当地发展小城市（镇）。

作为城乡差别这个事实，还需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城市也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实体。不顾客观实际，“单靠意志”去搞什么“城市向农村看齐”那一套，急于搞消灭城乡差别的“穷过渡”，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是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

现在，城市经济工作还面临着一个改造城市的问题，研究城市经济要研究城市的改造。过去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造成城市建设比例失调，使城市的某些方面出现恶性循环，问题很多。为什么城市规划很困难呢？就是因为几个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那里摆着，这些问题不解决，城市再发展就更为被动，恶性循环就更加严重。例如用水，本来水就不足，城市人口再增加，工业再发展，水就更不足了。能源本来就不足，你盖了那么多房子，要那么多照明，能源就更不足了。很显然城市结构需要改造。现在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生产、生活的比例，生产、消费、生活、文教的比例，这些东西都要调整，需要改造。城市工业面临着技术改造的问题。建设一百五十六项工程时，都是五十年代的最新技术，现在是八十年代了，我们还是三十年一贯制，设备精度已失掉了，产品质量还没有“升级换代”。要通过经济改造、技术改造，使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按比例发展，以解决现在存在的城乡关系等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城市经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目前，城市中除了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外，一个更为突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城市数目增多了，人口增加了，规模扩大了，而经济效益却反而下降了，从而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我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矛盾就是“优势大，效益差”。经济效益不但落后于全国，也低于我省曾经达到过的水平。一九八一

年同历史上最好的一九六六年相比，地方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户数由九百六十三户增加到一千七百七十九户，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点七，工业总产值由四十二亿九千万元增加到七十九亿七千多万元，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点九，但利润总额却由七亿三千九百万元减少到四亿七千多万元，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亏损总额由五千一百万元猛增到二亿七千万元，增加四点二九倍。从单项指标上看，百元产值实现利润由十四元八角下降到五元九角五分，百元产值成本由七十六元二角上升到八十六元一角四分，百元产值占用资金由二十九元七角上升到四十六元四角三分。哈尔滨市的经济效益也是比较差的。一九八一年在全国十五个中心城市的位次是：工业总产值（一九八〇年不变价格）五十一亿二亿元，居第十位；地方财政收入六点二五亿元，居第十二位；全民工业利润总额三点九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一万零三百二十二元，居第十三位；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总产值为八十一元六角，居第十四位。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利润为八元，每百元总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四十六点九元，均居最后一位。以上可见，经济效益差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解决我省经济效益差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城市经济效益差的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到底怎样提高城市经济效益呢？这就需要大家共同下大工夫，花大气力去研究探讨，寻找出有科学论证的最佳方案。这显然和比例调整、结构改革，特别是技术改造关系极大。只有提高了城市经济的效果，城市才会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去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中心作用真正发挥了，才有可能谈到逐渐地达到消灭城乡差别这一长远目标。我们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将来城市是个什么样子，还需要我们今后进行实践和论证。

明确城市经济研究的方向和任务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科学。我国对于城市经济的研究是从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被广泛重视起来的，这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提出的新课题。要开展好这项研究工作，在深刻理解它的重要意义，提高认识，充分重视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好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指导思想 and 主攻方向，二是明确攻关的主要任务。

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城市经济的实际，动员和组织一切科研力量，抓住对城市有重大影响的经济问题，有效地开展研究工作。国务院领导同志最近在讲到科研工作时指出：“要把屁股放在应用科学上。”城市经济科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科学，更要注意把屁股放在应用上。我认为，这应作为我们研究城市经济的具体指导思想。当然，强调“应用”并不是说基础理论性研究一点也不搞，搞一点也是需要的。这里主要讲的是要把重点放在应用上。大家想一想，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不为国家经济建设实际、省的经济建设实际、市的经济建设实际服务，还会有什么生命力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我国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提出要走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果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在涉及到城市问题时强调要“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这就是城市经济研究应该遵循的正确方向和基本任务。按照这个方向要求去做，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生气勃勃，成果卓著，如果背离了这个方向，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劳民伤财，一无所获。我们研究城市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城市经济发展

的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就是要使生产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就业能够解决，积累能够增加，城市的文化科学比较进步，城市的环境比较好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效果。摆脱那种越弄越紧张，越弄越矛盾，纠缠不清的恶性循环，求得一个良性循环，这就是我们研究城市经济的目的。有的同志说，你不要引用“良性循环”这个说法，这是外国语言，用到中国不一定合适，可是你讲经济工作，生产、消费、流通，再生产、再消费、再流通，它本身是个循环，不是说随便引用外国的名词。有人议论“第三产业”用不用？“第三产业”不用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它的概念是指服务行业，这是比较清楚的。当然和资本主义那种混乱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它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放进去，把军队、政府也放进去，我们当然不赞成这种观点。有时引用一些现成概念说明问题嘛！经济本身是个运动，经济本身有个循环，不承认是不行的。我们研究城市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协调的、发展顺利的良性循环的道路，从而带来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就业的解决、积累的增加、文化科学的进步和环境的良好。城市经济研究工作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结果。

城市经济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结合我省城市，特别是哈尔滨的实际，急待研究的问题，突出的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从我省情况来看，省委、省政府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很重视的。在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把我省逐步地建设成以商品粮为主、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基地；以食品、纺织为重点的轻工业基地；以营林为基础、木材综合利用为重点的林业基地；以发展煤炭、石油为重点的能源和化工基地；以调整机械工

业服务方向、发展建材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基地。我们必须从全省建设和发展“五个基地”的战略出发，确定我们城市经济研究的战略目标。实践证明，作为一个城市，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有一个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战略。所谓发展战略，应包括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措施和手段，其特点是带有全局性、具有相对地长期稳定性。当前，所以要调查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主要依据有两点：第一，是由城市经济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大家知道，城市是一个由许多经济部门、非经济部门构成的复杂的有机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因此，根据城市这一特点，我们应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的研究。它不同于部门经济，而是搞长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研究。例如：哈尔滨市总体规划、城市性质、发展方向、应起的作用，城市规模，城市国土综合开发，城乡结构、卫星城镇的建设，城市现代化管理，城市经济综合效益等问题都需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并根据我省和哈尔滨市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及市场优势等，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确定我们的步骤，明确第一步抓什么，第二步抓什么，第三步抓什么，每一步所要达到的目标，最后达到的总目标。上述这些重大的问题，很显然任何一个城市部门承担都是有困难的，需要我们从城市经济研究的专业的、业余的、实际的工作者，以至整个经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和经济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努力去完成。第二，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城市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城市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失调，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当然，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下了很大决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城市情况有了很大好转。这个好转，还需要总结，现在

我们有了很大成绩，这个成绩的意义、概念和它发展的趋势还需要很好地研究。几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积极地解决城市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效果的，但是，从长远看；光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是不行的。如提高城市经济效益的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控制人口问题等等，都需要全盘考虑，从经济、社会、技术结合上去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彻底根除。否则，只去由主管部门或单位去解决，由于工作业务范围及权限的局限性，结果，从一个部门，从眼前看也可能有好处，若从全市、从长远看可能是有害的，战役上打了个胜仗，在战略上却打了败仗。过去几十年，在城市经济建设上，这方面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经过研究和论证，城市经济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措施，选择出最佳方案之后，我们解决城市现实问题就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减少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问题解决之后的效果就会既有利于眼前的利益，又有利于长远利益，既有利于局部，又有利于整体，从科技、经济、社会三结合上收到好的综合效益。可见，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十分重要，它是关系到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花力量，把这件事做好。

城市经济当前急待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问题。这是领导上针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提出的问题，也是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课题。以城市为依托的经济中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全国有全国的经济中心，省、地、县也都有自己的经济中心。各类经济中心在不同的经济区域范围内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大的经济中心所依托的大城市，即中心城市对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但是，由于现行的“条条”、“块块”的经济管理体制上还有

些问题没有解决，城市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城市同所在区域的内在经济联系没能很好沟通，限制和影响了城市中心作用的发挥。当前，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关键是要调解“条条”、“块块”关系，使城市经济结构合理化，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相结合，加强城市内部部门之间、城市同区域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周围区域经济的发展。哈尔滨是国务院确定的十二个中心城市之一，通过什么渠道，用什么方式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怎样充分地发挥中心作用，确实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哈尔滨在历史上就是“北满”的经济中心，油、酒、米、面、木、铁、皮等加工工业中心，商品物资集散中心，曾一度成为东方的国际贸易城市。这个经济中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有什么特点，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和过去比，哈尔滨经济中心的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作用发挥了，哪些可以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应该怎么去解决，好好研究一下是有现实意义的。还有建国三十多年来，在认识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同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关系；同发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规模，消灭城乡差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城市经济作用的思想理论等理论和实际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应当充分肯定城市工作解放以来有很大成绩，但是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重生产、轻生活；重生产、轻流通。单打一地发展生产，城市建设跟不上，造成水紧张，电紧张，交通、住房紧张等许多问题，留下许多欠账。过去由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识不清，搞计划经济经验不足，不从实际出发，重视生产，不重视流通，一切都要统一计划，工厂里的供、产、销，只管产，供和销完全靠调拨会议，完全靠上边来统一解决，不考虑市场需要，因

而经济工作越搞越死，问题越来越多。重生产、轻流通的问题，就我们自己讲也是通病，在我们思想上突出地反映了一个“急”字和一个“怕”字。急，就是急于消灭城乡差别，急于搞共产主义。怕，就是怕商品生产，怕商品交换。这些思想，给我们城市建设遗留了许多问题，是需要总结的。

城市经济涉及到的范围很广，问题也很复杂，我们应从客观需要和我省城市实际出发，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挥城市中心作用这样两个问题上。当然，在这两个大题目下还需要分出具体的研究课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力争在这两个问题上能有所突破。我们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要研究怎样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到底有些什么优势；我们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要研究合理的比例，研究良性的循环，研究合理的经济群落。周总理过去给大庆提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这是指大庆那种在农村的基础上，在农村的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怎么建设大工业，而提出的方针。在我们哈尔滨的城市建设中也同样可以研究。我们国家正处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把经济搞活，这个政策我们是要坚持的。当然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当中，现在看到，这里就会同时产生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斗争。城市本身就有许多地方需要调整，需要改革。特别是大城市，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上，由于各个城市情况不同，程度也不相同。例如对外开放，广州的开放，深圳的开放和哈尔滨的开放就有很大区别。上海、天津、大连的开放，同沈阳、长春、哈尔滨的开放，也有区别。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当中，要结合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和反对极左思潮残余影响的斗争。当前在城市经济工作中，第一，生产

的技术改造刻不容缓；第二，流通渠道里市场的组织、市场的开拓和市场管理也成为迫切的问题；第三，社会条件、市政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服务工作、住宅建设、学校建设、就业训练也成为我们城市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应具体研究加以解决。重大项目里边还有具体项目，譬如怎么节约用水、怎么节约能源、怎么进行技术改造，这里面都有好多问题。这就是应用问题的研究。这样每一个具体项目的解决，给我们城市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本文是作者1982年5月17日在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城市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摘要）

以现代化观念认清哈尔滨的战略地位

一、要认清哈尔滨的地位和作用

这个问题，很多同志都谈到了，不少同志对于哈尔滨这个省会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是有认识的。但我感到还有反复强调的必要。一是要看到哈尔滨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在全省经济发展中有很强大的辐射力和聚散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哈市工业总产值大约占全省的 $\frac{1}{4}$ ，利税占 $\frac{1}{3}$ ，社会商品零售额占 $\frac{1}{2}$ ，外贸额占 $\frac{1}{4}$ 。这说明，哈尔滨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将直接影响着全省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如何充分认识哈尔滨的这个作用，发挥这个作用，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二是要看到哈尔滨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哈尔滨经济技术基础雄厚，是国家的重要的机电工业基地之一，国家很多骨干企业在这里，“三大动力”、轴承厂、东北轻合金厂，等等。很多产品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哈尔滨居东北北部，交通发达，资源丰富，很多条件是其它一些城市所不具备的。哈尔滨有很大

潜力，扬长避短，在国内是有市场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我们的优势，利用我们的优势，发挥我们的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三是要看到哈尔滨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在哈尔滨的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的高精尖特产为其它地方所没有，在国际上也是有竞争力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和发展？

认识了哈尔滨在省内、国内、国际上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才能更加自觉地发挥这种作用。如果对这个作用麻木不仁，就会妨碍这个城市的迅速发展，就只能处于盲目的发展状态。

二、哈尔滨市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一个逼人的形势

三中全会以来，哈尔滨市的经济的发展很快，1983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将近66亿元，比上年增长9.7%。这个速度应该说不慢的。问题是全国一些先进城市发展更快。从目前看，全国很多地方改革的步伐很快，变化很大，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迅速发展，一方面向内地城市提供经验，可以学习；一方面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利用这个新的变化，适应这个新的变化，促进自己生存发展的问题。现在，省里把一些企业下放给市里了，商业也进行了改革，哈尔滨成立了贸易中心，产销直接见面，我们在城市改革中也迈出了新的步子。哈尔滨是我省的省会，哈尔滨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省的水平。哈尔滨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担子很重。在全国城市改革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把哈尔滨的经济发展战略论证清楚，明确方向和重点，抓准突破口，大踏步前进，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因此，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形势，跟上形势。要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研究好

发展战略，抓住当前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迅速加以解决，才能打开新的局面。我们应该把务虚和务实结合起来。在改革中，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和创造。

三、哈尔滨的长远目标是建成我国国际贸易中心之一

东北地区南有大连、沈阳，（特别是沈阳起了全东北的中心作用）北有哈尔滨。从全国范围说，有人主张要有雄心壮志，要南有广州，北有哈尔滨。我看也有道理，可以设想，可以研究，要从这个战略目标考虑问题。论证中要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不仅要看到几年后的哈尔滨，而且还要看到二十年后的哈尔滨。哈尔滨过去是著名的国际城市，大家都熟知叫做“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本世纪初，俄国和日本就看中了哈尔滨这个战略要地，很多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在这里开工厂，办洋行，有28个国家的外侨14万人，有20个国家在这里设领事馆，把哈尔滨和世界很多名城如巴黎、伦敦、华沙、莫斯科、纽约、东京等联系起来，中东路可以预订全球客票。当然，那时是在殖民地的情况下，但是，这些历史启发我们，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人为什么看中了这块地方？为什么能搞得那么活？还不是说明哈尔滨在国际贸易中有它优越的战略位置和条件吗？解放以后，经过我们30多年的建设，哈尔滨市已经由本世纪初的20几万人口增加到200多万人口，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随着国家和我省对外开放，哈尔滨更有条件建设成为国际城市。三中全会以后，哈尔滨很重视对外联系，与外国建立了商业联系、工业联系，进行了技术交流、文化交流，在开放、外事、外贸工作上出现了新的局面，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还应该进一步发展，更积极、更主动一些。我们有资源，交通发达，有陆路、水路、空港，有对苏开放的三个口岸，还可

利用大陆桥，通过铁路航空运输与中亚、东欧联系起来，利用朝鲜的清津、罗津等港口，和世界上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联系起来，将来随着与欧洲各国经济往来的逐步发展，以哈尔滨为中心，发展全省的经济，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哈尔滨也必然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名城，进一步增加她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哈尔滨要看到这种趋势，认识这种趋势，发展这种趋势。黑龙江这块宝地，资源如此丰富，哈尔滨这颗珍珠，早被世界很多人所瞩目，我们不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因此，说南有广州，北有哈尔滨，并不是一句空话，应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当然要经过相当一段的努力，因为差距已经拉开得不小了。

四、哈尔滨地位重要，前景良好，应当有雄心壮志

目前，从何入手，加速发展，寻求最佳方案，这也是许多同志研究的问题。（1）哈尔滨开展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这是当务之急。城市的经济结构必须改革。原有的各种不利于四化的条条、框框，必须坚决改革。国家已有许多安排，哈市应力争走在前列。（2）哈市有很多大中小工厂，特别是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目前，希望再象以前那样大量投资新建工厂也是不现实的，而且时间要长，当务之急是对原有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既是这些工厂提高质量，更新换代的迫切需要，又是比较容易的走提高内涵的道路。对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十分必要。因此，在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同时进行技术改造是非常重要的。（3）更新技术进行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是目前世界上面临的新形势。引进新技术、新装备，是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新技术、新的生产线，正是进行技术改造的重要内容，这样花钱少，见效

快，可以总结已有的引进经验，多方打开引进的渠道，进行技术改造。（4）哈市的优越条件，不仅有交通地位、原有经济基础的优势，还有人才的优势。这里有全国有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船舶工程学院，还有门类较齐全的东北农学院、林学院、商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电工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还有综合性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特别是哈尔滨市还有123个科研所，其中中直所就有16个。他们的科研条件都是很雄厚的。依靠这些大专院校和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的条件，可以使哈市成为科研生产结合型、知识密集型的新型城市。（5）哈市要起全省经济中心作用，必须搞好商品流通。现在正在进行的商业体制改革，成立起各种新型的贸易中心，必将对繁荣市场，发展哈市第三产业，对全省经济起促进交流、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作用。哈尔滨市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全省服务，为全东北地区服务，以及面向全国为全国服务。

（6）哈市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不仅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特别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哈市历史上精神文明建设也有自己的特点和成绩。今后要在整党、社会风气、文化艺术、城市建设、卫生绿化等各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中创造新的成绩。哈尔滨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全国有名的几大城市之一。现在全国这类城市大多都恢复了在国家计划中直列地位。哈市如果能争取到在国家计划中直列的地位，对今后的发展会是一个极大的支援和帮助。

五、学术界要在哈尔滨以至全省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前是我们学术界大显身手的时机，是大有作为的时机。城市经济科学，是一个新的科学。过去我们偏重于抓农

村，对城市如何科学地迅速地发展缺乏经验，需要研究探索，创立起各个新的学科。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城市建设的经验，把这些经验与我们的国情、省情、市情结合起来，研究我国城市发展的规律，研究象哈尔滨这样一个中心城市，如何发挥她的中心作用、辐射作用，对促进和发展全省星罗棋布小城镇建设的作用，从而创立我国大中小城市结合、城乡协调发展的学说。哈尔滨要起带头作用。全省15个市、几十个县团结协作，共同研究探讨，交流经验，相互促进，使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成为互相依靠，互相贯通的地区经济网络，成为一潭活水。研究城市经济的同志，要拿出这方面的成果，省直各部门要积极参与这些研究工作，积极支持，把城市经济的科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为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此文是作者1984年8月2日致哈尔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贺信的摘要。）

第三部分 农业经济

关于海伦县农业现代化试点情况

为了搞好农业现代化，中国科学院去年下半年在全国确定了三个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一个是地处我国南方的水稻高产试验基地湖南省桃源县，一个是地处华北平原的粮棉高产试验基地河北省栾城县，一个是地处东北松辽平原人少地多的机械化试验基地我省海伦县。现在，以海伦县为基地县已经筹建了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开始组织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一些专家和科技人员，对全县的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考察，初步提出了实验规划。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经过了一个周期。海伦县在现代化实验中，成绩是不小的，变化是喜人的。

一、四个实验点有了新变化

按规划县委确定在四个公社的百发、丰胜、荣兴、保卫四个大队实验，经过一年的实验，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一是耕种和运输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四个大队原有七台链轨拖拉机，六台胶轮拖拉机，十台手扶拖拉机，五十五台件农机具。今年新增加了六台链轨拖拉机，十九台胶轮拖拉机，十一台手扶拖拉机，四台联合收割机，七十一台件农机具。现在，除中耕、苗间除草和高棵作物收割之外，翻、

耙、种、麦收以及打场和运输，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由于机械化了，不是一般提高了生产效率，特别重要的是解决了耕作关键时刻不误农时的问题，而且创造了机械追肥、中耕深松等新作法。四个队今年春耕缩短播期十至十五天。七、八天种完小麦，十天左右种完大田，而过去要种二十天到一个月。秋收做到了随收随打随送，减少了田间粮食糟损，为丰产丰收创造了条件。过去农民对机械化不托底，怕“一枪两眼”，被机器咬着。现在他们尝到了甜头，心里有了底，四个队把大部分马匹卖掉，换成牛。社员们高兴地说，铁牛加黄牛，一步一层楼。

二是劳动组织和领导方法改变了。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四个队都调整了劳动组织，改变了过去那种“卯子工、大帮轰”和“上工一窝蜂，临时现点兵”的状况，组成了机耕、积肥、农建、养殖、林业、工业、副业、运输等专业队伍，实行人有专职，长年固定，按劳计酬，有奖有惩的制度。在领导上开始实行了战线分工，专职专责的办法，正在改变过去分片包干、一揽子抓的制度，适应了机械化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提高了劳动效率。

三是林牧副业发展了。四个队都开始把机械化节余下来的劳力用到了发展林牧副业上。四个队都抓了植树造林。保卫大队和荣兴大队建立了苗圃。保卫大队种落叶松一千二百一十六亩，加上一百零五亩自然林，平均每户占有十四亩，每人二点三亩。四个队集体养猪都有增加，还新发展了养奶牛、奶羊、鸡、鹅、兔等。四个队仅黄牛、奶牛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八头。

四是四个队都增加了收入。在今年灾多灾重的情况下，百发、丰胜两个队的总产量超过了大丰收的去年，荣兴大队的总产量相当于去年；保卫大队因为遭到从未有过的巨大雹

灾，总产量比去年减少四分之一。由于机械化和工副业的发展，成本降低，加上粮食加价，百发大队总收入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丰胜大队增长百分之三十四，荣兴大队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保卫大队虽有减少，因为林业、工副业的收益，总收入仍增长百分之十三。农民的个人收入比去年又提高了不少，预计四个队人均收入：百发大队去年一百三十一元，今年一百六十九元；荣兴大队去年一百四十二元，今年一百五十三元；丰胜大队去年一百一十二元，今年一百三十七元；保卫大队去年一百二十四元，今年一百三十四元。

这四个实验队的上述情况说明，他们从机械化入手，主要是先搞田间作业和运输机械化，也就是先搞部分的、有选择性的机械化，由于机械化的进展，促进了林牧副业的发展，促进了劳动组织和管理上的进步，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农民自觉接受，热烈欢迎。因此，这种逐步机械化，进而有步骤、有重点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符合我省农村实际情况需要的，这是一条行得通的道路。当然，从机械化入手，并不是排斥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农业现代化，除了机械化，还有水利化、化学化、良种化、园林化、电气化、专业化、区域化等等。现在海伦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正在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在抓机械化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把其他方面逐步开展起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四个队的实验，对全县的影响是很大的。农民们看到这几个队搞机械化、现代化的优越性这么大，积极性都来了，也迫切要求实现机械化、现代化。全县许多大小队暗地里下决心，不要国家投资，同四个实验队比着干。到今年年底，已有四十一个大队接近了四个实验队。全县今年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夺得了相当于去年的大丰收。去年总产九亿五千万斤，今年总产九亿六千万斤。每个社员

平均收入一百二十元到一百三十九元，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一。在集体收入增加的同时，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也增加了。现在二线劳力在队里没活干，就在家里养猪、养羊、养鹅。他们初步统计，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已占集体收入的三分之一，有些农户已经达到或超过二分之一。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又加快了实现机械化、现代化的步伐。这个县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见到拖拉机，到去年，二十七年，大中型拖拉机发展到八百台，而今年一年就买了大型链轨和胶轮拖拉机四百零四台，等于原有的一半。前几年手扶拖拉机没人愿意买，今年一次就买了三百五十台。农民打场用手扶拖拉机，不但比牲畜效率高几倍，而且大量减少了粮食损失。因为胶轮和手扶拖拉机的增加，农民对减少马匹和代替马匹增强了信心。在四个实验队的影响下，全县的畜牧业正在迅速发展，出现了换牛养牛热潮。今年全县黄牛已发展到一万八千头，奶牛五百二十九头。奶山羊发展更快，今年比去年翻了一番。去年九千头，今年一万九千头。现在他们生产的山羊奶粉，质量好于牛奶粉。这种情况又说明，虽然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但也决不是遥远无期的。只要我们积极努力，有重点有步骤地抓好，一个迅速而又逐步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即将到来，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二、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实现机械化、现代化，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难关。这里的干部群众和科研人员，经过一年的实践，感到这些难关是可以战胜的。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工作会议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农业区划，并按照农业区划，制

订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扭转单打一搞粮食的现状，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二是实行农工商一条龙，建立合理的农村经济结构，解决农业现代化的资金来源和机械化过程中多余劳动力出路。三是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全面武装农业，建立一个先进科学技术体系，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威力，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四是在有选择的机械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面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的主要生产环节都用机械装备起来。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在这些方面，他们都已经有了一些收获。

第一，资金问题。这是农业现代化的重大难关，我们国家底子薄，拿不出多少钱，怎么办？还是要靠农民自力更生。四个队国家科研部门只扶助了六十万元，主要是靠农民自己积累，把机械化搞起来了。这四个队提出，从今年起要分期把用国家的钱还回去。保卫和丰胜两个大队提出今年还一万元，百发和保卫大队还表示争取明年全部还完。同这四个队比着干的红旗公社东风大队，已经用七年的时间还清了过去十三年欠债，用自己的积累装备了四台链轨拖拉机、四台胶轮拖拉机、三台手扶拖拉机和四十八台件农机具。他们表示，坚持自力更生，用一、二年的时间赶上四个实验队的水平。这样，有四个实验队趟路，有四十到五十个自力更生比着干的大队，已占全县大队的百分之十，成为推动全县实现机械化、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技术队伍问题。他们采取了短期培训，以老带新的办法，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年青的技术队伍和管理队伍。现在各种专业队里，如机耕、畜牧、林业、工副业和科研等专业队伍里，都有一部分技术员和技工老师傅，大队里技术队伍已逐步形成。他们说，现在不愁有车没人开、有事没人

管了。这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管理基础。当然，这只是低水平的，按现代化要求还差很远。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业科研和教育十分重视，他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起主导作用的是科研和教育，其次才是投资。据说，美国农业产量增长的百分之八十一，生产效率提高的百分之七十一归功于科研。把农业教育称作“智力投资”，是无形的巨大的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大力培养科技人材，当前应把农村的一些普通中学改成农业中学，为农业培养农机驾驶员、农业技术员、会计员等技术骨干，以适应农业现代化需要。

第三，两套成本问题。这个问题是长期没有解决，影响机械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次试点中，年初时还有许多农民担心两套成本“一枪两眼”，现在他们不担心了，急着把马换成牛。四个队计算，使用机器成本虽高一些，但由于效率提高了，生产发展了，社队积累和社员分配也增加了。丰胜大队总结这一年的变化是“三变、三增、三提高”。三变：动力变了，买了七台拖拉机、一台联合收割机、十五台件农机具，七十八匹马已卖了四十八匹；耕作方法变了，闯过了用机器施肥、封垅、播种、割小麦四道关，播、耕、割、拉、打，全部机械化；劳动组织变了，建立了机耕、积肥、养殖、工业、副业、苗圃等专业队，实行了生产专业化。三增：产量增加了，人均产量去年一千六百零四斤，今年一千八百二十八斤；收入增加了，总收入比去年增加十一万元，提高百分之三十四；积累增加了，公积金去年七万五千元，今年九万六千元，公益金去年六千元，今年二万二千元。三提高：商品率提高了，今年平均每个劳力卖给国家的粮食比去年提高一点三倍；社员收入提高了，去年每个劳动日一元一角，今年一元七角；群众觉悟提高了，过去怕机械

化花钱不得利，现在人人夸机械化，决心大干现代化。现在他们已经把大部分马匹处理掉，明年基本上可以实现把两套成本变成一套成本了。因为今年车进的晚，马卖的晚，还看得不明显，明年就可看得更清楚了。

第四，秸棵还田问题。因为海伦这里缺少煤、木等能源，农民日常生活主要靠烧秸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大力推广沼气。胜利公社在百发大队两个生产队建了七十多个沼气池，七十户人家用沼气点灯做饭，解决了大半年烧柴问题。共和公社也在一个小队全面推开。全县今年新建了沼气池二百多个。同时，他们还在有条件的地方大搞薪炭林。东风公社保卫大队一户划给三亩薪炭林，准备达到每户六亩，每年轮用两亩，可解决全年烧柴问题。这样就给秸棵还田，种地养地创造了条件。这些年来，由于乱伐森林，破坏草原，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近几年连续干旱、水土流失、农田沙化、灾害不断，除了大气环流的影响，是同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有直接关系的。现在他们大搞植树造林和逐步争取秸棵还田，不仅经济上有收益，对于恢复生态平衡也会起很大作用。

三、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海伦基地县头一年的试验，还提出了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 作物主产区问题。海伦的试验，是在省里划分积温带作物主产区，以及推行机械化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省里帮助创造条件，用了一些科学实验费，从机械装备上武装了四个公社的四个重点大队。科研所进行综合考察，帮助海伦县对全县的农业状况进行综合调查研究。这里同全国其他基地县比较起来，有着不同的特点。桃源县在我国的南方，

温度高，无霜期长，主产稻谷，一年二熟。栾城县在我国的华北，全部水利化，日照时间长，主产粮棉，一年两熟。而海伦县则是北方黑龙江的特点。耕地面积大，无霜期短，全县可划分二至三个不同的积温区，种植不同的作物，东北部豆麦为主，西南部苞米为主，中间则小麦、苞米居多，大豆就不太适宜。而在桃源、栾城就没有这种区别。同时，我们强调机械化，而桃源和栾城因为劳力更多，单产较高，有的甚至号称“地过三千”，他们对于机械化的要求就不象我们这样迫切。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我们的试验，应该把我们的特点突出出来，认真解决好。

（二）全盘机械化问题。现在，海伦县四个大队的试验，在机械化方面，还只是有选择性的部分机械化。要实现全盘机械化，还有许多问题必须解决。就机械本身来说，同农场和开荒点全盘引进的机械不同，我们的机械有的质量可以，有的不太好使。如龙江六号播种机太重，使用不便，联合收割机有的四平产的不断出毛病，有些拖带农具还不配套。特别是收获机械，因为海伦地区烧柴困难，高棵作物要保留秸棵，而适合实际需要的收割机还有待进行科研创造。至于全盘机械化剩余下来的劳动力的安排，就更是突出问题。现在部分机械化，有的二线劳力已经派不出工了，海伦四个大队正积极搞养、种、加，兴办社队企业，为剩余劳力找出路。全盘机械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剩余劳力，对这些劳力的安排，要有一个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而把农林牧副渔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起来的发展过程。所以象海伦县这样的地方，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要同发展多种经营步调配合起来。海伦县虽是试验基地，但机械化的进程不一定会走在农场和其他条件好的地方之前，这对全省来说也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尽力抓好，为全省提供更多经验。

(三) 中间试验问题。农业现代化综合研究试验，既有许多土壤、肥料、农机、水利等方面的科学项目需要研究突破，同时大量的中间试验，已有经验、已有成果在大面积推广的任务。当前在土壤普查、良种培育、因地制宜、水利建设等方面，应狠抓落实。

(四) 体制问题。机械化、现代化，迫切要求工农商一体化。就当前说，突出的矛盾在商业。农民要求把供销社快点放下来，并把地、县、公社贸易货栈建立起来。农产品多条流通渠道，粮食、商业、供销、外贸、轻工还有不活、不便甚至矛盾之处。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机械化前进了，劳动组织变了，小队发展有的不平衡，队与队地块之间的界限不适应了，需要调整，这些问题也要研究解决。

(五) 各方支援问题：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林牧等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而且是农业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党政群、农工商的全面协同的任务。对于基地县的试验，各方面都应积极支持。就一些具体方面说，当前各种机械越来越多了，缺少零件，缺少修配力量。他们希望城市工业部门主动给生产配套，商业部门主动给组织供应。现在农民养牛、养羊、养猪的积极性起来了，就是缺少好牛种、好羊种、好猪种，迫切希望外贸部门和有关部门及时帮助解决一些。过去说“马牛羊鸡犬豕”，实际上畜牧学家主张应当六畜以牛为首发展畜牧业。现在经过价格刺激，养猪正是高潮。牛羊不吃粮，牛羊肉含蛋白多，营养丰富。要大力发展肉牛、奶牛和肉羊、奶羊，加快饲养周转，提高商品率。应当从价格等各方面鼓励养牛，养羊，把养牛、养羊业更快地发展起来。

(六) 文化生活问题。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济经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现

在第一线的农民绝大部分已经是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农民。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劳动要紧张，生活要愉快，要有适当的学习环境和娱乐条件。现在许多青年农民是骑着自行车下地，有些生产队百分之八十的青年农民手里有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将逐步成为他们的必需品。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迫切的，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设法逐步满足。

海伦县的试验，今年是刚刚开头，以后在实践中还会摸索出更多的经验，更加深入地反映出对各方面的要求，为全省的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

原载1979年54期《经济问题研究资料》

从海伦基地县的实践谈如何搞农业现代化

搞农业现代化一定要靠科学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据农业发达国家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来实现的，不足百分之二十，而现在是在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我省农业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也是分不开的。五十年代，查明了我省小麦锈病的生理小种和流行规律，育出了小麦抗锈品种，使日趋减少的小麦生产面积，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六十年代培育和推广了玉米双交种，七十年代耕种技术又有了发展，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经过长期提倡和推广，对全省粮食产量的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经验，农业发展离不开政策，也离不开科学。在全国五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赵紫阳总理报告中提出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把“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发展”作为第一条。正确的政策本身也是科学，是处理好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生产

发展的社会科学。海伦被国家确定为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以来，已经三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是进行科学实验的准备工作，真正的实验仅仅是刚刚起步。尽管如此，也可以初步看出农业靠科学的威力，使海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一是在生产的领导指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验证明，农业生产的领导和指挥如何，这是农业生产能否迅速发展的决定性的关键问题。海伦的同志在这方面就有许多体会。过去县委、县政府的一些领导干部和许多社队干部，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海伦通”，领导指挥生产有把握。三年的科学实验，经过考察、研究、总结，他们感到过去对海伦的了解还是皮毛的。特别是按照中国科学院的要求，集合东北各地和我省大批专家，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二十多个学科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农村经济调查，把全县的地上、地下、历史、现状全查了一遍之后，觉得过去领导和指挥生产没有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是有时违背客观规律、造成一些失误的重要原因。例如，过去为了提高单产，违背自然规律，搞越区种植，有时碰对了，落个自老山，碰不对就落个大减产。这几年，他们按照科学要求，根据专家建议，划分主产区，调整作物比例，改革耕作方法，推广现代技术，就比较稳产增产了。去年按照主产区的自然特点多种了大豆，获得丰收，为国家交售大豆一亿一千多万斤，创造了历史记录，居全省第一位。

这几年，他们在综合考察基本搞清了本县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搞清了发展农业的优势和劣势，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基础上，制订了发展规划，提出了可行性措施，把指导生产发展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这就克服了不少盲目性，提高了准确性和自觉性，使生产的领导和指挥开始有了不少

主动权，为指导农业走向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是在农业生产的发展战略思想上开始发生变化。同许多地区一样，长期以来，海伦农业生产经营，一直是在传统农业的老圈子里打转转。搞的是小农业、狭义农业，“以粮为纲”，搞单打一的粮食生产。这也是海伦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年来他们在科学家们的帮助下，农林牧副渔都有了新的发展，逐步突破了传统农业、狭义农业的圈子，走上了大农业、广义农业的道路。

三是在农民的经济收入上发生了变化。靠科学发展了生产，这就带来农民生活的改善。海伦县人口八十多万，在省内是第二大县。过去家底薄，人均收入多数年份是八、九十元。这几年科学实验加上政策上的调整，农民得到了实惠，在增加集体积累的同时，人均收入连年增加，去年集体部分，全县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元八角。这里尚未包括全县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受奖部分。特别是百发、丰胜、保卫三个有代表性的科学实验点，在科学家们的直接指导下，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社员群众的收入增加得更快，原来集体分配部分人均都是一百二十多元，近两三年都达到二百元左右，加上家庭副业收入，人均都超过了三百元。这些队三年来也不是都没遇到灾情，有的受灾还很重，其中丰胜大队，一九八〇年遭到历史上少有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粮食几乎绝产。一九八一年省农科院的同志和大队干部、社员共同研究，调整了作物比例，采用了良种和一些先进技术措施，获得了大丰收，总产、单产、总收入、人均收入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留完“几留”，还清债务，集体分配人均二百四十多元，加上家庭副业，人均达到三百元以上，还未计算超产得奖部分的人均收入。靠科学发展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农民富裕的必由之路。农民亲眼看到了“科学致富”、

按科学办事的好处，搞农业现代化的信心和劲头就更足了。

搞农业现代化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子

海伦是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之一，担负着探索东北松嫩平原等类似海伦这种地区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搞农业现代化，就得打科学技术仗，就得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改造和武装我们的农业。这个仗怎么打，开始省、地、县领导心里都没有底。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海伦本地地区的实际出发，走出我们自己农业现代化的路子来。

海伦全县土地面积六百六十万亩，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带之一的松嫩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国营农场，耕地有三百七十六万亩，百分之八十八是有机质含量较高的黑土和碳酸盐草甸土，人均占有耕地五点四亩。全县有林地七十八万亩，荒地七十四万亩，水面十八万亩，具有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的优越条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影响，搞“三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搞基本路线教育，“割尾巴”，孤立地搞粮食“一口咬”，盲目追求粮食数量，不讲究经济效益，以致总产不高不稳，几次出现大上大下，增产速度很慢，每年平均粮食只递增百分之一一点七。由于长期施肥不足，种植不够合理，水土流失严重，致使土壤有机质逐渐下降，养分、水分收支不平衡，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

三年来，在中国科学院、省地县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动员了干部、科学家和广大农民群众，搞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由点到面，不断实践、研究、总结，克服种种困难，现在已经摸出了一点门路。

海伦的三年科学实验，开始从小农业、狭义农业，走向

大农业、广义农业，就宏观和整体上来说，概括起来是十二个字：“农林牧、种养加、农工商、科教文”。这十二个字体现了农业现代化在生态平衡、生产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条件各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综合发展，反映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科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所谓农林牧，是建立比较合理的生态结构。三年来，海伦按照“综考”的建议和省委的要求，纠正了过去只注意抓粮食，忽视发展林业、牧业的偏向，调整了农业结构、作物布局、农林牧的比例，使农业、林业、牧业相互促进，都相应地发展起来了。搞农业现代化实验以来的三年和前三年相比，每年平均粮豆薯总产增加一亿一千八百七十八万斤，增长百分之十四。前年和去年造林二十万亩，覆盖率一九七九年是百分之四点九，一九八一年是百分之八点九，今年要求到百分之十一。奶牛、奶山羊和猪的数量也都有了发展。这样，农林牧的比例就发生了合理的变化。农业比重相对减少了，林牧业比重相对增加了。一九七八年，农业产值比重为百分之八十四点九，林牧副渔的比重占百分之十五点一，一九八一年农业产值比重下降为百分之七十六点五，林牧副渔比重上升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这样，农业内部结构有很大调整，自然生态起了变化，加上搞了农作物轮作、布局和种地养地试验，开始创造了实现初步良性循环的条件。

所谓种养加、农工商，是建立比较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农村发展养殖业，种植经济作物，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海伦资源丰富，是省内主要的甜菜、亚麻、马铃薯、乳品产区，又拥有大量的劳力，具备发展种养加的优越条件。但是，三十年来，家庭副业，县办工业，尤其是社队企业，一直十分

薄弱。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好养种加问题，特别是加工工业非常薄弱。全县农产品长期处于原料供应地位，县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很少，后来发展的几个为农业服务的厂子，如柴油机厂、汽车修配厂、化肥厂等，都因为原料供应不足，技术上不去，长期处于赔钱状态。社队企业更少，一九七八年调查，全县社队企业收入只占三级总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九。这就形成了整个农业生产结构的极不合理，小农业，单一经营，片面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一九七九年，按照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方向，采取联合办企业的形式，走种养加、农工商一条龙的路。现在已经把化肥厂、汽车修理厂改造成乳制品厂、白酒厂。海伦每年要消费二千六百吨酒，过去年年都要由山东进入大量地瓜酒。现在这个转产的厂子一年生产一千多吨酒，社员进城带酒桶，有的买，有的换，情况好多了。另外还新建和扩建了浸油厂、塑料编织厂等，工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三年，与前三年比较，工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八。一九八一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将近达到一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目前，他们正在积极设法筹建亚麻纺织厂和甜菜糖厂。这两个厂子建起来就更好了，糖渣子可以喂奶牛，糖可以搞食品加工，种养加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经济上能初步形成良性循环。社队企业重点抓了亚麻原料加工、粉条加工、建筑材料，一九八一年全县社队企业产值达到一千五百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今年还将在公社建立社队联营的温水沤麻厂、砖厂，大队也将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建立各种小厂，积极发展工副业，使农业生产结构更为合理。

建立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还要解决供销流通问题。过去我们不大主张搞商品性生产，就不大注意搞流通。渠道很

少，越弄越小，“官办”、包办比较严重。现在正处于调整改革阶段，商业的改革要从原来那种供给制的思想、分配商业的观点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市场适当调节的观点，我们的商业必须有个重大变化。海伦这方面也刚刚开始。为了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近两年海伦县成立了贸易货栈、信托联营公司、议价粮油公司、物资联营公司、畜牧保险公司、家禽服务公司等，县商业部门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二十三个经济联络点。这些机构的建立，对沟通商品信息、渠道，组织货源，推销本县产品，促进工副业和家庭副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全县农副产品购销已全部实行合同制。过去海伦县交粮不是最多，交猪也不多，近年来都有发展，粮食稳产，上交四点三亿斤，生猪交售九万七千头，是全省第一。今年全县已与农民订合同收购猪十三万头，收购家禽十五万只，解除了农民“卖猪难”、“卖鸡鹅难”之类的后顾之忧。去年卖给上海两万只鹅，今年又签订了五万只的合同。把家庭副业的发展也纳入整个计划之中，促进工副业的大发展。这样做的结果，调动了全县农业和工业生产这两方面的积极性。除了保证国家上调的农产品而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县办工业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都有机联结起来，形成农工商一体化，相互协调，综合发展。这样做有利于充分发掘土地资源、劳力资源、农产品及其加工剩余物等方面的潜力，逐步形成经济系统综合性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巩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了。

所谓科教文，实际是指智力开发，精神文明建设，是创造能够促进农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科学、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搞农业现代化，除

了技术条件、经济条件之外，社会因素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海伦特别抓了科技队伍建设，几年来重点抓的几项工作是：

第一，把科学技术摆上重要日程。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并在县、社、大队、小队成立了科学技术指导组织，把全县四千二百多名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形成科学技术指导网，努力普及和推广科学技术。

第二，认真解决现有科技人员的知识老化和技术经验不足问题。采取在职人员进修、派到省内外学习，请专家讲课等各种形式，一九八一年共培养和训练在职干部和技术人员一千多名。

第三，利用录音机函授、广播函授、农村建设学校和季节性短期训练班培训大小队干部和农民技术员一万多名。这些力量同科技人员的结合，是海伦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坚实支柱。现在，广大农村开始兴起了科学热，对此县里是抓得很紧的。

第四，发动各方力量抓教育工作，解决中小学二部制问题。“四个一点”是他们与肇东县的经验。如果靠国家拿钱解决的话，全省就得几千万元，也解决不了。他们还积极抓了改革中学体制，试办了水产、财会、畜牧、卫生、电工和土木建筑等农业职业学校，实行定向培养，统招统分，队来队去，择优选用，为培养技术农民摸索出一条新路。海伦这里要出科学家，不仅要有从实践中培养的高水平的科学家，还要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农民。因此，当务之急是狠抓教育，注意智力开发，搞好技术储备。

第五，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加强全县人民的精神文明建

设。海伦现在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他们结合小城镇建设，在城乡增加了文化设施，并且在全县范围内改善了农村卫生环境。

海伦三年的实践证明，农业现代化，是科学、经济、社会的总体战，是缺一不可的。由于他们抓了上述科学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几个方面的工作，海伦的面貌正在改变。改变粮食单打一，往农林牧结合的合理农业结构和生态平衡上发展；改变单纯原料生产，往种养加、农工商结合，综合经济上发展；改变不适当的作物比例和布局，往用地养地，因地种植，良性循环上发展；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往农产品商品化、生产社会化方向发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现在看，海伦所走的这条路子，是比较扎实的、符合海伦实际需要，符合农民、干部要求的路子，是使农民得到实惠，大家比较满意的路子。

当前要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实践已证明，科学技术能否很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否很好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取决于我们的工作。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订了一整套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政策，受到广大科技人员和农民群众的欢迎。工作上要怎样抓，才能更快地做出更大成效呢？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强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注意解决“两层皮”的问题

主要是解决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的问题，如何使科学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反过来又使经济与社会工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它们结合的越好，

农业的发展速度就可能越快。

我们搞农业现代化要靠三种力量，一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二是科技人员，三是领导干部。三者各有所长，各有各的作用。科技人员掌握先进技术，领导干部有组织才能，农民群众有实际经验，最熟悉当地自然和生产情况，而且是直接生产者。只有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全社会的行动，才能把科学技术充分运用于生产，使农业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可是，这三种力量真正扭成一股绳也不是很容易的。有些领导干部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比过去重视了，这是事实。但在实践中与专家结合得怎么样，现在还是程度不同：有的是碰到困难时间问一问，请教请教，听听课；有的是下乡一起同行，不断取得他们支持，请他们当参谋，作諮詢；有的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有职有权，进到领导班子里来，建立一个科学指导的体系，把生产的技术指挥权交给他们。我们有些人在思想上还有生产忙、工作忙，这些都是硬任务，顾不上科学研究，觉得那个事情还远呢，慢一点可以，不是现在非干不可。这样一些片面认识，就形成各种程度的“两层皮”。因此，说重视也重视，但是真正结合，真正依靠那就程度不同了。科技人员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有些科技人员不习惯于搞大面积成果推广。过去，我们对于成果的大面积推广不是那么很重视的。比如说技术推广奖就没有成果发明奖那么多。因此影响到一些科技人员，他们认为这种综合实验和大面积推广是搞生产，不一定是我们科技人员的基本任务，而习惯于在实验室里在小面积的场地里搞那个“正规科研”。有的干部认为，搞农业现代化得有钱，没有钱没法搞，不去研究如何靠自力更生。有些社员群众习惯于传统经验，认为搞农业现代化是专家的事，用不着庄稼工人跟着瞎掺混。对专家提的路子他也不大放心，也不大相信。至于搞

商业的、搞工业的、搞教育的，有的认为搞农业现代化与自己无关，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些都是搞农业现代化综合试验过程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各种各样的“两层皮”。

对这些错误思想和糊涂认识不及时解决，大家就想不到一起，劲就扭不到一起，就调动不了千军万马，形不成巨大力量。海伦县经过几年的准备工作，把各种力量调动到进攻出发地，各路“诸侯”进入阵地并开始进攻，这是下了很大力量的。海伦县委一直抓紧宣传教育工作，用大农业、广义农业的思想，发展综合经济的思想，综合研究的思想，摸索、创造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使农民迅速富起来的思想，向全县人民，向各行各业，尤其是向县内各级领导干部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了领导干部、各行各业的职工以及广大农民群众搞农业现代化综合实验的认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把全县各方面工作都纳入到基地县建设的轨道，这就为开展全县范围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要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

三年来，海伦的同志坚持自力更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而且是在全省社队农贷平均水平之下搞的农业现代化。按一九八一年社队农贷余额计算，全省平均每亩占用贷款为七点三元，每个农业人口占用五十四点一元。绥化地区平均为八点八元和四十七点二元，而海伦仅为七点五元和三十七点九元。海伦之所以这样，从指导思想，是与他们力图创造一个低耗高效的农业结构，走以有机农业为主的农业现代化路子有直接关系。他们大力提倡搞有机肥，积极开展积肥造肥活动，发展绿肥和沼气肥，每亩施用有机肥数量年年增加。在机械化这个问题上，也是靠自力更生，靠社队本身的积累。就全省来

看，豆麦产区是实行全盘机械化，象克山、讷河、黑河地区；海伦和海伦以南属杂粮产区，实行有选择的机械化。海伦县他们不仅坚持自力更生，搞有选择的机械化，而且还抓了增产节支，去年节支七百二十多万元，全县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多收益十元九角。

自力更生精神，是我们搞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就脱离了我们的实际，就实现不了现代化。

第三，把科学研究与推广应用紧密结合起来

海伦县是综合实验基地，也是各种成果综合运用的大型试验场。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新的技术。我们搞农业现代化，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都是已有的科研成果。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综合应用推广这些成果，把它们组装起来，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海伦围绕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一手抓综合研究，一手抓试验推广，两者紧密配合，才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方面，他们以县的科学技术力量为主，聘请省内有关专家参加，动员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按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建议和专家们的意见，运用已有的科学成果，在全县范围内组织落实，使科学技术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另一方面，组织黑龙江农业现代化所、东北农学院和省农业科学院以及林科院、畜牧所、克山所等科研单位的技术力量，围绕当地实现农业现代化急需解决或有待解决的问题，分别在有代表性的实验点上，和群众一起开展综合的和部分的单项的试验研究，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条件，搞好技术贮备。在农业上我们常常遇到许多边缘学科，实际上是综合学科。需要科研单位的协作攻关，好多科学家感到这个很好，过去搞单项研究往往注意了那个，忽视了那个。

到实验基地里来，好多社会条件都在那里摆着，你搞技术得考虑经济合算不合算，社会上有无这个可能，人力、智力资源够不够，社会上有没有这个原料，要不要这个产品，有没有这个协作条件，这就要放到社会现实生活里去考虑。这对科研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我们考虑农业现代化综合实验，必须是这种多学科的协作攻关综合研究。过去我们科研单位有许多成果没有变成生产力，原因是我们只重视研究，不重视推广，也不重视综合的大面积的推广，全省搞“四个万亩”大面积试验时，海伦也搞了大豆、小麦、亚麻、甜菜的“四个万亩”和农田防护林高产试验示范点。这种作法有利于科技变成生产力，使已有的科研成果在大面积上得到比较集中的检查和考验，为广大人民群众大面积运用科研成果提供了经验。

为了做到研究与推广紧密结合，他们在县、社、队都建立了必要的组织，狠抓全县的点面结合、单项与综合结合、研究与示范推广结合，使科研成果迅速变成生产力，这种作法也是很必要的。

（本文是作者1982年3月19日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发展农业靠科学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摘要）

农业现代化要从良性循环上搞突破

在海伦基地县进行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过程中，为探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大农业、广义农业的道路，我们概括了“农林牧、种养加、农工商、科教文”十二个字。后来李昌同志又形象地归结为建设“飞鸟型”社会主义大农业。海伦按照这个精神已经搞了四年多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在有关单位和专家指导下，依靠群众的力量，集中人力、

财力，自力更生地进行综合科学实验，从4个实验点扩大到44个点，开始走上了生物、机械、工程措施相结合，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科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设大农业、广义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不仅在丰年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在灾年也增强了抗灾能力。1982年在遭受旱、虫两大灾害的情况下，一业减产，五业增产，社员人均收入仍为历史上第二个最高年份。1983年遭受低温和涝灾，粮食产量受到影响，而其他各业却又有大幅度增长，造林12万亩，比1982年翻一番；预计可交售生猪12万多头，比1982年历史交售量最高年超过一万多头，奶牛8,000多头；比1982年增长62%；奶山羊5万多只，比1982年增长22%；家兔由1982年的1万只发展到26万只；养鱼水面达到8万多亩，放养鱼苗600多万尾。社员人均收入有很大提高。当然，海伦的探索只是初步的，他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探索。我们高兴地看到，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试验的工作，以及海伦县的经验，已经引起全省各地的普遍重视，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在不同的范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这是个内容非常广泛的大题目。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一题目，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过程。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全党做出共同的努力，要不断有所突破。从哪些方面突破，这需要我们很好研究。从海伦的实验情况看，我认为，要从三个方面的良性循环上去突破，也就是要从工作上深入地抓好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良性循环。

关于生态方面的良性循环

农业生产，包括种植、养殖、加工，都具有鲜活性、季

节性、时间性，直接依赖于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只有认识和掌握这种变化，认真搞好生态平衡，才能经常保持农业生产的良好生态环境。越是走向现代化，越是需要更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在实践中必须按照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把农业布局同提高自然生产力结合起来，把生物措施同机械措施、工程措施结合起来，把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艺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保证农业生产依照自然规律不断向前发展。

在实践上，搞好生态良性循环，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整好农林牧之间的关系，做到以林保农，以农养牧，以牧促农，实现宏观上的生态平衡。这几年，海伦最大的成就是从这方面闯出路子。他们对农林牧总的布局调整得比较好，做到了互相促进，使这几个方面都有了发展。他们的作法对全省起了比较好的影响。当然，按照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海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突出的问题是，在粮食生产上，尽管这几年总的是上升趋势，但单产不高、总产不稳的问题还没从根本上解决；在畜牧业上，虽然开始发展起来了，但是单畜的产奶量和出肉率也还不高。林业上也还赶不上绥化。因此，还要深入研究微观上的生态平衡，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逐步采用适应实际需要的各种先进科学技术，使种植业产量不断提高，实现稳产高产，使畜牧业不断改良品种，提高出栏率和单畜产奶量与出肉率。

从全省来看，粮食单产不高、总产不稳，是多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是摆在我们农业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基地县要下决心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归根到底也还在于创造作物生长的良好生态环境，从目前来说，主要是战胜两大自然灾害，一是旱涝之灾，二是低温冷害。当然，想完全解决自然灾害，现在我们还做不到。不仅

我们，目前任何国家也还没有办到。但是，只要我们依靠科学的办法，研究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还是可以做到的。

赵紫阳总理在全国农业书记座谈会上指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上，分布比较均匀的地方可以不搞灌溉农业，只要从耕作制度、作物品种、栽培技术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抗旱措施也能夺高产”。这个精神，完全符合我省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海伦的情况。我省多数地区是十年九春旱。正常年里，全年降水量仅仅在四、五百毫米，在旱年就更少了，应积极开展对有机旱作农业的研究，摸索出一套有效的耕作栽培方法，以便稳步提高粮食产量。实际上，现在对战胜旱灾和冷害方面已经找到了一些有效办法，我们应该把这些办法重视起来。例如，在解决干旱问题上，克山农场搞“蓄水型农业”，实现了连年高产。从1978至1981年四年，平均粮豆单产361斤，小麦单产480斤，大豆单产227.9斤。1982年严重旱灾，全场粮豆单产还达到336斤。他们保持高产、稳产的基本措施就是两条，一是植树造林，二是改革耕作制度。他们过去是连年耕翻或隔年耕翻，现在采用的是少耕深松的耕作方法。这种耕法的好处，第一是耕层不乱，沃土集中，正与小麦、大豆的根系上多下少、吸肥能力先弱后强相适应。第二是耕层虚实并存，水、肥、气、热四个条件得到协调，做到旱时能多蓄水，春旱秋防，水大年份还能渗水排涝。第三是能抗风蚀、水蚀，减少病害。在近期内我们完全依靠旱田灌溉是做不到的，因此，海伦以及全省各基地县，都应注意保墒，结合本地情况，学习克山农场蓄水型旱作农业的经验。从耕作制度和方法上找出路，调配利用好自然降水。在战胜低温冷害方面，今年世界性气候反常，海伦出现低温，原来又是低温冷害底子，更应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海

伦采取选用优良品种、地膜覆盖、育苗移栽等办法，收到的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百发大队的甜菜纸筒育苗移栽试验，亩产3.6吨，比全县平均亩产提高两倍多。东泰大队，在日本专家指导下，搞水稻旱地育秧稀植，亩产达到988斤。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只要我们采用科学办法，抗御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逐步实现高产稳产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一定要下力量，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逐步形成自己的科学技术系统和科学管理体系，向科学技术要高产，要稳产。

畜牧业如何实现和保持畜禽产品高产，也要靠科学技术。据考察，畜禽增产靠品种等遗传因素约占30%，靠饲养管理等环境因素约占70%。拿奶牛来说，海伦奶牛大部分是由外地购进的。在发展的初期，为发展畜牧业打个基础，购入一定数量牲畜是必要的。但是，购入数量大了，必然是种群质量差，生产能力低。这种状况，要采取措施，尽快扭转。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把家畜繁育和防疫体系健全起来，实行科学繁育和科学饲养。

发展畜牧业的关键是饲料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饲料资源问题要解决；二是配合饲料加工问题要解决。拿海伦来说，现在全县牲畜总数是50万头左右，他们计划，将来要发展到100万头。1982年国家畜牧总局专家朱纪良同志，对海伦饲料资源进行了调查和估算，发展100万头牲畜，每年需要精料7.5亿斤，饲草9亿斤，青绿饲料14.6亿斤，总计需要31亿斤。挖掘全县现有草饲料资源潜力，可供饲草11亿斤，精料4亿斤，青绿饲料4.7亿斤，总计可供20亿斤。这样，精料要短缺3.3亿斤，青绿饲料短缺9.9亿斤，饲草余2亿斤，总共短缺11亿斤。如果饲料问题不解决，谈发展是句空话。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这个问题绝不容忽视。必须注意饲料的“开源”和“节流”。首先要查清饲料资源，正确

合理地开发利用；其次要保护经营和利用好现有的荒山草坡，种好闲田隙地；再次要积极发展饲料加工业。逐步实现按不同牲畜品种、不同用途、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饲料标准，生产各种配合饲料，科学合理利用草料，确保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发展林业不仅有利于生态平衡，促进农牧业发展，而且也是解决农村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海伦仍是以烧秸秆为主，这种传统习惯要改变，不能长期持续下去。根据中国科学院专家1977年调查报告，海伦全县每年从土壤中输出的氮素为3,150万斤，磷素为1,430万斤，而每年补给的仅1,500万斤和425万斤。各相差1,650万斤1,005万斤。全县各种有机肥源都利用起来，若每亩两年施一吨肥，全部有机肥仅可满足耕地的43%。土壤肥力连年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秸秆被用作生活燃料而烧掉。因此，对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要有紧迫感，要有人具体领导抓出成效来。这个问题，不仅海伦存在，全省大部分县都存在，试点县要首先解决好这个问题。目前解决农村能源最现实的办法是推广节柴灶、造薪炭林，以及沼气、太阳灶和风能的利用。需要做些扎扎实实的技术引进、试验示范以及技术普及工作。

要搞好生态良性循环，这里还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这就是要正确认识抓好农林牧同搞好粮食生产的关系。有的同志担心，抓农林牧全面发展，搞多种经营，会影响抓粮食生产，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践证明，凡是畜牧业搞得好的地方，粪肥就多，粮食产量增长的幅度就大，很多畜牧兼业户，都是粮食高产户。而且实践也证明，只抓粮食生产，不抓畜牧业，不抓多种经营，对粮食生产发展并不利。拿海伦来说，综合实验以前，那时他们主要是抓粮食生产，有的地方生产费分文无有，只好全部靠贷款。搞基地县建设以后，

他们不放松粮食生产，大搞农林牧多种经营，就改变了这种局面。因为收入的渠道增多了，农民手里有了钱，受了灾也有条件休养生息，并为搞好下一年粮食生产提供了经济条件。农场总局的经验也是如此，搞单一经营的农场，遭灾就抗不了，对第二年的生产影响很大；搞了多种经营的农场，遭灾之后，第二年生产受的影响就小一些。所以，绝不能把抓好农林牧和抓粮食生产对立起来。前几年，学术界、思想界对大农业、大粮食有很多议论，主要是讲注意发展广义农业，别搞过去那一套粮食单打一的干法。要搞农林牧副鱼，还有虫、微（生物）、蜂和种蘑菇等等。有人提出“一字农业”、“十字农业”，都是指的广义农业。在国外，苏联提出食品发展纲要，实际上也是搞广义农业，提出发展粮、豆、薯、果、鱼、蛋、肉、乳等等。小平、耀邦同志也都讲到，光靠抓粮食翻两番不可能，必须在抓粮食的同时，抓牧、抓林，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牧业、林业，搞多种经营，与发展粮食是不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入地搞下去。

关于经济方面的良性循环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积累的过程。没有经济上的良性循环，这种积累是不会实现的，因此，必须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以最小的合理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理想的产出效益，使农业生产得到不断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使广大农村尽快地繁荣起来。实践证明，在农村要实现这种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必须建立符合农民切身利益、受广大农民拥护的合理的经济结构、科学的管理体制与切合实际的经营方式，形成一个能够促进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的农业经济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海伦进行了一

系列改革。他们着重抓的三个环节，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在安排农林牧总布局的同时，处理好种、养、加的关系，注意把县社工业这个薄弱环节搞上去。海伦县办工业产值还很少，1982年接近一亿元，社队企业更少，仅有二、三千万元。县、社工业上不去，就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如要亏损，反而给农业背上包袱，拖了农业发展的后腿。要狠抓农副产品的多次加工。据统计，农副产品原料的产值约占最终产值的三分之一，而多次加工的产值，约占三分之二。因此，农业县份应该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努力改变只供原料不搞加工的受穷局面。

目前，我国地方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他们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区内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关系紧密，相互促进。我们也可以设想整个松嫩平原是否可搞成一个以生产煤、木、粮、油为主，以哈、齐、大庆为核心以哈、齐、牡、佳等大中城市为网络的经济区。绥化是这个区中的主要地区，海伦是这个经济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它的产品销售、生产资料供应、技术协作等，和区内生产、消费、科研单位联系得极为紧密，因此，海伦在把自己建成商品粮基地的同时，还应该使自己形成食品供应基地，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如烘烤食品、罐头食品、强化食品、膨化食品等产品系列。力争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应该积极与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开展技术协作，或由那里聘请一批技术力量到本地发展食品工业。与此同时，还应当注意保鲜、贮藏技术的引进和研究工作。除了食品工业之外，根据原料生产和市场需求，还可以发展建材、塑料编制、服装、家具等行业。在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快上糖厂以外，这些年来内，重点发展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小企业中把海伦的工业搞活。

二是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处理好农工商的关系，特别要把商业体制改革好。把商业流通抓上去，这是实现经济上良性循环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当前普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商品生产发展了，而商品流通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过去那种旧的商业体制，束缚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这方面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进行深入的改革。海伦在这方面开始搞了十个专业服务公司，后来又改革了供销社体制，建立了农工商联营综合服务公司，形成了县、社、队三级服务网，把商业流通里面的活动，同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起到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因为实践的时间比较短，有些方面还不完善，还需要不断地总结、改善和提高。同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客观上要求农村的商业流通组织要更加灵活、更加方便群众。所以，要进一步把现有的公司经营管理好。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要把国营商业办好，把合作商业办好，还要把个体商业组织好。使他们真正起到产前保证及时供应生产资料、产中及时进行技术指导、产后及时进行经售的作用，促进农村生产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发展。

三是巩固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各种专业户。近几年以来，我们普遍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是我国农民创造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是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根本性的问题。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这场变革，给我们农业现代化综合实验提供了强大动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有的同志认为，情况变化了，农业现代化实验不能搞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极为充分地调动了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由过去的单纯劳动者，变成了既是劳动者又是经营者，把他们的责、权、利统一起来了，使农民有了活力，生产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高涨，家家户户寻求致富之路。许多农民积极购置生产资料，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出现了大批专业户、重点户、“养牛屯”、“养羊屯”“养兔屯”。为了把生产搞好，从经济上得到更大的效益，在农民中兴起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先进的农业技术迅速推广，出现了很多科技户。农业科学技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为农民所认识和重视。这样，农业现代化实验也就更有群众性、自觉性和迫切性。因此，必须把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同巩固发展家庭承包责任制、支持各种专业户结合起来。特别是支持发展粮食专业户。粮食专业户的产生要有个过程，这是分工分业中的一种新问题，也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大批的养畜专业户，必然要产生粮食专业户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研究世界农业发展史，农民脱离土地有各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脱离土地叫原始资本积累。大批农民破产，背井离乡，两极分化，流落大城市，投入产业后备军，造成历史上“羊吃人”现象。当时英国纺织业大发展，大力发展羊群，农民从土地上被赶出去。这种农民脱离土地是一种悲惨的过程。中国不能这样，我们提倡离土不离乡，不提倡发展大城市，提倡在农村形成小城镇，不要农民贫困破产，而要农民在勤劳致富过程中，自然产生分工分业，逐渐形成一部分人脱离土地。但又不能太急，因为脱离土地要有分工分业的条件，只有生产发展了，农民逐渐富裕起来，生活有了保证，才会愿意放弃土地，不然他是不会放弃土地的。这和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破产、背井离乡，有原则不同，我们的制度和政

策不是那种制度和政策。我们要关心目前发生的这一新生事物，看清它的必然性。各级领导要根据各地情况和条件，给予帮助、支持，加强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方法，及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关于社会方面的良性循环

这是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社会条件。农业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村社会进行重大变革的过程。它们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必须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去搞农村社会的变革，把我们的农村社会真正建成一个人们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高超的技术才能和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是一代人高过一代人、强过一代人那样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方面的良性循环。

实现这个良性循环，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搞好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海伦在这方面的想法和作法还是比较好的。据他们调查，要基本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全县大约需初、中级农业技术人才八千到一万人，而现在仅有400多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特别是一批批中学毕业生走上农业第一线后，他们有文化没有技术，地怎么种，畜怎么养基本不会。这种低下的农业知识结构如不改变，必将给农业现代化带来严重困难。他们体会到，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化。搞农业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是要用现代文化知识武装农民，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他们从长远着想，从当前着手，做了十年安排。一手抓好中小学的教育，从培养人才的基础抓起；一手抓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打下可靠的人才和智力基础。为了

适应当前的需要，他们采取举办科技培训班、开展专题技术讲座、交流科技户的经验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农民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全省各个基地县都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长远大计。

抓好文明村建设。这是当前在农村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形式。在这方面，海伦的作法是可以借鉴的。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文明村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教育为核心，以物质文明建设改变农村面貌为目的。当前，主要开展四项活动：党员干部带帮活动；培养“三个能手”（妇女多种经营致富能手、青年科技示范能手、民兵劳武能手）活动；开展“五户”（万斤粮户、万元户、人均收入千元户、交十头商品猪专业户、养十只成母兔重点户）竞赛活动和抓好文化科技中心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既促进生产，又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推向前进。

（本文是作者1983年总结海伦基地县综合科学实验经验写的文章）

系统工程与农业现代化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实践的发展，如何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理论，搞好农业生产的经营和管理，促进农业现代化，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黑龙江省海伦县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的实践，根据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对此我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我国农业与先进国家的农业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这

差距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对此,有的学者说:“如果说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于先进国家二十年,那么管理技术就是落后四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近两年又开始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使农业生产从单一经营向综合经营方向发展,这就更需要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理论来组织和管理农业。

农业系统工程是系统工程理论在农业上的应用,它是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解决农业生产和科研中组织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是系统工程的一个分支。系统工程是二十世纪中叶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是为组织建立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和经营管理这些系统的工程技术,把一个复杂系统的目标,变成大量参加者的具体工作,并将这些工作综合成一个技术上、经济上都合理,运转周期短而且效果最佳的实际系统。

系统工程之所以在农业中得以运用,成为农业系统工程,从理论上讲,因为系统工程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从客观上看,农业本身就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大系统。农业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是动物和植物等有生命活动的有机体。在农业再生产的过程中,生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与人类再生产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可见,农业这个系统是由“自然环境、生物和人类社会”三个因素构成的。相对于农业这个大系统而言,每一个因素又是一个子系统,而每个子系统又是众多因素所构成的。如“自然环境”系统,它是由农、林、牧、副、渔、虫、菌、水、土壤等因素所构成的。就构成“自然环境”的因素——土壤来说,又是由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所构成,自然肥力又是由田质、气候、生物、地形等众多自然因素所形成。

由此可见，农业是由无数个小系统构成的多层次的、立体的、纵横交错的大系统。所以，只有运用农业系统工程才能解决好农业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生态结构、产业结构等，并使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调整与系统优化，使农业生产力和综合效益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高。

运用系统理论分析和阐述农业问题，并不是现代人的独创，马克思对此早就作过论述，只不过是明确提出过系统工程概念而已。马克思说：“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8——399页）农业的再生产就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相结合。可见，马克思对农业再生产的分析就采取了系统分析的方法。对自然再生产的条件及过程，马克思也曾经运用生态科学进行过系统分析，指出：“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3页）

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10月31日《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中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这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又说：“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些论述，就包含有丰富的系统思想，是对农业大系统的正确分析。实际上，农、林、牧结合发展是营养原素循环规律的系统联系所决定的。动物利用植物生产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蛋白生产肉、奶、蛋。人们食用食粮仅是用掉作物的一部分，其余大部，根、茎、叶、糖等，可作为饲料发展畜牧业，再转化为肉、奶、蛋，供人们利用。以农、林养

牧，以牧养农、林，农、林、牧三结合，并构成三者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这是农业系统工程的具体运用。

党的十二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又提出三个大前提，即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些发展农业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农业系统工程的原理。

三十多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实践也证明了要搞好农业生产，必须用系统的观念来认识、分析、处理农业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前些年出现的“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海造田、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等都是缺乏系统观点指导农业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对此，一些生态、农学、地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曾经指出：“在相当普遍的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自然实行了掠夺性的经营方式，破坏生态平衡，致使资源衰退，形成了农业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农业出版社第8—9页）所以，这些年来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频繁，而且日益严重，直接威胁到生产和人民的生存环境，并使人们年年在防灾抗旱中去过日子。一九八二年底，中央领导同志尖锐指出，现在农村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上，这种破坏是带根本性的。如果我们有农业系统工程的知识，并运用其指导农业实践，决不会干出这些蠢事，也不会使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致使自然界一而再，再而三地惩罚我们。有的人曾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生态时代，认为要处理、解决好农业的生态问题，必须有系统思想，并以系统思想为指导。

由此可见，农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从农业的结构来看，它是一个纵横交错、多层耦合的网络结构；从农业的

系统来看，它是一个因素众多、诸因素之间关系极其复杂的大系统（也称巨系统）。农业系统工程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它较之其它技术工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

首先，地域性特点常使农业系统出现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人类的食物仓、主要的原料库、生产的实验场，是财富之母。但土地并不都处于同一海拔、地貌、位置之上，而且受气温、日照、雨量，季风等影响又很大，这些因素都很难精确预测，使农业系统工程显得非常复杂。如海伦，不要从整个黑龙江来说，就是同周围的几个邻县比较，在海拔、地貌、位置以及气温、日照、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海伦县在地貌上是由小兴安岭山地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从东北到西南，由低丘陵、高平原、河阶地、河漫滩依次呈阶梯形逐渐降低。海拔最高处四百七十一米，最低处一百四十七米。既不同于高山峻岭的山区，也不同于一望无际的平原，而大部是波状起伏的高平原。海伦的气候条件比较寒冷，无霜期为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天左右，积温较低，生长季内日平均气温等于或大于 10°C ，积温为 $2300\text{—}2600^{\circ}\text{C}$ ，这些不利因素，安排农业生产都应该考虑在内。就是海伦境内的自然情况，从作物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的温度、水分以及土质等情况的不同，种植的情况也不同。有的地区适于种大豆，有的地区适于种小麦，有的地区适于种玉米。

其次，农业对自然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农业是露天的大规模生产，其收成的好坏直接与自然条件有关。马克思指出：“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22—23页）虽然，当今农业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靠天

吃饭”的局面并未有完全改变，农业生产对自然力的依赖性仍然很大。当然，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力认识和控制、利用的深度、广度的不同将会越来越明显，因此，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这也使得农业系统工程显得十分复杂。如海伦近两年，农业生产形势开始往往很好，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遇到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使有些预定的农业发展目标得不到实现。

最后，由于人这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农业系统工程不仅包括自然和生物的因素，而且还包括社会的因素，也是社会工程、经济工程和社会心理工程在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上的运用，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技术工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人这个“活”的因素，是农业生产中最核心的劳动力，人的知识水平、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不仅受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政策、领导、资金、市场、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是经常波动的，就是从—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来说，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也是经常变化的。因此，使得农业系统更加不确定。实践证明，农林生产在发展过程中，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不断地发生波动。例如，同是一个人，在吃大锅饭时的干劲与实行联产承包制时的干劲就大不一样；同是一个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与晚，人口的多与少，技术力量的强与弱，农业的发展速度，以及农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海伦虽然搞农业现代化实验已有几年了，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较晚，这恐怕是发展速度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运用系统工程来认识和指导农业生产时，必须充分注意农业系统的这些复杂性。只有认识这些复杂的特点，才能正确把握农业系统，以达到较佳或最佳的综合经济

效益。

二

农业是一个系统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农业范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不同的。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不同，以及社会分工不同，农业系统也不同。这是纵向的看。横向的看，在当今世界，也能看到农业范畴概念具有历史特性的映象。如非洲的农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落后，因此，农业系统（作为经济范畴）与农村系统（还包含农村社会范畴）的边界是含混不清的。而美国，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农业中的产前行业和产后行业相继分化独立出去，农业的范畴愈来愈单纯（即只包含资源和生物两个独立状态子集的），农业生物初级产品生产方向缩小。因此，对农业系统的研究，对农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不要从某一个抽象的理论标准出发，而应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切实地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基于这种分析，我国农业系统既不象非洲某些国家那样与农村（包含农村全部要素）等同，也不象美国那样只包括农业生物产品生产系统，而是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具有中国的特点。从农业现代化综合实验的一个基地县来说，就更有自己的特点，如黑龙江省海伦县，它担负着探索东北地区如松嫩平原及类似海伦县这样的地区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因此，海伦县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实验，最主要的就是要从海伦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系统分析，运用农业系统工程解决问题。六年来，海伦基地县的实验，也基本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海伦县是松嫩平原黑土地带上的一个大县，有土地面积四千六百七十二平方公里，人口八十一万。这说明海伦自然条件是比较优越的，是得天独厚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运用农业系统工程观念指导农业，使得县内各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没有把社会工程、经济工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好、规划好。长期以来只注意计划经济，忽视市场调节；只强调以粮为纲，忽视林、牧、渔各业；只抓农业，忽视工副业生产。所以造成生产单一，粮食产量低，增长速度慢。一九四九年——一九八二年，三十三年平均亩产二百一十九斤，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零点九三，产量和递增率都低于全国水平。畜牧业系统，畜种内部结构不合理，各畜群优良品种只占百分之十五——二十，大部分生产水平低，劣质畜多，成本高，效益低。饲养生产供应系统不健全，技术落后，服务系统不合理，养畜基地太少，良种都要引进，严重妨碍了良种的普及和提高。林业系统还存在功能低的问题，按需要应有水土保持林九万六千八百八十四亩，当时只有一万六千七百二十八亩，仅占百分之十七点三。工副业系统严重存在着亏损，经营方向不端正，能源不足，管理落后，信息不灵，没有形成国内名牌产品。

一九七八年海伦基地县建设开始准备以来，逐步对农业系统内各子系统进行了分析和诊断，对海伦农业系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海伦农业系统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开展了综合研究和探索。这六年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七八年——一九八〇年）开展了海伦县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农工商经济调查；第二阶段（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三年）确定所有的科研方向任务，开展课题研究，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途径；第三阶段（一九八四年——现在）总结经验，正式进行较系统的实验，并在改革

中前进。

在这三个阶段，我们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对海伦县级农业系统总体设计和模型系列进行了研究，用大农业、广义农业和生态农业的观点，来指导综合实验模式点，取得了一些成绩，创出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如果用农业系统工程理论概括海伦县农业现代化试点的经验就是十二个字：“农林牧、种养加、农工商、科教文”综合协调发展。后来李昌同志在此基础上又提高综合为“飞鸟型经济”，这种思想体现了农业系统的生态平衡、生产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条件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综合发展，反映了农业系统的发展对科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所谓“农林牧”，就是建立比较合理的生态结构，农业生产的发展，没有合理的生态结构是不行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合理的生态结构，就是农林牧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近几年来，海伦调整了农业结构、作物布局、农林牧比例，使农业、林业、牧业相互促进，都相应的发展起来了。同搞农业现代化的前三年相比，每年平均粮豆薯总产增加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八万斤，增长百分之十四。造林面积比过去也有明显增加，一九八二年，平原森林复盖率达到百分之十一，比一九七九年增加百分之六点一。奶牛、奶山羊和猪的数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农林牧的比例发生了合理的变化，加上搞了农作物轮作、布局和种地养地试验，使自然生态起了初步变化，开始创造了实现初步良性循环的一些条件。

所谓“种养加”、“农工商”，就是建立比较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农村发展养殖业，种植经济作物，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近几年来，海伦利用自然资源和拥有大量劳动力的

优势，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养殖业、加工业、工副业和商品市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种养加”、“农工商”一起上的好形势，家庭企业不到两年，就发展到两万多户，农村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日益趋于合理，经济上初步形成了良性循环。

所谓“科教文”，是指智力开发、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李昌同志称之为乌头。抓好这方面的工作，目的是创造能够促进农业发展的社会思想文化条件和社会结构。科学、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搞农业现代化，社会因素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近几年来，海伦特别抓了科技队伍建设。一是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二是解决现有科技人员知识老化和经验不足问题；三是利用录音函授、广播函授和季节性短期班培训干部和农民技术员；四是发动各方力量抓教育工作；五是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些工作，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些年来，由于运用农业系统工程来指导农业，坚持“农林牧、农工商、种养加、科教文”的发展方针，海伦县农业开始由单一的狭义农业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广义农业转化；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由传统经验向现代科学技术转化。并开始出现了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方面的良性循环，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海伦县在全国支援下，进行了农业系统工程实验，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短几年间，发展快，步子正，效果好，形势喜人，在全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农村中掀起了学习和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的热潮。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在黑龙江省举办

的全国第三、四期系统工程学习班，为全省培训了大批系统工程科技人才。国营农场系统，各地市县也多次举办各种系统工程培训班，较为广泛地普及了农业系统工程知识，一些做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能够比较自觉地用系统观点把农业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全面地考虑各业的发展问题，逐步使决策走向科学化。一大批系统工程科技人才正活跃在农业战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成立了各种学会，创办了刊物，有了可观的队伍。

海伦农业现代化的实验证明，搞农业现代化必须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必须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正确解决本地农业系统中的一系列问题。海伦县所走的路子是扎实的，是符合海伦实际的，反映了广大农民、干部的愿望与要求，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大家比较满意。这表明海伦农业现代化实验的方向、道路以及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82年省委在海伦召开了发展农业靠科学大会，省委决定每个地区搞一个县、每个县搞一个乡进行农业现代化试验，推广海伦试点经验。随后，又在省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推广海伦经验，在齐齐哈尔还召开过贯彻检查这方面工作的会议，全省出现了推广海伦经验的高潮。但发展是不平衡的，经历也是曲折的，农业现代化实验的速度发展不快。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我国农业当然是历史悠久，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北方历来耕作粗放，农机设备不配套，水平较低。

第二，土地面积大，地域差异大，复杂多样，自然灾害多，抗灾能力差。

第三，农民长期以来是靠经验种田，而不是科学种田，农业科技起步晚，基础薄弱，科研、教育、推广脱节，农民文化水平偏低，对现代农业技术生疏。

第四，海伦县全县商品化、社会化、专业化生产能力还比较差，财政困难，资金短缺，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对于上述四个问题，必须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的理论进行综合解决，综合治理，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不断加深对海伦农业系统的认识，以实现海伦农业系统的最优化，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三

农业能否高速发展？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海伦县作为农业现代化试点县的实践，对一些问题已经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海伦县农业现代化实验虽然是从海伦一个县出发的，具有海伦的具体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的理论分析海伦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也能从中抽象出共性的东西，对指导农业现代化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一，要从农业系统的整体上，考虑农业的发展道路，制定农业的奋斗目标，搞好农业生产的经营和管理。以往的农业，是单一种植型农业，这主要是缺少对农业系统的经济结构、布局、规模的系统整体分析和研究所造成的。在海伦试点中，我们就注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对海伦农业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飞鸟型经济”和“农林牧、农工商、种养加、科教文”的方针系统解决措施，并取得了成效。

实践证明，对农业从结构、布局、规模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从结构上侧重于系统的立体纵向研究；从布局上侧重于系统的横向研究；从规模上侧重于系统的量的规定性研究等等。这样的分析虽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农业系统的实际，但毕竟不是农业系统的整体，因而必然带有局限性。所以，我认为，在对农业系统中子系统作局部分析、研究的基

基础上，还要对农业系统的全部因素和全部联系进行系统整体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能对农业系统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并取得农业系统整体的最佳效果。农业系统工程的整体性原理告诉我们：有机的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系统整体具有各孤立要素简单相加所不具有的新质，即系统质。所以，农业系统工程强调整体对组成部分、要素的控制支配作用，强调部分、要素对农业系统整体的依赖关系，强调的不是农业各子系统、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要素、各个部分的有机结合。

在海伦农业现代化实验过程中，我们强调了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的整体性原理来指导农业。为了实现整体目标优化，注意了各个目标之间的协调。如1982年，海伦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结果是种植业一业减产，牧副渔等各行业增收，减产不减收，人均收入仍达到历史较高水平。

第二，要坚持农业系统工程的联系性原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农村各业的经济联系，保证整个农业系统机制的正常运转。农业系统不仅与国民经济的其它系统相联系，而且其内部的各要素也是相联系的。农业系统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为农业的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农业要发展没有商品市场不行，离开流通贸易，农业系统的机制就要停止运转。海伦县试点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在试点过程中，没有把海伦仅仅局限于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上，而是同时注意了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提出了农工商综合经营，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产品的加工业。这里的核心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从而调整了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使经济结构趋于

合理，为农村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积累了资金，又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发展农业中，为什么要注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这因为商品交换既是农业系统联系其它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又是农业系统内部经济性联系和技术性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这些桥梁和纽带健全、发达，农业系统内外联系的“渗透”和“对流”就会十分畅通。当前，农村的专业户和重点户大批涌现，海伦目前各类专业户、重点户就有三万多户，接近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一新情况也要求我们必须用系统的观点看待和扶持专业户，从社会总体上把握和促进他们的经济联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第三，要坚持农业系统工程的有序性和动态平衡原则，实行系统运筹和控制，使整个农业系统协调稳步地发展。农业系统也具有动态平衡性。系统中的有序性就是在动态平衡中维持和变化的。农业系统的动态平衡，要受到人的积极性、政策、自然条件、社会因素、生产力水平等等因素的影响。从我们在海伦试点的情况看，要使农业系统处于优化结构，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考虑农业系统中的众多因素。如对自然条件、科学、技术、劳动力的文化结构和水平、人口、教育、管理等等，都要有一个统筹考虑，全面兼顾和合理安排，这样，才能使农业系统中的各子系统在农业的巨系统中的有序性与系统整体发展要求相适应，不至于出现农业的比例失调，从而使农业系统协调稳步地发展。

第四，要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的反馈原理，不断修改和完善农业发展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使工程目标和模式系列最优化和科学化。人们对于农业系统工程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加以补充、调整和完善。《二〇〇〇年的海伦》关于社会、经济、生态、技术系统总

体设计及模型系列，设计了三个台阶，即八五年、九〇年和二〇〇〇年。从系统工程反馈原理来看，在实施过程中，至少要注意两点，一是近期目标要细，要具体，远期目标可以模糊，有个大框框，逐年滚动发展。二是要逐年反馈，根据实践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修改和完善模型，使之更接近客观实际，更加科学化。

以上是我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总结海伦实践的一些粗浅体会。今年五月份我又到海伦侧重对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调查，感到海伦形势好于往年。但也有许多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新问题。一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家庭个体经营，专业户、重点户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二是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各业一起上的局面；三是商品生产大发展，流通领域开始活了；四是农村兴起了科学热。这些都给农业系统工程与农业现代化研究带来了新课题。从总体上看，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基本遵循了农业系统工程的理论，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标志着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目前，农村各业的发展，有的还缺乏统筹考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少农民是什么来钱就生产什么，缺少长远打算，特别是粮食生产，今年面临下降的危险，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造成农业比例失调，给农业发展带来新的困难。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我们要用农业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来组织和管理好当前的农业生产，为今后农业的大发展打好基础。党中央提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主张，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村出现的好形势朝着有利于农业系统整体发展的方向前进，既打破过去那种单一经营的局面，同时又使出现的多种经营协调发展，防止在农业

发展过程中，再出现只顾发展一业而忽视其它各业的片面性。因此，当前尤其要强调农业系统工程的整体性原则，注意从全局上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的发展。

对于农业现代化实验县以及推广农业系统工程的问题，有人提出要研究实验单位发展不快的原因，使其在经济上尽快起飞和有所突破。这无疑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就没有说服力。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系统工程的实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发展不快有许多原因，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个历史基础问题，如海伦县的农业基础就很薄弱。有人提出还有领导上对系统工程认识不足，对实验县支持不力，有关部门投资不足等原因，我看这些问题都应加以研究和解决。

现在，世界新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正在兴起，这将会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不但给我国农业现代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同时，也将会使我们加深和促进对农业系统工程的认识和研究。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良机，一方面迎接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注意吸取外国农业发展有益的东西，从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快学会和自觉地运用农业系统工程的原理来管理农业，创出一条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路子。

（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讲话）

第四部分 贸易经济

深入开展商业经济理论研究

为了实现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目标，党中央十分重视商业工作。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所以，摆在我们商业战线广大干部，特别是商业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深入开展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探讨新时期商业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把商业工作搞活，把商品流通搞好。

重视流通 研究商业

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流通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时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为，我们的生产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必须进行市场的交换和商品的流通。它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环节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要生产、要分配，也要进行交换，才能达到消费。而消费是生产的起点，又是再生产的起点，其中，在一个段落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同时，消费又是另一个生产的起点，分配与交换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在这里，生产表现为基础，起着决定作用，而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反过

来对生产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商品生产，没有交换，商品的价值就不能实现，没有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所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是不可分的，商品生产的流通对商品生产的生产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时指出：“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因此，流通是交换的总体，流通是商品所有者一切相互关系的总和，流通又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阶段。流通整个过程是由无数次交换活动所组成。我们社会主义商业，是组织商品流通的，它通过各种渠道和环节，实现着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转移，实现着剩余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积累。所以，商品流通是保证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过去我们讲生产资料不进入流通，实践证明生产资料也进入流通。因为，生产资料是计价的。所以商品流通对完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的周转和再生产都是起着重大的作用，也是条件和保证。

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要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商品流通。所以，我们现在讲农工商，不仅是重视农业，不仅是重视工业，而且在目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特别重视商业。否则，我们的农业、工业也发展不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化的实现。过去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如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及其相互作用的原理，在实践中只片面强调生产对流通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就必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还没有经验，这不仅在

中国，就是世界各个国家，搞社会主义的也常常是重视生产，忽视流通。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认为供应满足不了需要，是社会主义的一条规律，结果带来的是票证和排队。就连商品生产也不敢承认，谁讲商品生产，就打你个修正主义，孙冶方讲价值法则，就被打倒了嘛！现在看，还得承认商品流通，只讲分配，不讲流通是不行的。那种萝卜快了不洗泥，这边大量积压，那边排长队的状态必须改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品流通不仅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阶段，而且也是再生产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可以说没有商品流通也就没有商品生产，也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以要重视商品流通，其理论和实践的根据就在于此。

要重视商品流通，就要研究商业，要发挥商业的重要作用。商业是商品交换的一种发达形式，是专门组织商品流通的一个经济部门。而社会主义商业则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与生产、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商品流通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又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领域。工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国民经济发展的快慢，它们中间出现的问题和矛盾，都要在流通领域中，通过商业反映出来。各种商品数量的多少，质量的好坏，价格的高低，也要在市场上接受群众消费的检验。从一定意义上说，商业的购销活动又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镜子和晴雨表。例如，市场商品丰满不丰满，品种齐全不齐全，适合不适合人民的需要，是不是物美价廉，管理得好坏，都要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因此，搞好商业经济工作，对促进生产，引导生产，保障供应，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活跃市场，稳定物价，繁荣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商业的主导作用，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更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党的十二大提出，从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〇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左右。一九八〇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如果按相应增长的速度来推算，到二〇〇〇年将为八千亿元左右。这说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产品要进入商品市场，大部分通过商业的购销活动来实现其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可见，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就我国商业经济工作的目前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非常概括和明确地指出：“目前商业网点和设施严重不足，中转环节过多，市场预测薄弱，在经营思想和管理方面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思想上还没有彻底突破老框框，就是我们经济搞活、放宽得还不够，还是统得过死，包得过多，独家经营这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另外也有调查研究不够，调整改革还不力。所以，我们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改进商业经济工作。

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思想作风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使我们商业工作来一个新的转折性的变化。我们有些同志反映说：现在的买卖难做了，言外之意是过去的买卖好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过去是商品不足，实行统购包销，搞独家经营，产销脱节，很多商品满足不了消费需要，长期形成一种所谓的卖方市场，就是有啥卖啥，以卖方为主。结果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产品不讲质量。我们蔬菜紧张的时候，街上卖的菜是连泥带水，大

家还抢，东西少嘛！我们有的同志喜欢是这种状态，顶多是八成饱，最好别太饱，这样别人总得求我，把东西都卖出去了，而且我商业有权。这种状况，是反映我们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商化的经营思想和作风。现在不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经济形势很好。由于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和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随着工农业生产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活跃和繁荣。市场上的商品比较丰富，而且多家经营，积极竞争，消费者对商品不仅要求高，选择性强，而且是持币待购，开始逐渐形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现在一部分工业品已经出现了买方市场。老百姓高兴了，东西多了可以挑选，过去不让挑。所以，现在哈百一商店就提出了“顾客第一、质量第一”的口号，这就是外国人讲的“买主是皇帝”。这种形势，就要求商业必须按商品流通规律办事，按生产和消费者的需要经商，必须改变官商化的思想作风。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仍然墨守陈规，在思想上缺乏新的适应准备，在工作上缺乏按规律办事的能力和經驗。过去我们习惯于搞分配那一套，包啊！统啊！垄断啊！独家经营习惯了，经验比较丰富。搞开放，放开做生意，要竞争，要经常捉摸市场动向，这就不行了。特别是市场信息不灵，商品脱销不知道，产品到市场上有什么反映说不清，这都是不适应商品经济的规律，也就是所谓买卖难做的关键之所在。买卖难做，就需要我们学习理论，研究商业。商业是一门科学，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好多道路我们是摸索着走。所以，买卖难做之说，恰恰表明了新形势对商业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转变作风，适应新的局面，新的变化，乃是我们当前做好商业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

再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要根据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经济工作的一系列原则，对一些主要的商业经济政策，从认识上进一步提高，从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从工作上进一步实践和摸索。例如：在商品流通领域如何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商业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方向；如何改善经营管理，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提高商业经营的效益；如何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办好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如何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和加强物价管理；如何发展商业和加强商业自身建设，等等，我们只有努力把这些问题的研究清楚了，才能提高商业经济工作的水平，发挥商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必须下功夫研究清楚。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是我们党对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深刻总结而做出的科学结论和战略决策，是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重要原则。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是由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组成的，这两多，有主有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实行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计划管理，但是，国家又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产品都纳入计划，都通过计划管理，这就需要市场调节。搞好市场调节，对计划经济是有利的，起一种有力的辅助作用。所以，我们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必须明确。这当然也是我们现在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我们有好多东西供不应求，我们现在的粮食还不能不实行按人定量售粮制度，严格地讲这还是一种供给制性质的。现在凭证商品有相当一部分，虽然品种不多，但数量相当大。社会主义就是要自觉地按比例，而自觉地按比例就是计划经济。但我们不

能什么都搞计划，不能什么都搞指令性的；还要搞市场调节，把经济搞活。

当前，我们要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商业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规律。建国以来的商业经济工作，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正反两个方面都需要我们系统地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肯定经验，吸取教训，才有利于增强信心，继续前进。例如：就财贸部门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来说，这个总方针，总的讲，我们要发展生产，要保证人民生活。我们做好商业工作，提高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到生产和供应这两个方面。现在，提出新时期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城乡经济，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反映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原理，生产和流通的辩证关系。我们完整地、准确地掌握了这两个方面，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发展。当片面地强调生产而不发展商业的时候，就会削弱商业而不利于生产。对生产如果只讲服务，不讲监督，或者只讲促进而不讲引导，就容易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不利于保障供给。市场上就会出现大量不适销对路的产品，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的局面就难以避免。所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摸出一些新规律，找出一些新方法，从理论上提高认识，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商业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及商品经营管理体制和科学管理方法，并研究和吸取外国商业经济中的一些好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要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有关商品流通的理论，只有提高商业经济理论水平，提高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才有可能指导我们的商业经济工作，进一步提高按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我们有些搞商业经济实际工作的同志，常常忙于业务，而不注意商业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提高，甚至认为只要按着上级规定的商业经济政策办事就行了，没有必要进行商业经济的理论研究，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因为，第一，商业经济理论是商业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它反映着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和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掌握理论就能够预见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并能根据对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预见来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去指导实践。所以商业经济政策要以商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并接受商业经济理论的指导。第二，商业经济理论对商业政策有重大影响。我们党制定的商业经济方针、政策，凡是以正确理论为指导的时候，就是正确反映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我们的商业经济工作就前进，社会主义事业就发展。反之，我们的工作和事业就要受挫折，甚至失败。第三，执行商业经济政策必须懂得制定商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政策要由人去执行，而执行政策的人如果不掌握政策的精神实质，不了解商业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根据，就不可能自觉地贯彻商业经济政策和把商业经济工作做好，更谈不上用商业经济政策去宣传和动员商业经济战线广大干部和职工，发挥政策的作用。所以，加强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提高理论水平，正是为了自觉地贯彻党的商业经济政策，把商业经济工作做得更好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那种忽视商业经济理论，把商业经济理论和商业政策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学习和研究商业经济理论，不是少数人的

事，而是我们所有商业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大事。

讲究方法 结合实际

近年来我们对商业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有些理论脱离实际。表现有三种偏向：一是离开实践搞逻辑推理，二是缺乏定量的科学分析，三是搞实际工作的不注重理论研究。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实际效果，而且也很难提高理论研究的水平。马克思主义认为，方法的问题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根本态度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把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研究问题的态度，看成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要提高认识，讲究方法，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解决商业经济实践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具体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四个结合。

第一，研究商业经济理论，要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多年来，我们商业经济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这是一项十分珍贵的财富，有很多经验是我们花了高昂的代价换来的。这些经验需要我们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从理论上总结提高，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去指导商业经济工作新的实践。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懂得了昨天，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和预测未来。商品流通理论的研究，同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样，要有继承性，不能割断历史，要弄清过去历史的研究成果，要系统完整地搜集整理已有的历史资料，要了解这个领域中各种课题的研究情况和

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尚未解决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例如过去我们只讲分配不讲交换，不承认商品，不承认市场，违背经济规律，对很多缺的东西，管理得很严格，打入地下，形成黑市。这些问题，不研究是不行的。特别是现在的市场，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这个市场是个什么状况？而且因为国家的开放，外贸的发展，虽然我们的市场同国际市场社会性质不同，市场性质和情况也不同，但在一些方面已经发生联系，互有影响，应当仔细研究。有关市场竞争问题，成本问题，仓储建设问题，网点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我们只有注意这些实际问题，才能使我们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立足于最新基础之上，继往开来，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第二，研究商业经济理论，要同新的实践结合。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和“三多一少”，“按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流通体制，市场形势和商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由过去独家经营变为多家竞争，由商品紧缺到部分商品比较充分，由重采购转为重销售，这些新情况、新形势和新特点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些新的方针、政策、意见、办法等等，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说明和总结。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这说明了实践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实践是推动认识前进的动力。商业经济理论作为部门经济学，也应在商业经济工作的新实践中去获得新的认识，得到新的发展。斯大林说：“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应该是我们认识 and 解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准则。但在现实经济工作

中，却有很多同志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如搞商业经济理论的常常是脱离实际，文章一大篇，实践不沾边，空对空，不解决实际问题；而搞商业实际工作的又往往不注重理论，满足于自己的经验，靠老经验办事，工作中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不能够很好总结。要纠正这两个偏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去努力发展，既要避免商业经济理论工作者缺乏实践的“营养不良症”，也要避免商业经济实际工作者缺乏理论的“消化不良症”。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志既要认真掌握商业经济的基本理论，又要研究商业经济的实际，使我们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在总结经验和研究当前新实践、新情况、新问题中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第三，研究商业经济理论，要同自然科学结合。近些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各门学科的研究出现了高度综合、高度发展的趋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互相融合，不仅使研究对象相互交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相互借鉴。就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研究方法的创新，就不会有科学成就的重大突破。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作定性的分析，还要有定量的分析，有不少经济理论问题要做到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商业经济的理论研究，涉及到很多物质技术内容，如商业企业管理，市场预测，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还有的要用数学分析，例如，仓储、成本、时间、运输都需要数学，需要自然科学。从理论上讲，这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必然反映。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任何现象和过程，都是在质量的对立统一中存在和发展的。事物任何质的规定性都表现为一定量的规定性，没有量，质的规定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部门经济学，特别是商业经济学，要有数量的分析，要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

不然就不能认识事物，不能精确地认识它的规律。例如，只有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例、结构等进行数量对比的研究，才能认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面，研究商业经济理论，如果不精确地、及时地掌握这方面的数量及其消长变化的具体条件，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商业经济这一客观事物，也把握不了它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措施和办法，也就难以达到我们研究商业经济理论的目的。所以，在商业经济理论研究中，一定要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这样才能提高我们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第四，研究商业经济理论，要同其他有关的科研部门和经济部门结合。由于商业是社会再生产的中介，是国民经济的桥梁，它同生产、分配和消费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发生着密切的经济关系。这就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研究不可能孤立进行，而必须同其他有关研究部门相结合，同其他有关经济部门相结合。商业经济科学，它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它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市场供求规律时，就不能不研究货币流通理论和市场物价；在处理工商关系与农商关系中，要涉及到有关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研究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变化时，就要涉及到消费心理学和市场学等等问题。过去我们长时间不研究市场，现在越来越需要研究市场。我们在研究商业经济理论中必须结合研究相关联的问题，密切同其他有关经济部门和研究部门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商业经济研究工作从其他部门的研究和实践中得到印证，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更好地推进商业经济的理论研究，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发挥商业经济学会的作用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加强经济科学与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商业经济科学是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省商业经济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联合、组织和调动我省商业经济战线上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研究商业经济理论，发展商业经济科学，积极推动商业经济的发展，更好地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一，要做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的宣传员。我们商业经济学会要遵照十二大的精神，迅速打开商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作出贡献。商业经济学会成立以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办十二大文件学习班、研究班，宣传、论证党的十二大有关的经济理论、经济方针、经济政策和经济原则，做十二大精神的宣传员。要坚持经常办培训班、骨干训练班、专题研究班等，对各级商业经济学会工作人员和各部门研究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工作。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知识、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来武装我们商业经济战线上的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第二，要做商业体制改革的促进者。做好商业经济工作，必须接着党的十二大精神，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商业体制。要做商业体制改革的促进者，现在有好些问题我们得研究。统一的认识也是一个实践过程，是一个摸索过程。要经过调查研究，经过试点。要坚定不移地建立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市场必须以国营商业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多种经济形式竞争

对国营商业的压力，正是国营商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并且应深刻认识到没有集体商业的发展，没有个体商业的存在，不仅商品生产不能大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就是国营商业自身也很难巩固和发展。现在有好多新的问题，工农商联合体，农商联合体，工商联合体，农工联合体，批零结合，二、三级站结合，城市中心等都要很好研究。要坚定不移地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实行按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城乡流通有利于扩大工农产品的交换，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说没有商品就没有生产社会化，也就没有四个现代化。至今所谓生产社会化，离开商品生产，找不出别的路。我们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与商业批发或零售企业组成科研和经营的联合体，通过这种有效形式和途径，提高商业经济理论的科研水平。

第三，要做提高商业经济效益的顾问。现在，我们许多方面的经济效益很差，这种状况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为了实现二十年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强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商业经济学会要引导大家加强商业经济科学管理的研究，商业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商业经济理论可行性的研究。一方面要组织调动大批老商业工作者、老商业科学家、专家、老技工、老保管员，总结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请他们参加商业经济学会，发挥他们的智囊作用、参谋作用、顾问作用。另一方面要开展对商业企业的诊断，开展商业经济咨询服务，吸取有经济效益的建议，组织推广实施，对有客观经济效益的要按其经济效益的大小，提取一定的奖金，实行有偿的咨询，表彰和奖励商业经济理论科研成果，推动商业经济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提高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信誉和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经济效益。

第四，要做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监督者。人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的主人，所以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样，同社会主义商业经营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商业经济学会要发挥监督作用、检查作用；防止各种走私贩私，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各种不正之风，以及各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和问题。商业经济学会的会员要成为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义务监督者。

（本文是作者在黑龙江省商业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学术研究

从战略高度认识对外经济贸易

对外经济贸易，在我国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外贸是内贸的延伸和继续，内贸是社会主义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外贸则是与世界各种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这使我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与各种类型的市场进行交易，“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需”，“互通有无”，换取我们需要的东西。这里就有一个我们怎样认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的问题。我们的对外贸易与帝国主义商品资本输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搞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是为了剥削，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搞商品交换是为了交易，“互通有无”，他们由自由竞争到垄断，是谋取高额利润，是投机倒把、制造危机，大鱼吃小鱼，我们则是为了国家的四化建设换取急需的物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筹措一些建设资金。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力有限，不能做那些力所不及的赔本生意。国际贸易的斗争很复杂，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各个环

节。所以，对外经济贸易是搞国际经济的，这里是大有学问的，有很多问题急待我们学习和探讨。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导言》中，用了大量篇幅分析说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指出：“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说明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了”。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

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实践来看，我们搞国际贸易的目的是进行社会商品交换，是在国际上进行商品交换，目的是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换取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我们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的，但不能只搞自给自足的、带有某种封闭式社会主义经济。这种封闭式的经济，它所追求的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什么东西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究其原因，从客观来说，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不允许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应总结的经验。那时对外贸易数额是有限的、少量的。现在，我们是发展社会

主义商品生产，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在不断扩大，不断发展，今后生意是越做越大。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要坚持自力更生，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但也要借助外部的辅助力量，利用好外资和国际市场。这样，我们的经济力量就大了，就活了，四化建设的速度就会更快一些。只有重视并搞好对外经济贸易，才能在经济上与各国“互通有无”，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才能了解与掌握外国经济底数，时时进行比较，综合分析，吸取其有益的经济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总结了我国的实践，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决策。1981年秋季党中央又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就把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起来了，成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我们应当沿着这条战略方针，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我们对外经济关系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路子。当然，开展对外经济贸易，不仅要看到它的经济作用，还要看到它的政治意义。我们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扩大国际统一战线。

对外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还是很快的。几年来，我们已经和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出口商品额不断增加，1979年出口商品额为136.6亿美元，1980年为182.7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了33.8%。我们的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同期世界出口额增长率的11.5%，由1979年的占世界第31位，跃进到第27位。与几个主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出口额的增长速度相比较，我们已经超过了它们。

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在对外开放政策指导下，发展也是很快的。1981年收购额达到16.14亿元，比1978年增长28%。自营出口额达到13,360万元，比1978年增长近两倍。发展了具有黑龙江特色的上亿、上千万元的骨干出口商品有14个：石油、煤炭、航空油、石蜡、亚麻细布、大豆、蛋白粉、亚麻絮、蜂蜜、涤纶纱、棉纱、腈纶衫、钢材、轴承等。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显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跃进景象。

抓住对外经济贸易的战略问题开展学术研究

现在，我省的对外经济贸易刚刚开展起来，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必然要不断扩大，前景十分广阔。为了搞好对外经济贸易，为党政领导机关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外经济贸易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迅速跟上来。需要研究的方面是很多的，内容很宽，范围很广，不可能一下子全抓起来，应当着重研究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关键性问题和战略问题。

（一）研究对外经济贸易的增长速度，如何使之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问题。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完全是一回事，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指出：外贸比整个国民经济搞快一点，指标高一些是客观需要，是必要的，有条件，也有可能。这是中央对外贸发展速度的要求。加快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使它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其战略意义在于：用出口产品换取足够的外汇，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增强国内经济企业的技术优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加快我国四化建设的速度，增强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地

位。从国际上看，日本采取了外贸立国的政策。日本1955年出口总额为20亿美元，1960年增至40亿美元，1970年增至190亿美元，1979年猛增至1,000多亿美元。从1955年到1979年的25年间，日本的出口额增长了50倍，并获得了巨额财政盈余，大量顺差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国内工业生产力和银行的巨额外汇储备，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成为资本主义的第二经济大国。而同期日本国民经济总产值仅增长近14倍，50倍与14倍之比，两者速度之差是很大的。我们应当研究这些经验，要与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起来。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怎么办？要从中找出我们的出口发展战略和办法。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学术界正在寻找各种途径，积累大量资料，总结发展经济的经验。最近，我看到一家杂志介绍欧洲的西班牙，说西班牙是西欧的日本，靠大量引进外资搞有色金属矿，一下子，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欧各国，也超过了法国，出了名。过去，西班牙怎么能同法国相提并论呢，西班牙的舞蹈有名，斗牛有名，别的都没有名，现在就不同了，在美国买不到的东西，它都有。所以，我们要理解出口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问题，也是搞国际贸易的同志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二）研究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生产制成品出口和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搞进口原料加工出口问题。

一是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搞深度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搞深度加工，就是多搞几次加工，加工一次就增加一次价值，加工得越深，产品的附加价值就越高。在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条件下，充分利用、节约利用国内资源，搞深度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我们黑龙江的糖。从甜菜里榨出糖，有各种各样的原糖，有

红糖，有白糖，也叫旗白糖，雪花糖，通称为绵糖。原糖加工成糖块就可以在市场卖块糖了，这叫作初级加工。外省把我们的糖块买去再搞一次加工，加工成包馅的各種糖果，包装再搞得高级一点，提高了产品附加价值，把钱就挣了。可以比较一下，一斤糖块才一元四角来钱，中档糖果是三元左右，提高了一倍的价值。如果把原糖加工成巧克力、酒糖，那它的价值就更高了，酒糖一斤市场上是四元八角到五元多，比原糖的价值高出两倍多。所以，搞一次加工，提高一次价值，加工得越深，产品的价值就越高。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出口的产品要提高质量、档次，改进包装，提高履约率，增加花色品种，只要这样做了，同样的东西，利润可以成倍地增长。”这里面，除上面说的充分利用我国原料资源搞深度加工，提高附加价值以外，还有一个提高履约率的问题。搞国际贸易要特别讲究信誉。过去不讲信誉，与人家订了合同，正好赶上个好价钱，可是到期不到货，等过了节气价钱落下来了，我们的货也到了；有的包装还不好，摔个稀巴乱，破损率达百分之一、二十。这样干人家谁还敢与我们做生意？目前，我们有些出口产品不仅品质低次，而且成本异常昂贵。形成长期亏损，阻碍了出口的扩大。另外，还有两大环节，先是收购，收购的商品在仓库里存上，然后再去卖，经过两道手续。外国人做生意讲的是期货。有期货票，拿着期货票子做生意，货没有到就拿期货票子倒了好几把手。而我们是把货存在仓库里再卖，那咱们的生意能做得过人家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改革产品出口结构：由原料、初级产品加工为最终产品；由品质低次的产品向高档化、多式样化、多品种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名牌产品出口，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从生产战略上讲，出口制成品的比重越大，质量越好，就标志着对本国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技

术装备综合利用得越好，发挥得越好，为国际市场提供的商品就越多，换回的实物补偿和资金积累也就越大，扩大再生产就有了物质和资金的保证。

二是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发展进料加工产品出口。我们国家劳动力多，工资比较低，生产成本也就低。因而，搞进料加工产品出口，这是发挥我们劳动力资源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日本、新加坡、南朝鲜、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资源与我们祖国的资源比差得远了，但都较快地发展了经济。他们的主要办法，就是发展了进口原料加工再出口。比如，香港的手表业，大部分机件是从瑞士、日本进料，然后加工装配出口的，1977年超过了瑞士，1979年赶上了日本，跃进到世界第一位。所以，赵紫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要大力发展沿海城市的进料加工出口，内地有条件的也可以搞来料加工，这是非常正确的。这一点，在实践中我们已经有了体会。我省组织进了一百万件毛腈混纺织品加工出口，就盈利600多万元人民币。1981年组织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收汇额达155万美元，比1980年的126万美元增长了23%。还解决了加工厂吃不饱的问题。外贸部门这件事做得好。但我们的路子还很窄，不够广阔；目前还仅限于纺织等行业。今后应搞更多的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贸易，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劳动力资源。这些都需要切实地加以研究，提出科学论据，供领导部门决策，把这些出口贸易搞上去。

三是研究如何面向世界，积极发展国际劳务合作。我国的国际劳务合作，刚刚起步。1981年，按合同派在国外的劳动力1.7万多人。中央领导指出：“这同我们的潜力相比，同国外的需要相比，特别是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做的事情还是太少太少了”。我国建筑业对外承包工程，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相当强的竞争力；同时又带动了国产

建筑材料的出口。可见，这件事确实是大有可为的。我省在中央统一安排下，国际劳务合作也在起步。1981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先后与伊拉克、利比里亚、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洽谈，已谈成了五个项目。今年已同北也门签订三项技术服务合同，并正在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和技术服务业务；今年按投资包干形式已承担为缅甸援建一座体育馆，计划三年左右完工。通过这段实践看，我们在国际上最有竞争能力的，还是劳动力。我省工农业门类齐全，有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也占有很大的优势。今后应研究在国际上多开辟一些门路。诸如，项目承包（投标前活动、项目施工、建成后服务）、工程承包（出租所有全套操作人员的大型施工机械）、成套设备出口的安装调试、技术出口、劳务技术服务（厨师、研修生）、技术转让和服务、机械设备出口及零配件供应服务等等，内容十分广泛，我们要解放思想，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可以安排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能赚取外汇。

（三）研究如何以自力更生为主，正确利用外资来发展我国经济的问题。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政策。1979年以前，我们没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过债，1978年大规模进口的22个成套设备，几乎全是用现汇支付的，一下子花了这么大数字的现汇，弄得很被动。1979年以来，我们已在海外筹措到条件比较有利的外资，共折合173亿美元，但实际上，到1980年底我们使用得还不多。在如何利用好外资问题上，我们还要提高认识，要把利用外资提到经济、政治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过去，我们没有把利用外资纳入国际范围来考虑，没有进入国际市场，吃了很大的亏。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在引进问题上，我们要准备付一点学

费，一个时期吃一点亏是不可免的。但对四化建设有利。与资本家打交道，他的资本绝对不会白给我们用的，总是要付给一定利息的。陈云同志讲：“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所以，我们同资本家做生意要认清他是资本家，借给你钱不得到一定的利息他是不干的。资本家是很会作生意的，他借给你钱，这一面让利30%，表面上是好朋友，那一面卖给你东西又赚回去了，是百分之百的利润，他都捞回去了。列宁说过：“只要获得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勒索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所以，或者是有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或者是什么也没有。谁对于这个问题有另一种提法，那他就是丝毫不懂得实际的经济，就是只会说风凉话。”列宁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我们所得到的将是主要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巩固起来，最终站立起来，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

这在我国也得到了实践证明。最近两年，我们利用外资与日本、法国在海上合作勘探开发石油的四个项目，大大加快了海上石油的开发，在渤海、南海都已打出好的油井，过一个时期就可以形成生产能力。利用外资开发煤炭，搞补偿贸易，搞港口建设，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我省近几年来通过国家与外国开始进行了一些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项目，如火庆30万吨乙烯设备，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低息贷款，在安

达、富裕、杜尔伯特建设的草场；与日本合资建设的三江洪河农场；中日两国在三江平原龙头桥典型区进行勘探设计规划的技术合作；利用丹麦的贷款在安达县建设乳品厂，等等。我省还自行与日本合资采取补偿贸易方式办了卫生筷子工厂、牙签厂等小型项目。不仅搞了大、中型利用外资的项目，社队企业也开始搞利用外资的项目。1981年省社队企业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意大利外商合资建设亚麻联营公司，生产规模为五千锭。今年又与外商搞了细木贴面板厂、大理石开采、山野菜加工等合资项目，产品均供出口。现正在筹建与外国合资开发我省煤矿、铜矿、以及乳制品、林产工业等一百余个项目。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今后在利用外资上，主要还是向合作、合营方向发展。同时还要引进原料、引进管理经验。我们应当抓紧研究如何为引进外资创造条件，在几年之间能有个相应的发展规模。要懂得利用外资是附有条件的，多数不是自由外汇，即是要用它来购买设备，而土建等投资则要内部的投资，要有内部投资加以配套，因而有些外资没有内部投资也是不能发挥作用的。所谓买方信贷，我们要懂得，还要有附加条件才能使用，并且是利息很高的，甚至是7%至13%以上，低息的很少。只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的粮农组织等利息低些。必须要懂得这些国际金融业务的基本知识，才能研究如何利用好外资，发展我们省的经济。

（四）研究如何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搞好运筹的问题。这是对外开放方针的基本方面，我们必须有个明确的认识。

从理论上讲，对外开放的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的大生产更加国际化了，国际贸易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技术贸易、资本输出输入、劳务服务、旅游经济等，都呈现出扩大趋势。现在采取那种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方针，是绝不可能带来一国经济的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我国的经济建设适时地采取对外开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从实践来讲，由于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教训也是深刻的。比较典型的就是机械工业，长期以来搞自我循环，产销脱节，既不为国内市场服务，也忽视了国外市场。自1965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的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回顾六十年代，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水平，虽然比不上先进的工业国家，但比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强得多，起步比他们早，基础比他们雄厚。由于我们不利用国外市场，不重视普通机械产品的出口，不引进技术发展机械工业，现在，已远远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65年我国机械产品的出口额已达1.66亿美元，而当时的印度、巴西、新加坡、南朝鲜都不如我们，他们的出口额一般不过几千万美元。可是由于他们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十年以后机械工业大发展，出口额成几十倍的增长，我国没有利用国际市场，机械工业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国际国内的实践证明，利用国际市场和利用不利用国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快慢影响是很大的。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变单一自我循环为内外两个循环，才能促进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获得新的活力，收到更加实惠的效益，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利用好两个市场的关键，是搞好运筹。两个市场，两种性质，两种矛盾，如何利用确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我们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是不同

的。前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后者是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两种社会生产目的对比，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由于计划体制的不同，也带来不同的影响。有的，是不利用市场调节；有的，是利用市场调节。我们过去是习惯不利用市场的竞争，搞那种机械式的指令性计划体制。这种体制影响了商品经济和生产的发展，我们的商品不多，所以市场上是以票证限制为主的商品交换。这就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卖方市场，就是有什么就卖什么，我卖什么你就买什么。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往往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你说质量不好，还有人抢着买呢，用不着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改进花色品种，许多产品是三十年“一贯制”。过去，还有人为它辩护，仿佛社会主义市场就应当如此，就应当永远供不应求，还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种卖方市场的弊病就是不进步，调动不了人们的积极性，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很不方便。我们正在本着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精神，进行体制改革，通过市场促进生产的提高与发展。现在，我们的市场情况开始变化，商品越来越丰富、质量有很大提高，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些商品卖方找买方，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是买方市场，但它的目的是实现高额利润，因而生意难做，竞争十分激烈，人民手中无钱，好多商品卖不出去，导致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的买方市场则不同，它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发达的表现，它的前提是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会导致经济危机。这与资本主义有根本的区别。

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上，解决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矛盾，如何利用国际

市场来促进国内市场的良性循环，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来搞活经济，这是一门新的学问。

现在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应当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善于经营，通过交换，通过国际贸易，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农业、工业的大发展。一个时期进口什么，出口什么，用什么换什么能收到最佳的经济效益，这是市场战略和销售学、运筹学所要求的。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取得新的成果。而两个市场的运筹，它的基础研究，是对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研究，必须以国际政治学为基础，对国际上的帝国主义、跨国公司、金融财团做深刻分析，不然就做不好生意，受骗上当。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他们瓜分市场、瓜分世界，控制战略物资，划分势力范围，争夺能源都是以他们的全球战略为基础的。因而要研究三个世界的动向，研究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动向，这是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国际经济贸易是综合性的学科，是同国际政治、经济紧密相联系的，要很好地研究这些基本问题，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服务。

研究发挥我省对外经济贸易的优势和潜力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外贸方针、原则，是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充分发挥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力量，积极打到国际市场上去。外贸也好、外经也好，根本方针是统一领导，分头经营，发挥两个积极性。“肥水不落外人田”。这是我们研究和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一）要深入研究我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优势和潜力，打到国际市场上去。

首先，我省耕地面积大，荒地资源多，土地肥沃，人口

较少，增产粮食的潜力很大。我们正在建设商品粮基地，如果我们科学种田搞得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们增产的粮食除了供应国内需要之外，可以减少国家进口，甚至还可以用一部分调剂周转的粮食搞国际贸易。这两年日本就多次和我们商量，要我们建设现代化的饲料加工厂，给日本提供饲料，我们粮食多了，这个买卖还是可以做的。我省还有大量耕地，适于种甜菜，可以榨糖发展高级糖果，组织出口。大豆、亚麻、土豆是我省的特产，有计划地发展大豆、亚麻、土豆生产，也可以在外贸出口方面大做文章。

其次，我省森林面积较大，木材蓄积量占全国的17%，居全国首位。目前原木产量和调出量都占全国第一位。我们正在建设以营林为基础，以木材综合利用为中心的林业基地。我们的木材在供给国内建设需要的同时，也可以搞些出口贸易。日本人买我们的硬杂木山槐、水曲柳，折合人民币1,000多元一立方米，比红松贵多少倍，出口还是合算的。我们还可以搞木材的综合利用、深度加工，生产更多的木制家具出口。

其三，我省是“六山、一水、三分田”，荒山草原多，松花江、嫩江流域和东部三江平原地区，虽然多年开垦，仍有荒山草原七千多万亩，发展畜牧业具有良好的优越条件；野生动物资源也非常丰富，皮毛兽全国有70多种，我省就有39种，占全国的51%；我省河流众多，水域面积达3,080万亩，经济鱼类有50多种；特别是，我省山产物资丰富，人参、鹿茸、刺五加、木耳、蘑菇、松籽、山葡萄、山野菜等，品种繁多。这些畜产、水产、山产的资源条件，为我们组织出口生产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只要我们认真组织，充分利用，外贸出口是大有可为的。

其四，我省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是国家重要煤炭生产基

地之一，已探明的煤炭资源丰富，多为优质煤。现在年产量达4,000万吨，占全国第五位。我省还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石油现在年产量5,000多万吨，几乎占全国生产量的一半。就储量和产量来说，都占全国第一位。从煤炭来讲，每年出口给朝鲜100多万吨。现在日本人多次和我们洽谈，要搞煤炭生意，如果我们生产发展得快，将来也有可能拿出一部分同日本搞交换的。至于石油，我们争取利用大庆的一些石油副产品，搞深度加工成各种产品出口，也是大有可为的。

其五，我省机械工业力量雄厚，技术装备比较先进，特别是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几个大中城市，机械工业的优势很好。现在，我省有一些机械产品已经打入国际市场，如电站设备已经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供货；哈尔滨轴承厂的产品已经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生产的出口钻头，经过调整，产量递增300万件，销路稳畅；齐齐哈尔机床厂和哈尔滨第三机床厂生产的机床，已经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工业比较先进的国家受到欢迎，大批量订货。这说明，只要我们努力，产品对路，质量搞得好，是可以闯入国际市场上去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要充分发挥优势，大力挖掘潜力，机械产品出口的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另外，轻工业虽然还是一个短腿，可有些产品也是可以创造条件出口的。事实上，我们有些轻纺产品出口，已经受到国外客户的欢迎。牡丹江纺织厂生产的“红牡丹”牌涤棉纱，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名牌产品，1981年出口数量剧增为1.1万件，比1979年增长了7.3倍，占全国同类出口产品的四分之一。近年来，苏联急着要和我们搞边境贸易，我们有些轻工产品在国内销路不畅，但对他们来说还是快货。最近我

们已经和苏联开展边境贸易，我们可以组织各种日用百货同他们交换我们需要的物资。

(二)要研究如何把我省经济同国际国内市场联系起来。

首先，从国际经济分工来说，国际经济分工要看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一个国家社会分工超出国家界限的结果，是各国生产者通过世界市场在生产上的联系和延伸，是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联系的基础，国际贸易则是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表现形式。

十八世纪末发生的以蒸气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国际上的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分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使少数国家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成为农业国或矿业国。这种分工实质上是殖民体系的经济表现。二次大战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又使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总的发展趋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向技术水平高、耗用资源和能源少、产值高、利润大、公害轻的产业方向发展；而把那些技术水平低、费劳力、费原料、产值低、利润小、公害严重的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了。现在，国际上新的分工是，把“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而发达国家则向高级“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方向发展。

我省的情况是原料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多，缺乏资金，应当多发展纺织、服装、抽纱等产品出口，为四化建设积累资金。同时，要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过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根据马克思“生产要素价格平均化”规律，研究国际经济分工。

其次，关于沿海与内地经济分工，发挥地区经济优势问题。紫阳同志指出：“在沿海工业逐步转向加工出口产品，转向高精尖产品的同时，要把一般产品逐步让出来由内地生产”。我省应在保证完成国家原料调拨任务的前提下，对超额部分，作出当前的、长远的安排，把原料变成制成品，以供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对于“资源密集型”的原料产品，包括农、林、牧、副、渔、山产、土特产品，应发动群众生产，并组织进行初级产品加工，为内销和出口提供充足的货源。这类生产，不需要多大投资，加工技术简单，只要生产、收购政策能作相应的调整，就可以把资源优势发挥出来。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投资少、工时耗费多的轻工业产品，多系农、林、牧、副为原料的二次加工，甚至三次加工为最终产品的。比如食品、抽纱、肠衣、制革、木家具等。应组织城镇街道、公社，以安置待业青年为主，发展中、小企业生产这类产品出口，为财政积累资金，为就业开辟门路。

对于“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产品生产，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高级技术，才能生产出最终产品。一是，可与沿海加工区发展各种经济联合体，也可搞技术、设备转让，在我省设工厂，由他们出技术、转让设备，搞国内的合资经营；二是，利用国外短期的、长期的低息贷款兴办工厂，搞化工、机械、煤炭的补偿贸易；三是，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如林产品加工、矿产品加工、石油产品加工等。

其三，关于到国际市场上去做生意问题，我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大豆及豆制品、亚麻制品、山产品、土特产品、石化制品、机械产品，大多数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货。我们应放开手脚，打到国际市场上去。打出去做生意的主要

形式：一是在新加坡、日本、港澳搞独资或合资的贸易公司；二是在纽约、巴黎、伦敦、汉堡等地的“中国贸易中心”派驻贸易代表；三是在国外搞独资或合资的大豆制品厂、裘皮加工厂、饲料厂等；四是合资举办租赁贸易、远洋运输、中转仓库等。这是我省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一个新的转折，应做好可行性研究，尽快做出成效来。

（三）要学会国内工作和走向世界的两套本领。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要向全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经济工作这一行，几十年来我们少数同志学得不错，比如陈云同志，还有这些年来紫阳同志。但是必须指出，多数同志没有学会。不这么尖锐地提出问题，就缩小了我们的任务，就缺乏自知之明，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学会两套本领，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特别是要掌握好走向世界的本领。从我省基础情况看，要比沿海城市更差一些，更薄弱一些。上海有四百人的外销员队伍，而我们经外贸部考试发给外销员证书的，既会外语，又能谈判的人，只有十四人，真正优秀的不多，现在外国厂商进来谈判都应付不了，将来主要是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做生意，要求就更高了，那就更应酬不了。怎么办？国际贸易学会要把为外贸培养人材，扩大队伍，提高质量这项繁重任务担当起来，要逐渐培养大批优秀的外贸人材，要使他们有熟练的外贸业务知识。

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决不会因为同我们进行经济技术交流，就改变他们的资本主义本性。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对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抵御能力，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行为。增强我们队伍的战斗力。

原载1983年4期《学习与探索》（内部版）

第五部分 人口与劳动经济

加强劳动保护 搞好安全生产

一、把安全生产和群众劳动保护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企业的主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理所当然地要把保护职工群众的安全和健康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我们党历来是关心职工安全和健康的。早在中央苏区江西，就颁布过《劳动法》，并设劳动保护工作机构。建国后，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对做好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都曾多次作过重要指示。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等三大法规，给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立了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尽管当时百废待兴，国家财政很困难，还拨出二亿九千万元用于改善企业的劳动保护设施。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着手解决十年浩劫给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造成极大遗患。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专门发了两个文件，同时宣布过去政务院、国务院发布的各项法令、条例，在没有新的规定之前继续生效。现在，国

家正在制定《劳动法》、《劳动保护法》、《女工保护条例》等，建立健全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以促进劳动保护和全安生产，保证四化建设顺利进行。

我省这些年在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过去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破坏，伤亡事故频繁的被动局面至今还没有得到扭转。在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方面，我们同安全管理工作先进的国家相比，差距也是很大的。我省二轻系统一些单位尘毒危害也很严重，每年上缴给国家的利润不少，而不少集体所有制企业设备落后，劳动保护条件很差。几乎没有什么劳动保护设施，尘毒浓度、伤亡事故都比国营企业高得多。有些行政领导对女工劳动保护工作重视不够，有的根本不懂得女工保护都包括什么内容。按着国家颁布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女工超过一百人的企业应该设立女工卫生室，要有冲洗设备，还应设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可是在我们的一些企业中还没有这些设施。这些问题不是小事，不仅严重地影响女职工的身心健康，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劳动保护的这种严重状况，是应大声疾呼的。

我还想说一说环境污染问题，因为它和劳动保护工作密切相关。我省的环境污染也是相当严重的。目前，我省每天要排放五百三十万吨工业废水，再加上吉林三大化工厂流来的废水和生活污水，共八百多万吨，都流入松花江水系。在这些水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严重影响了我省人民的健康。有些地下水也被污染。大气污染也很严重。全省民用、工业用的大小锅炉每天排放“黑龙”，化工厂每天排放“黄龙”，水泥厂每天排放“白龙”，炼钢厂每天排放“红龙”，这四条龙严重污染了大气。环境的污染不仅影响人的健康，也破坏了我省的资源。有些企业和城市里噪音很大。这种状

况要长期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是要造福于人民的，可是，我们现在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状况，还非常薄弱，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吗？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就要影响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严重失职。大量事实和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情况不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是相当严重的。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把安全生产这项人命关天，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摆到重要日程上来。最近，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中严肃指出：“渤海二号”的事故，不仅是对石油部门的一个严重警告，也是对全国其他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一个严重警告，安全生产是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头等大事，国务院这个决定，把安全生产问题提得很高，要求得很严，我们决不能再漫不经心了。

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安全生产方针，正确处理生产与安全的关系

许多事实证明，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对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问题不重视，企业的安全生产情况不好，主要是他们对生产与安全的关系没有摆正，认为生产是硬任务，安全是软任务。因此有些领导干部只抓生产，不抓安全，只关心物，不关心人，甚至把生产和安全对立起来，谁完成了生产任务，谁就是好家伙，不把工人生命和健康放在心上。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搞好安全生产，保护职工的安全和健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如果在生产中危害职工安全和身体健康，致使工人死亡，这种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生产，对职工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使我们的生产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的法规、条例。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抓生产的同时，必须抓安全。不安全就不能生产，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谁要是违背它，就要受到惩罚。我们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当工人看到那种经常出伤亡事故的现象，生产情绪能高吗？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人是生产力的三要素中的主要因素。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就要求我们保护人。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不保护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就是破坏生产力，生产建设事业就不能向前发展。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语中告诉我们，“人本身是人”，就是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就把工人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当作任意买卖的商品，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旧社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采取野蛮、掠夺的办法进行生产，劳动条件恶劣，不管工人死活。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家，为了缓和同工人的矛盾，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不得不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资本家的本质没有变，但剥削手段变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把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把安全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条件。搞好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就可以更好地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建国三十年来，国民经济三起两落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国民经济发展快的时期，劳动保护工作都搞得好的，伤亡事故也少。党的安全生产方针，就是在过去这些无数次沉痛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但是，有一些人却没有按照党的安全生产方针办事，他们认为，“产量拿到手，一俊遮百丑”。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即贯彻中央有关安全生产的指示文件，走形式的多，采取具体措施的少；空喊口号的多，解决问题的少；有些领导单纯抓生产时候多，过问工人生命安全的时候少。为什么有的工厂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伤亡事故呢？就是那里的领导者不重视安全问题，没有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有那么一些官僚主义者，不了解生产第一线的情况，不钻研生产业务知识，不尊重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习惯于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指挥生产，热衷于搞所谓的“高产会战”。为了追求高指标，就在那里瞎指挥，强迫工人冒险蛮干，破坏那些行之有效、用鲜血换来的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从已经发生的重大事故中，总结和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而是无动于衷，采取极其轻率的错误的态度。这反映出，“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还没有肃清。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搞生产，搞建设，不是打仗，不能把“生产”和“打仗”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即使在战争年代里，也是强调要以最少的牺牲，获得最大的胜利。现在是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就得讲科学，按照生产规律办事，要尽量避免各种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明确，在生产过程中，如果遇有生产和安全发生矛盾时，生产要服从安全。

有些干部对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采取“马虎、凑合、对付”的错误态度，对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干惯了，看惯了，习惯了，不以为然。就是因为这些年我们有的干部不

讲科学，不讲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讲法纪的结果。最近，国务院对“渤二”事故的处理，就充分说明我们党和国家对改变这种不重视安全生产状况的决心，这也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既要加强教育工作，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法制

我所以要讲这个教育和法制的问题，一是因为教育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为了达到重视安全生产的目的；二是从我们工矿企业的现状出发，也必须从这两方面加强，特别是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科学知识的教育，尤为重要。从过去发生的事故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和工人违章作业所造成的。现在企业里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后进厂的，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技术培训，没有很好对他们进行安全生产教育。缺乏安全生产知识，操作技术水平低。有的工人违章作业，不遵守技术操作规程，进行蛮干。有些管理人员缺乏科学知识，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群众的意见，致使重大人身事故不断发生。最近，哈尔滨连续发生两起触电的伤亡事故，死的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工人。这些血的教训我们应该记取。因此，要大抓安全教育，加强对工人的技术培训，迅速提高工人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是实现安全生产的一个可靠的保证。工会组织要充分利用职工业余学校、工人俱乐部等阵地和各种宣传工具，对工人和干部开展安全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在企业里要把这项工作形成一个制度。新入厂的工人，不经培训，不经技术考核，取得操作合格证，一律不准上岗。过去有三级教育制度，今后要恢复起来，技术要求高的工种更要严格把关。许多煤矿每周都有固定的安全活动日，把安全教育活动经常化。今年国务院又决定，今后每年五月份定为“安全月”，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安全月活动，利用各种有效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开展安全大检查，及时消除各种不安全的隐患，促进生产安全。我们应很好总结经验，把安全教育活动制度化。

过去，由于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干部和职工中的法制观念也很薄弱。今后，各级党政部门和工会一定要对广大干部和职工加强法制教育，要广泛宣传 and 认真贯彻中央〔78〕67号文件和国务院〔79〕100号文件，宣传国家在一九五六年颁布的三大法规和去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以及《刑法》中的有关条文。待《劳动法》、《劳动保护法》、《女工保护条例》等重要立法公布之后，要广泛地进行宣传，造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各级干部和工人，都要增强法制观念，自觉地遵守党和国家制定的各种劳动法规，严格执行企业的生产技术安全规程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安全生产。

“渤海二号”这一重大事故，值得我们吸取一条重要教训。就是多年来，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赏罚不明，纪律松弛的现象。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以教育为主；但是，犯有严重错误和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就必须按实际情况，给予应得的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处分。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严肃指出：“一切重大的责任事故，必须严肃处理，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不得姑息宽容。”

对于那些目无法纪、玩忽职守，因瞎指挥，搞蛮干而造成事故的，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坚决按照《刑法》有关法律条文规定，严肃处理。各级检察院和法院执法一定要严格，绝不允许姑息迁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有犯了罪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殊公民”。各级党的

纪律检查部门也要管，各级工会组织也要管。要替工人说话，必要时，要代表工人向检察院控告那些造成重大恶性事故的直接责任者。再也不能象过去有的地方那样，出了事故层层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久拖不决，草率从事。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78〕67号文件的第二条精神办事，如一个企业单位发生了重大伤亡责任事故，首先要追究厂长、党委书记的责任，根据故事情节轻重，严肃处理，不能姑息迁就。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事故多，伤亡严重，要追究那个部门和地区的领导的责任。

四、必须把专业管理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搞好劳动保护工作

为了搞好劳动保护的安全生产，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强化各级劳动部门工业管理部门的劳动保护、安全监督机构，加强安全监察工作。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工会组织受害甚重，整个工会组织都被砸烂了，至今工会组织作用和各项活动还没有完全恢复起来。同志们都知道，从一九五八年错误地批判赖若愚同志所谓“监督论”、“保护论”以后，各级工会劳动保护部都撤销了，工会干部也不敢抓劳动保护了，群众监督也不敢提了。

邓小平同志在工会“九大”致词中指出：“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工会组织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去年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又指出工会要成为工人群众的“重要代表者”，要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最近万里同志又说：“《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讲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在内。如果你们掩盖这一类问题、掩盖我们的矛

盾，不代表工人讲话，最好不干这个工作”。万里同志这种讲法我是赞成的。因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那就要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我认为首先就要维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使他们身体健康不受危害。如果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得不到保障，工会在那里坐视不管，那你就是失职。这样的工会组织就必然严重脱离群众。

我们应当看到，由于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在工会干部头脑中还有一些无形的禁区。这主要是工会在历史上几次挨批，给工会扣上了“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社会民主党倾向”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文化大革命又给扣上了修正主义路线，“三会一团”的罪名。这些反动流毒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肃清。工会干部被批得象惊弓之鸟。怕前怕后，怕左怕右，几乎成了工会干部的“职业病”。现在，这些帽子虽然摘掉了，而“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余毒在头脑里还没有消除。因此，有些工会干部对抓劳动保护工作，组织群众对安全生产实行监督，就怕犯“工团主义”错误，怕说是“与行政分庭抗礼”。必须指出，工会组织群众监督各级行政领导抓好安全生产和工人劳动保护工作，同不顾工人死活的官僚主义者作斗争，职工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不顾工人死活造成事故的领导者，这非但不是“工团主义”这正是积极维护党纪国法，维护党的威信。

当然，我们工会要正确使用这个权利，应与行政有关部门共同配合，做好这项工作。工会和行政互相合作，互相制约，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工人利益，避免犯错误。目前有些工会干部心有余悸，说什么“让我们替工人说话，谁替我们说话？”应该打消这个顾虑，党组织就支持嘛，上级工会就会替你们讲话。各级党委和行政都要支持工会代表工人利益讲话，绝不允许因为工会行使正当的监督权利，而对工会干

部进行打击报复。谁要是搞打击报复，就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都给了工会在这方面工作的权利。

工会对劳动保护工作要自下而上地组织群众监督检查，还要有一定的形式，要有一套办法。首先，要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工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要组织职工代表认真讨论企业的年度生产计划和实现计划的措施，要组织职工代表审查企业有关劳动保护措施经费的提取和使用情况。要定期组织职工代表视察组检查职工代表大会有关全安全生产、职业病、环境保护方面的决议的实施情况。发现问题，要督促行政采取措施，努力实现。其次，可以采取签订集体合同和劳动保护协议书的办法，把劳动保护项目、经费、实现措施落到实处，并监督检查实现。要建立健全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群众监督网，发挥日常监督作用。工会要参加对重大伤亡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工作，要坚持“三不放过”的原则，查清原因，并代表工人提出处理意见，使问题得到严肃处理。另外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工会也要管。根据国家规定，今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安全卫生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必须有劳动、卫生、环境部门和工会组织参加。只有经这些部门同意和签字后，才能施工和投产。

上述这些都说明，工会组织在群众劳动保护和全安全生产方面所担负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党和国家，广大职工群众，对工会希望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会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既要敢于独立负责，大胆工作，又要谦虚谨慎，注意工作方法。在企业工作中，工会和行政有时在某一个问题上可能发生矛盾，但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只是分工和角度不同。要提倡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相互通气。监督本身也是积极的，与人为善的。当然，对个别不关心职工死活的官僚主义者，民愤很大的，我们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这种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和帮助。

（本文是作者1980年9月5日在全省工会群众劳动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努力开创劳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如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促进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开创劳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新局面？下面就这一问题讲几点意见。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行动纲领，也是我们劳动工作战线、劳动经济工作和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的行动纲领。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我们劳动理论战线肩负着非常艰巨、极其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劳动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把发展科学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党中央所提出的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劳动经济科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部门经济学。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我国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

“要进一步组织各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社会科学各部门科学的研究，特别要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用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做出贡献。”对我

们的要求是很殷切的。在四化建设的实践中，当前对劳动经济学提出了很多急待研究解决的课题。我们的理论与研究与四化紧密相关。生产总要有劳动者的劳动。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是生产的几个基本要素，劳动经济学是与生产紧密相关，与四化紧密相关的科学，我们要把耀邦同志提出的发展科学是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的指导思想作为劳动经济学会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必须遵循的方向和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在贯彻党的“调整、整顿、改革、提高”八字方针中，要从改革入手。在认真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同时，认真研究劳动工资、劳动制度改革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勇于探索，走出新路。

一、要深入研究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与经济效益问题

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核心问题，作为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出发点，这是我国经济战线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效益问题，是经济规律的问题，怎样取得最大的效益，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这是我们经济核算的根本要求，也是经济管理工作、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个核心问题。提高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强调经济效益这个根本转变，迫切要求我们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经济效益问题，探讨提高经济效益的各种途径。必须明确，在经济改革中，提高经济效益是总体战略中心。经济效益就是价值，不是简单地追求使用价值，而且要追求价值。因为我们的产品还是商品，如果不讲求经济效益，生产就会难以为继、就搞不上去。

过去，我们长期在经济工作中单纯地追求产值和产量的增长，这是我们缺乏经验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我们只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常常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生产一些不怎么符合需要的产品，甚至于完全不符合需要，人民不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生产出的产品人民要得到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的利益。一些产品的成本中实际上包含了无效劳动，如大跃进中大炼钢铁，追求的是钢铁的产量，连质量都不大注意，成本更不要说，最后就形成许多无效劳动，无效劳动换句话说就是浪费性开支，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我国经济要顺利向前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劳动工资是否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成为我们当前改革的关键。比如大炼钢铁这种浪费，是很明显的。有许多虽然不这样，但却形成了积压。如我们钢料积压厚板多，大型钢材多，缺小型钢材，缺薄板和特殊钢材，积压占用流动资金，这就是借款并付利息，我们研究劳动工资工作就要研究怎样发挥最大的效益，带来良好的经济成果。当然，经济效益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是多层次的。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所以必须从不同范围、不同角度去进行研究。比如，它涉及到生产，如生产的计划、产品的种类确定、生产周期、生产成本等方面问题。还涉及到建设，如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周期、施工质量、原材料供应等问题，还有流通、管理、劳动工资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都要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角度分析，我们所说的改革，既要包括生产环节和生产部门的体制改革，也要包括流通领域的改革，以及在分配环节或分配领域的改革。劳动力分配与工资分配，也要提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些改革和转变怎样才能搞好，就要求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认真研究这些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社会主义再生产分为生

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生产决定流通和分配是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但是，我们必须与经济效益相联系，进行展开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方面分析。马克思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处于不同的层次，生产是第一个层次，生产的结果是产品、是商品、是问题的起点。产品如果没有销售，就不能实现价值和收回成本，也就不能进行再生产。流通是第二个层次，它是通过市场把产品销售出去。流通过程是一个大天地，经营上万种商品，满足社会需要。通过交换而实现生产目的，也就实现了经济效益。劳动工资属于第三个层次，它高于生产和流通，直接与劳动者相联系。分配与劳动者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所以，不注意这一点，就缺乏经济上的动力，就不能从经济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所以劳动工资是更深的一个层次。

马克思主义者在承认生产具有决定意义的同时，也要重视并深刻分析交换、分配、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没有交换，价值不能实现，没有消费，使用价值就不能实现，也就无法进行再生产。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在与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关系上，属于分配范畴，在它们成为社会综合经济效益的内在条件时，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就会超过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时企图用限制消费的办法来发展生产，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结果却限制了生产。我们是商品生产，如果群众不消费，那商品就没有销路，市场就要缩小，生产就不能继续下去，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所以我们提倡正当的消费，生产的发展是以国内市场为条件的。用限制消费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只能是事与愿违。这样可以维持一定阶段，但时间长了群众生活受不了。生活问题可能变成政治性的问题。长时间地搞“先生产、后生活”是不行的。我们不是分配决定论者，但也不能否认分配是内在动

力的源泉。分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是起码的常识。不分配就揭不开锅，揭不开锅就不能上班，用控制工资增长的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能收到很好效果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自流，工资增长自流也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不抓好分配，就不能实现经济效益。我们应该研究，如何改革劳动、工资制度，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二、要深入研究工资改革问题

从建国到现在，工资问题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照抄外国的经验，如八级工资制等，但现在看来，我们有些东西受了它很大影响，而他们也自己意识到有问题。我们现在谈到工资改革问题，一般都是从怎样解决“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入手，我们的消费基金的使用，长期以来存在着“吃大锅饭”的问题。社会主义消费基金，是由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两大部分构成。国民收入经过两次分配。社会总产品包括 $C + V + m$ ， C 是对固定资产和原材料进行价值补偿， V 和 m 构成国民收入，物质生产领域通过工资的形式对 V 进行第一次分配，国家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总水平和幅度差，不控制具体分配。而以利润、税收形式上缴的那部分 m ，则构成社会非物质生产领域再次分配的来源，构成国家财政开支的来源。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分配，都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部分必须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控制，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财政平衡问题，弄不好会出现赤字。这部分工资不能与企业职工工资相混淆。这样，国民收入的积累和消费基金有了明确的划分，企业职工工资与国家机关职工工资分属于两个工资分配范围，分清两个部分之后，我们的工资改革就可在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或加快进

行。

过去，我国的体制状况主要弊端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吃大锅饭”。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盈亏都由国家统一包下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要由上级统一安排，就是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企业和职工处于被动无权的地位，企业经济利益和它的经营成果不挂勾，职工收入和他们的劳动成果不挂勾，经营好坏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搞平均主义，这就束缚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经济的更好发展。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种体制不改革，就不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上，进行工资制度的改革。我们要针对目前存在的弊病，探索改革的新路子，使企业真正做到“责、权、利”相统一，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工资改革的方向和原则。

（一）要研究解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问题，平均主义、“大锅饭”，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执行这一套办法，就存在着消极的因素，这就打击了先进，鼓励了落后，培养了懒汉，阻碍了生产发展。“大锅饭”搞到这个程度就成了“铁饭碗”，因为干好干坏也有饭吃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恢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且多次地提高了职工工资，实行了奖励制度，这一时期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然大家有的也还不满足，但回过头来一比，就会看到生活是有变化的，这是有帐可算的，工资长了几次，长了几级，还有补助，技术人员也提了职称，教学人员也提了职称。解决了一些生活问题，修了一部分房子，等等。每人都能算出实际的变化，这是大家都承认的。过去提级冻结，只能靠扩大就业来改善生活，就是家庭就业人员增多了，使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三中

全会以来，解决了一些人低工资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对工资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只是作了一些调整。首先对生产工人工资进行调整，又实行了奖金制，然后对辅助工人、科技人员、教学人员普遍提高工资，现在又在酝酿对中年科技人员提高工资。但“吃大锅饭”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历史经验证明，工资工作中否定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是长期以来经济效益不好，生产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就成为我们在劳动工资问题上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二）要研究认识社会主义劳动和工资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因为我们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在公有制经济里面，它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在社会范围内与物质生产条件的直接结合，我们沿用了C、V、m、等概念，资本主义制度下，代表可变资本的V，就成为我们的工资，它是按照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即按劳分配原则而获得的劳动报酬，它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不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一方来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而是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进行劳动，通过按劳分配取得报酬。所以，我们虽然保留了工资的名称，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不是私有制的社会，不是劳动手段与劳动者相分离的雇佣劳动，劳动力本身不是商品，所以工资不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不是劳动力的价格，而是按劳分配的体现。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深入研究、阐述、论证，加以解决，当然这比较好论证，因为社会所有制是很明显的，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也有作为补充的个体所有。但从客观上看，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劳动力不是

商品，不是生产被资本家所剥削占有的剩余价值，是自己作为主人进行劳动，来取得应得的份额。这种份额不是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当然这里面也有扣除，就像《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那些扣除，要有社会积累，不这样就会坐吃山空，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而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那对劳动者也不利。

（三）要研究按劳分配与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社会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总产品中的V，叫做工资，这是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具体化。没有物质利益原则，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就没有内在的经济动力。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和按劳分配，全社会是一个经济主体，劳动和物质生产条件是由一个社会中心直接分配的，产品也是由一个社会中心直接分配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经不存在了，价值、货币、价格等经济范畴已经消失，很显然，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同那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革命都是在东方资本主义薄弱的链条中突破，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突破的。比如首先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它当时是封建军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落后的国家革命取得了胜利。所有制进行了改造，但生产力水平达不到马克思当时所设想的那个程度，马克思当时看到的是英、法、德，是巴黎公社的法国，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国和资本主义发展比英国慢一点的德国，看到的是欧洲那些国家。实践要比理论设想复杂得多，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能消除商品生产。联合劳动在我们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存在，这意味着企业相对独立的经营地位。它们在劳动和经营上各不相同，在物质生产条件上也千差万别。现在还不能取消商品生产，一个劳动者所得收入多少，除了取决于个人劳动以及个

人的技能文化科学水平以外，还与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经营盈亏状况相关，这就是我们研究劳动工资按照物质利益原则所要考虑的内容。

（四）要研究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物质利益。物质利益原则，包括这三个方面。国家的物质利益是保证社会扩大再生产以及国防、行政、文教卫生等正常开支的必要条件。集体的物质利益，为发挥企业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所必需。个人物质利益，是直接满足劳动者个人生存、发展、享受的生活需要，它不仅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而且又是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必要因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谋生手段相联系，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还远远没有达到劳动同谋生手段相脱离的程度，劳动首先是谋生的手段，因此我们只能按劳分配而不能按需分配。现在劳动者凭借劳动换取必要的生活资料，满足切身的物质要求，这是劳动者的经济义务和经济权利。列宁说过：“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否认个人物质利益，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也就架空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我们忽视物质利益，批判“金钱挂帅”等，这不符合实际，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劳动工资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五）要研究责、权、利的统一。我们研究劳动工资改革，要求解除分配上的烦琐和不公平，把现有一切不合理的规章、规定，还原到按劳分配的轨道上来。特别要推行经济责任制，实行责、权、利相结合。我们研究的起点是实行指标分解，把工资内含搞清楚，区别出定额和净产值。责、权、利的基本点，具有第一位作用的内容在于“责”。企业和个人，必须对国家负责、对经济效益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产

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个人对企业，必须完成企业交给的责任和义务。有责，才有权；有权，才有利。只能是这样的序列，绝不能有任何颠倒，因为只有在责、权、利的统一和相互制约中，才能使微观经济效益、个人劳动成果纳入国家利益的轨道。个人学技术，学知识，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的目标。这样，才能体现物质利益原则，这是我们研究和实行工资改革的基础。

（六）要切实研究劳动工资改革的内容。国家在大行业中确定工资总额，总额不能突破，资金限额不能突破，这是总的要求，计划经济要求各个方面在受总额控制的同时，又不能搞平均主义，多劳多得，允许有差距，该奖就奖，该罚就罚。赏罚分明，实行幅度工资。报纸报导辽宁实行的办法，完不成计划，就允许你辞职和被撤职，出了亏损，就要罚。烦琐的工资级别类差要取消，基本工资加浮动或岗位工资的办法要逐步建立，过去讲“铁饭碗”，还应该有“胶皮饭碗”，工资与生产成果挂钩。责、权、利三者要结合，要改进奖励制度，现在奖励比较复杂，有些奖励也是平均主义，在这种条件下，改革工资的时机成熟了。改变平均主义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当然要有准备，做到水到渠成。必须循序渐进，从小改小革到中改中革，再到大改大革。与此同时，工资改革，又必须同利息、利润、税收、物价以及劳动生产率、就业安排等各方面工作同步进行，不能不考虑到国家的收入，因为工资改革总会带来财政上的开支和问题，企业中工资直接影响企业收入，机关里也直接影响财政开支，没有财政条件，工资改革也就进行不了。物价的改革也是这样。物价不能随意改动。如煤炭价格不能随意变更，因为这影响到多方面，国家用大笔钱来补贴煤矿的亏损，煤价不能动。如果煤价一动，整个社会的价格都要动，连烧饼的价格都要

动，因为烧饼要用煤炭来烤。木材价格也是这样，木材涨价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粮价变动之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收价提高，卖价不变，国家就要用财政来补贴，类似的财政补贴还有很多，猪肉价格也是这样。国家用这些办法来平衡。这不符合经济规律，是行政干预，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背多了，财政负担就受不了，社会出现赤字，我国在这方面支出，是以百亿计的。所以物价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整个物价是平稳的，虽然有时大家不满意，但基本上物价还是控制住了。物价没有太大的变化，不断地变、不断地管、不断地查、不断地纠，有的已经稳下来了，现在出现了烟酒降价的形势，有了买方市场的味道。但整体的改革是不容易的，还要慎重地对待。因为物价问题是会发生连锁反应的。

三、要深入研究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中的工资问题

（一）把研究解决科、教、医、文、体、卫的工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从近几年的工资实践来看，国家有计划有重点地实行对基本上没有奖金收入或奖金很少的科研、教学、医务和机关工作人员，适当增加了工资。这部分工资，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的内容。一九八一年对中小学教职工、部分卫生人员、体育工作者调整了工资。从今年十月一日起，国务院决定对国家机关、科教卫生等部门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提高，特别是今后应重点研究解决中等知识分子工资偏低问题，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二）要研究实行职务岗位工资制。从理论上分析，对属于社会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中的工资改革，必须有职务和职称的根据，按职务和职称评定工资或实行职务工资制，这同农村和工矿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有同等意义。因为，由于每个劳动者创造力大小、技术高低、经验多寡、受教育程度

深浅，表现在劳动能力上会有很大差别。按能力确定的职务或岗位工资，必然出现阶梯式的差别。现行的工资制度，不完全按能力来确定，并且不与职务、岗位相联系。一个级别定下来，走到哪里都一样，就高不就低，这其中存在很多弊病。实行职务或岗位工资，则要有严格的条件，达到什么水平，具备什么知识，干什么工作，拿什么工资，定什么级别。即工资是随职务、岗位而定，与所负责任相适应，不象现在这样，走到哪里都一样。实行职务、岗位工资，随职务的提升而增加，原则上提职就提薪，升了岗位就提工资，职级与工资是一致的，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提职不提薪。我们发现许多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上问题比较多，脑力劳动工资与体力劳动工资差别比较大，两个人同时毕业，走上两个不同的岗位，一个走上脑力劳动岗位，另一个走上体力劳动岗位，经过若干年以后，体力劳动岗位上的工资提高得比较快，而在脑力劳动岗位上的工资基本上没有动，发展得很慢，同样的水平，同样的贡献，待遇却不合理。所以，这很明显地应该解决。

（三）要研究如何加强考核。实行工作职务、职称、岗位工资，它可以代表所提供的劳动量。虽然是根据能力定薪，实质上还是按劳付酬。在这里，就有一个加强考核的问题。过去有考工制度，劳动部门有定额表格。现在都删掉了。考核劳动能力，间接地计算劳动量，不够精确，但基本相差不多。这就成为验定职务、岗位工资的基本依据，如果付出超过考核数量的劳动量，还应有随时能够补偿他提供超额劳动部分的工资，可以叫活工资。考核是很重要的，定期考工定级是很重要的。

（四）要研究如何从现实出发，逐步发展。由于实行职务、岗位工资，还有许多客观条件，属于未被认识的领域，

如经济能力、评定标准、机构改革，使我们一时还不能做到。但现在的工资调整就有同职务、岗位工资靠近的意义。对历史造成的不合理，对矛盾过分突出的采取一些暂时解决办法，这还不能说是工资改革，这只能叫拾遗补缺，还欠帐。这次升级工作虽未跳出过去“低、平、乱、死”的大框子，但是，已经初步具备了按职务、岗位评定工资的雏型，给以后的工资改革奠定一定的基础。

四、要深入研究劳动制度的改革

“大锅饭”和“铁饭碗”是一对孪生姊妹。从现实来看，工资制度中的“吃大锅饭”和劳动制度中的“铁饭碗”，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必须改革、必须克服的弊病。

劳动制度的改革，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使用、管理劳动，以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实现四化。从三十多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劳动制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严重的弊病，我们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包得过死。建国初期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对一部分人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解决了四百万人失业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包的范围扩大了。刘少奇同志曾提出改革劳动制度的设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我们离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由国家把城镇劳动力全部包下来，使“铁饭碗”成为劳动制度的核心，这就是我国劳动制度的根本弊病所在。“铁饭碗”吸引着人们争先恐后往国营企业挤，而不愿从事集体、个体劳动。时至今日，社会上仍存在大量的事无人干，一部分人无事干的现象。现在一百个人中只有四个能考上大学，中学为升学率而奋斗，特别是重点校，人们为什么在升大学问题

上竞争厉害呢，家长、学生对升不上大学思想上压力都很大，什么原因呢？除去他们生产发展不足，就业条件还不够广泛有关，同时也有个思想问题，社会观念问题，这就是要努力争取个“全民所有制职工”的“铁饭碗”。进不进大学事关重大，进了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就是“铁饭碗”，就是国家干部，所以非要考大学不可。上不了大学上中专，上不了中专，技工学校也可以，技工学校毕业是全民所有制职工嘛，这个东西非常流行，这是我们的劳动体制造成的，所以必须改革。我们现在的企业不能随生产变化而增减劳动力、选贤任能，个人也无法在统筹安排下选择职业。现在出现了接班的现象，不成文法，这从知识青年返城时开始出现，从铁路职工接班起，从铁路推到工厂、从工厂推到学校、从学校推到医院，全面接班。医生下来了、上了一批护士，护士还只是见习护士，连公社卫生院都是这样。接班制是首先要改革的，措施是择优录取。属于接班范围，就说你有接班条件，参加接班考试，否则只能在另外的地方参加就业考试。考试合格，可以接班。考不上，你在劳动服务公司做劳动准备，现在工厂实行“双补”，没有初中毕业不能当三级工，不用这个办法，解决不了接班问题。现在是人多成灾，效率下降，纪律松弛。“铁饭碗”本来是与社会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背道而驰的，但却被当做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保留下来。因此，改革劳动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有人说，学不学都就业，干不干都领钱。这一包就把人包懒了，包得没有求知奋斗的能力和意识了。所以，就业成为我们严重的问题。怎样解决“铁饭碗”这个问题，是大有研究必要的，目前有这么几个方面可以研究：

（一）广开就业门路，先从所有制问题上进行改革。我们在肯定国营经济为主导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同时，必须

改革统包的做法，广开就业门路。国营、集体、合作社、合作小组以及个体经济，都是就业门路，这样作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改变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不能统包，全民渠道也不全包，中专、技校和职业中学都不能全包下来。技工学校毕业没有岗位，照样要等着，不能马上分配。要提倡职业中学、不包就业，但可以择优就业，可以优先。

(二) 要研究和引导人们改变就业观念。从劳动体制上，转变人们的就业观念。人们参加社会的生产与分配，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与物质资料相结合，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使自己取得收入。我们必须打破人们头脑中那种必须固定在岗位上，必须有了“铁饭碗”才算实现了劳动权力，实现了就业的观念。人们的就业，可以到个体、集体和国营单位。个体和集体的个人收入现在实际上已超过了国营单位。这样，从农村到城市，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我们实行劳动力有限流动的办法，无论国营集体都能进能出，能力强、技术高、有专长、积极干，无活干就可以被合适的单位择优录用。谁要是知识、技术、职业道德不合格，就要被辞退。这样一来，我们的劳动制度就活起来了。

这里要解决奖金问题，奖励过多，也是平均主义，奖金还不如考工晋级，防止互相攀比和奖金水涨船高。

(三) 要研究改革待业管理办法。目前，待业问题较多，劳动部门把很大部分精力用在管理待业人口上。从管理上讲，只有到劳动局登记，分配之后才算就业是不行的。有人讲，待业是从管理产生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形成多种所有制，确定国营、集体、个体多渠道就业层次。只要是劳动者，参加生产、满足社会需要，就是就业，不算失业。我们允许劳动力流动，这样才能打破“铁饭碗”。现在专业户、个体户自己开业，这都是就业，现在

劳动部门本身也有不正之风，有的劳动部门找个体户的别扭，总说就业许可有问题。还有，国营不照顾集体和个体的现象，总是习惯于官商垄断办法赚钱，不是精心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看人家赚钱，总想掐尖。

（四）要加强调查研究，稳步进行改革。劳动制度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直接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还有许多未被认识，需要探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继续奋斗。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劳动制度的正确方针，明确改革劳动制度的目的，把改革就业制度、改革企业劳动制度和建立劳动后备制度结合起来，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经过调查研究、典型试验、逐步推广，我们的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五）要研究解决与“大锅饭”“铁饭碗”相关的问题。

1. 工资制度改革必须与全局性改革相配合，工资制度、劳动制度改革，是属于整个国家经济全局性改革的二个重要方面，因此，必须与全局性改革相配合同步进行。建国以来的实践多次证明，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前进倒退，得失成败，都取决于大政方针和总的指导思想。例如，人与物两种生产的关系，教育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经济关系，经济体制以及价格、利息、税收等等，这些问题的宏观决策是否得当，对劳动工资制度的好坏有决定性影响，同时，劳动工资制度本身的弊病，又对全局性问题发生一定的反作用。二者互相依存，互为制约，互为因果。因此，对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必须与宏观决策相结合，统筹规划，全面部署，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利。

2. 具体来说，有这么几个方面要在改革的实践中加以配合：

一是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调整所有制结构，使集体经济有一个长远的发展，个体经济有适当发展。这是搞活经济、改革劳动工资制度的基本前提条件。必须从思想理论、计划体制、政策调整、管理统筹等方面、从上到下系统解决，务求真正打开局面。

现在山东在企业里实行经济责任制，酝酿在2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网点实行包干责任制，除上缴税收和管理费外，其余收入留归自己，这就调动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这也是一种改革。

二是必须把劳动问题、就业问题、工资问题作为经济发展长远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具体考虑之中。要把人口政策、教育制度、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统筹等等，做通盘安排、正确决策、统一指挥、各方结合综合平衡地来组织实施。

三是劳动工资与财政计划相结合。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涉及到财政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增加工资开支、劳动保险开支、劳动服务公司开支、预备工教育基金开支以及集体、个体交纳、补助资金来源等问题，都必须纳入国家财政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特别是社会保险基金问题，已成为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的严重障碍，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四是价格、税收、利息等外部问题，以及劳动工资、人事等内部问题，涉及到整体改革的进度，都要进一步研究解决。银行利息与劳动工资要统一考虑。从部门内部来看，只有克服工资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才能打破劳动制度上的“铁饭碗”；只有改革人事制度上能上不能下的终身制，才能推动劳动制度上的能进能出。而改革教育结构，则是把劳动制度搞活的前提。教育改革与劳动改革相联系，办职业教育不与劳动改革相结合是不行的。在就业问题上，

如何广开就业门路是当务之急。天津有十一万青年的就业问题，发展网点后一下子解决了。劳动经济的研究应与解决就业，发展生产相结合，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现在我国出现了一些“明星城市”如常州，已没有待业青年，全部就业，甚至到农村去包活，还有沙市、襄樊，东北的丹东、佳木斯等，都基本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不能就劳动而解决劳动问题，要与发展生产相联系。现在农村生产发展，有许多原材料需要加工，人们生活改善了，需要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许多东西不方便，没有人做，一方面大量待业，另一方面生产还没发展起来。网点太少，买东西需要排队，所以，现在需要人的地方很多。门路很多，需要我们找门路。

开创劳动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必须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从劳动制度、工资制度改革入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劳动工资的基础理论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拿出一套比较成熟的规划和蓝图，并要在企业全面整顿的同时，加强定员定额、统计考核等一系列基础工作，实行经济责任制，继续花大气力进行理论性的、方案性的、技术性的各种准备，调查研究和论证，在财政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配合下，我们的劳动工资改革就能开创出新局面，我们劳动经济理论研究就会开创出新局面，这也是我们劳动经济学会开创新局面的必由之路。

（本文是作者在黑龙江省劳动经济学会1982年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加强职工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一个重大战略任务

去年二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

工作的决定》，这是中央、国务院去年联合发出的八号文件。这个《决定》是建设四化的一个重大决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会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意义。最近，袁宝华同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加强职工教育的问题。他指出，那些职工教育搞得不好的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对职工教育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他们往往把职工教育和生产、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提高自觉性。

（一）加强职工教育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需要。中央《决定》的第一句话就提出：“职工教育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的可靠保证，它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一定要作为一件大事及早规划，尽力搞好。”过去，我们常常是重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生产，而对开发智力资源、培养人才重视不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见物不见人。实际上，智力资源开发不起来，人才培养不出来，自然资源也不会得到充分利用，生产也上不去，一时上去了，也不能持久。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决定》时指出：“劳动创造财富，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靠勤劳勇敢的苦干精神和人民才能的充分发挥；第二靠丰富的资源，只靠资源是懒汉思想，会使自己腐败”。中央对智力开发和培养人才是非常重视的。把这件事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很有远见的科学的精神。美国有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叫舒尔茨，他来我国讲学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有许多人讲，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首先需要自然资源丰富，我认为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但是并不正确。有许多学者过分强调了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绝不应看成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他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譬如，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是生活水平比南美洲每

个国家都高；丹麦既无煤，土地又不肥，但是在生产和各方面都很好；瑞士资源也很少，但是注重发挥人的智力，也比较富；日本既无煤又无铁，而且耕地又不多，它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也是靠智力的开发。我们应该从这些事实中得到启发，重视人才的培养，注意依靠技术力量，加速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个问题，好多同志现在还认识不到，我们好多设备需要更新，更新的设备一来，马上就会感到人才不足的困难。特别是老工人子女接班越多，技术水平就越下降，越是需要人才。当然，我们自己也有不少企业，这方面的认识和自觉性高，比较注意抓了职工教育，注意开发智力，培养人才，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变了被动的局面，成绩很突出。哈尔滨第一机床厂，条件很差，在道外区，周围叫人家围的严严的，厂内还有一个厂子，那么样一个条件，可是职工教育开展的很好。他们讲，他们多亏抓了职工教育，自己培养了技术力量，使工厂能够扭亏为盈。他们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过去这个工厂生产磨床，产品滞销，从七七年到七九年，三年亏损二百四十万元，全市倒数第一，受到上级批评，全市通报。七八年工厂办了职工大学，自己培养了二十八名大学生。八〇年企业调整，转产快装锅炉，这二十八名大学生，成了技术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组织技术攻关，自己设计制成了节煤、便于消烟除尘、适于集中供热的快装锅炉，销路畅通，使生产扭亏为盈。八〇年产值六百万元，八一年产值七百五十万元，上缴利润三十五万元，培养了一批人，救活了一个厂。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人的劳动能力，不能只以人的体力来衡量，更主要的是要以人的智力，即以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大家知道，人靠体力飞不上天，但靠智力，靠科学造出宇宙飞船，就可以飞往月球。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同古代的劳动者，在体力上恐怕是没有

多少差别的，甚至体力还不如那时。修万里长城，修故宫都是极重的体力劳动，说明那时人的体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工具的革新，现代一个人的劳动，可以超过古代上百人、上千人的劳动。任何自然资源成为劳动对象，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作用。任何现代化的劳动工具，都是“物化的智力”。马克思曾经说过：“现有人口的技术程度始终是整个生产的先决条件，因而也是财富的主要积累”。我们一定要清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轻视教育，轻视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以无知为荣，怕有知识，把有知识看成是走白专道路，谁有知识就是反动权威，这些错误观念是害人的，把观念给弄颠倒了。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观念，努力提高职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提高以后，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职工教育工作，改变职工队伍的素质，培养出一支宏大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有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的干部队伍、职工队伍，这样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二）加强职工教育，是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和企业整顿，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我们有些同志对加强职工教育的重要性有认识，从长远看认识到它是重要的，是应该抓的。但对它的迫切性却往往认识不足，认为“远水不解近渴，不抓职工教育一样可以搞好生产”。看不到职工教育是当务之急，对开展职工教育缺乏紧迫感。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认识到职工教育的作用，切实把职工教育抓起来，是能够很快见成效的。譬如，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车辆段，将近两千多名职工，青年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多。七六、七七两年，行车事故很多，利润减少，生产很被动，每个季度都挨批评。迫于生产需要，使他们走上了必抓职工教育的道路。于是从七

八年开始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技术培训，到七九年培训了一千三百九十一人次，很快就见成效，事故由七七年的六十二起下降到四十一起，上缴利润比七七年增加了一倍，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八〇年在技术培训的基础上，又办了职工中专班，共培训了一千零五十八人次，事故下降到二十五起，上缴利润比七八年增加了十六倍；八一年贯彻中央《决定》后，职工教育走向正规，狠抓了“双补”教育，又培训了一千零三十六人次，事故下降到十一起，上缴利润比八〇年提高了一点五倍，是七七年的二十五倍。哈尔滨炼油厂是一个以青年工人为主的厂子，全厂职工平均才二十八岁，不少七〇届毕业生成了师傅，只会教徒弟操作，多数讲不出道理来，也出现了一些生产事故。他们经过对青工的文化考试，平均不到二十分，文化水平很低。于是他们大抓青工培训工作，提高了工人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使产品连年增长，上缴利润连年增加，在全国化工局里名列前茅。七九年上缴利润一千四百八十万元，八〇年增加到二千四百万元，八一年增加到二千八百万元，三年迈了三大步。当然这不完全是职工教育一个方面的成绩，还有其它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了职工的技术水平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今年，我省工业生产，就是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整顿企业为重点，继续搞好工业调整 and 改革，坚决把工业生产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经济效益有明显的提高。我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重要的标志在于能不能做到产品质量在竞争中以优取胜，以新取胜；产品质量的优劣，影响到经济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怎样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能否迅速提高广大职工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我们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

向科学要质量 要品种，要经济效益。产品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人的智力的竞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三）加强职工教育，是迅速改变职工队伍文化技术现状的需要。当前我省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水平是比较低的。在全省现有五百万职工中，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近百分之八十；三级工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工程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四。全国平均占百分之三，经济先进的国家占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目前我们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状况，与生产需要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很不适应。如果不迅速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将给生产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带来严重的障碍。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不提高，就改变不了我省工业上效益低、质量差的落后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加强职工教育的强烈的紧迫感。现在抓已经晚了，如果现在还不抓就更晚了，绝不可再误时机。

今年是中央《决定》发布的第二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对职工教育的要求更高了、更迫切了。我们必须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切实加强对全体职工的教育。

（本文是作者1982年3月25日在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认真贯彻十二大精神 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

清醒地认识控制人口增长的极端重要性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过少不

行，但人太多了也有问题。人口增长快慢可以促进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过快只能延缓四化的进程，影响我们战略目标的实现。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妨碍“按劳分配”的贯彻，也会妨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会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而延缓生产发展的速度。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影响到人口的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其结果是体现在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低而影响生产发展速度。人口增长过快，还会使教育和就业跟不上，给社会安定带来很多问题，也会影响生产发展速度。正因为这样，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也指出：“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并由此告诫我们：“计划生育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事。”这就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同发展经济，力争在二十年内使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知道，这个认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换来的。回顾全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是经历了“三起二落”变化过程的。一九五五年，马寅初同志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后，一度引起重视。但到一九五八年，在“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批判，使计划生育工作方兴即衰；一九六四年，人口突破七亿大关。周总理提出，不搞计划生育不行，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具体负责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这一工作当时在城市已初见成效。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口增长又回落到无政府状态；一九七一年，周总理又提出，还要搞计划生育，使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第三

次开展起来。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的“两落”，致使全国净增了四亿五千多万人口。而我们省也由一个黑龙江，变成了三个黑龙江。解放初期，全省人口只有一千零一十四万。三十年来，平均每年出生六十五万多人，净增加了一千五百二十多万人，是解放初期人口的一点五倍，大大超过了全国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机械增长，外省迁入七百多万，当前已达到三千二百六十五万多。解放初期，全省粮食总产一百一十五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一千一百三十九斤；而现在丰收年份总产增加到二百九十几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却降低到九百二十三斤。总产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三点九，人均占有量却下降了百分之九。人均土地也由八点五亩减少到四点一亩。造成了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比例的严重失调，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还应看到，现在我国人口已达到十亿三千一百多万，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已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前半期，我国将出现第三次生育高峰。就我省来说，在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平均每年出生六十六万七千人。最高的年份是一九六三年，出生八十七万一千人。因此，从明年开始，一直到一九九五年，一胎出生人数比现在将明显增加。再加上一些其它因素，如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中还没有真正接受；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干部中，对党的人口政策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等等。鉴于上述情况，估算一下，我省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出生率最低的年份在千分之十六左右。如果工作跟不上去，最高年份有可能达到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一人口发展趋势说明，我省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同全国一样，正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果对这一严重情况不分析，不研究，对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不采取相应措施，不抓紧工作；就有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那样，毫无疑问，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持续若干年的生育高峰。农村人口就有可能冲破计划，膨胀增长。不仅会使我们过去经过多年努力取得的计划生育成果功亏一篑，把实行生产责任制带来的多种好处抵销掉，也会妨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四化的实现。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坚定，要作“明白人”，充分认识计划生育的重要战略地位，清楚地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面临回升的趋势，抓紧工作，不但不能让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再回落下去，而且要不断前进。

正确理解和贯彻现阶段的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是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是从国家的客观实际出发，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一九八〇年九月，党中央发表了《公开信》，今年二月，又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了《指示》，九月，党的十二大又明确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讲人口问题，讲控制人口增长。这些集中起来，形成了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政策，即：“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这一政策，提法很科学，内容很全面。既包含控制人口数量，又包含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的量 and 人口的质恰当地统一起来，把控制人口数量和发展人口方向明确地指了出来。既有针对性地解决我国目前的人口问题，又高瞻远瞩地指明了我国人口发展的理想目标。这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内解决人口问题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

怎样具体理解现阶段的人口政策？中央11号文件指出：“社会主义事业不但需要人口有计划地发展，同时要求我们

的人民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限制人口数量，必须实行晚婚、晚育和少生；提高人口素质，就要做到优生、优育。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尤其要坚持晚婚、晚育、少生，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样做完全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措施。

首先，这样做符合我国人口状况的实际。我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八，比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还多百分之五十，将近苏联的四倍，是美国的四倍多，是日本的十倍，比十八个法国的人口总和还多，等于四十个加拿大。不但人口基数大，育龄人群多，而且年龄构成轻，目前十五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而发达国家平均占百分之二十五。美国、法国只占百分之二十四，英国占百分之二十三。人口年龄构成轻，就决定了未来结婚生育的人群大。我们在解放初接过来的人口，每一个年龄组不过八百万到九百万。解放后到一九七四年前，出生的每一个年龄组都是二千多万，好多年份是二千五百万以上。这就是说，解放初每年结婚四百多万对，形成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现在每年结婚一千几百万对，即使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年出生也有一千几百万，若生两个孩子，则在二千万以上。这就不难看出，不大力推行和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就等于我们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重复历史上出现的生育高峰。

其次，这样做符合我国经济状况的实际。我国底子薄，经济还很落后。人均粮食只有六百五十二斤，棉花五点五斤，油料十五点八斤，肉类二十四点七斤，水产品九点二斤。这个水平是很低的。我们要改变这个状况，当然首要的是发

展生产，但同时也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单从一个家庭、一对夫妇来说，多生一个孩子，似乎是无所谓的事情。其实不然。如果仔细算个帐，多生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也是不小的。从出生到抚养成人，能够自主，按十八年计算，负担并不轻。从青年到壮年，为多子女所累，然后下代又是如此，哪代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呢？从全国来看就更严重了，一年就要多生一千多万，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也可能有人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多一点也不要紧。这要做具体分析。地大不错，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就是一百四十四亿亩，但是按人平均只有十四点五亩，大大低于苏联、加拿大和美国，比世界平均水平四十七亩也低得多。耕地面积更少，按人平均只有一点五亩，相当于加拿大的十七分之一，美国的八分之一，苏联的七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印度的五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物博也不错，资源是很丰富的。目前有些产品、产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比如，棉布产量占世界第一位；粮食总产量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煤炭仅次于苏联、美国，占第三位；钢是第五位，电力是第七位，石油是第八位。可是，用十亿人口一平均，占有量就不很多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即使我们实现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也不意味着人口不再增长了，还是要继续增长二十年。所以，我们必须当机立断。该断不断，遗祸无边。历史的教训要深刻吸取。

第三，这样做符合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人口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关系很大。对这一点过去我们认识得很不够。目前世界平均每平方公里是三十人，我国已经住上一百人了。水和空气，是人类生存所不可少的。我们原先以为水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水比世界平均水平少很多，地表水径流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用水都很

紧张。森林是宝贵的财富，它还有特殊的功能，就是把人和一切生物呼出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把氧气放出来，可以说森林是制氧的大工厂。可是世界平均森林覆盖面积占百分之三十，我国占百分之十二，居世界一百二十几位。人口增长过快，同这个生态环境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大。

第四，这样做也符合广大群众民意的实际。现在，民意是什么？总的来说，是人心思治，人心思上，人心思化，人心思富。迫切要求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把生产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尽快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我们在积极发展生产的同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正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出发的。如果听任人口盲目增长，势必加重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影响四化建设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才是“不合国情”，“不顺民意”。因此，我们说，党中央、国务院正是根据我国国情民意，历史教训，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才作出了大力推行和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重大决策。

为此，要大力推行和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生育，坚决杜绝三胎生育。“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一些。”这个规定和要求，把城镇同农村加以区别，把国家干部、职工同社员群众加以区别，把汉族同少数民族加以区别，既体现了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又体现了把政策建立在大多数群众能接受的基础上，为我们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准绳。

要进一步抓好晚婚、晚育工作。晚婚、晚育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控制人口增长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而且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道理很简单，二十岁结婚，二十一岁生育，一个世纪是五代人；而二十五岁结婚、生育，则是四代人。也就是说，将婚龄、育龄推迟五年，在一百年内就少生一代人。特别是在目前面临生育高峰的情况下，尤为重要。有些人把贯彻新《婚姻法》同提倡晚婚、晚育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婚姻法》就规定了“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只生一个”，也不应早婚、早育。应该强调指出，法定婚龄是最低婚龄，但不是最佳婚龄。从道理上说，婚龄与育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婚龄和育龄是连在一起的。为有利于青年的身体、工作和学习，有利于民族的兴旺发达，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积极提倡晚婚、晚育。对坚持晚婚、晚育的，要大力表扬和奖励。目前各地实行的一些办法，如一次性奖励、增加婚假、延长产假、优先分配住房等都很好，应继续实行。要大造舆论，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造成一个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孩子光荣的浓厚气氛。对不实行晚婚、晚育的，也应酌情给予限制。迅速把优生、优育工作摆上日程。把提高人口素质和控制人口数量相提并论，是现阶段人口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是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过去，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主要是靠增加劳动力的数量。群众中流传的“人多好干活”，就是对封建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形象概括。而在今天和未来，科学技术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势必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相对减少，而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者的素质高低，是生产发展快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正因为这样，提高人口质量，对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我

们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具有重大的意义。就一个家庭来说，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养育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材。所以，优生、优育是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过去这一工作抓得很不够，今后，对提高人口质量同控制人口数量一样，要加以重视，切实抓好。要大力进行优生宣传，开展优生门诊，做好婚前检查。在中央没有制定出法规之前，卫生部门要制定一个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那几种人不准结婚；那几种人婚后不能生育；对已有不符合优生条件的子女的育龄夫妇，强制绝育等。还要注意优育，加强妇幼保健工作，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加强儿童学前教育工作，让下一代受到良好教育，健康成长。

认真抓好有关奖励、限制的工作。为了保证人口政策的贯彻执行，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规定一些行政的、经济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以教育为主，鼓励为主。惩罚的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重。通过物质奖励，特别是政治上的表扬鼓励，使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的，感到政治上光荣，经济上得到实惠；使一般的以至后进的受到启发和教育；对经过反复教育，仍坚持无计划生育的，辅之以必要的经济限制。

（本文是作者1982年12月2日在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第六部分 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

重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党中央确定的我国新的科技发展方针，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唯一正确的方针，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我们所以作这样理解，首先因为它完全符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经验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改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作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随着经济建设方针的这一根本转变，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当说，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但也必须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科技发展重点和管理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科学技术同经济发展结合得不够紧密；有些课题重水平轻效果，为生活消费品生产服务不够；研究、试制、生产、应用之间的渠道不很通畅；军民之间、民用各系统之间，在科研上缺乏必要的协调，力量分散，课题重复；对引进的技术消化不够，缺乏创新；等等。这些问题如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反过来，由于经济上不去，缺少资金和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新的科技发展方针，既是适应经济建设方针根本转变的需要，也是更好地促进科技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需要。

其次，这条新方针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现代生产，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无一不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或者叫做科学技术的物化过程。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活跃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世界上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在本世纪初，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扩大外延的办法，即通过增加设备、扩大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实现的。而到了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因素。过去，我们对于这些是不大清楚的，一说发展生产就是摆摊子，上基建，搞落后技术的重复翻版，吃了不少苦头，这个教训一定要很好汲取。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也有个目的性问题需要解决。搞科研当然要探索未知，当然要赶超先进水平，要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但最根本的是要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离开这个根本目的，背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科研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在我国科学技术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原因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决定于社会的需求。但这种需求通常只是一种潜在的必要性，要把它变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行正确的决策，取决于我们各级领导同志对科学技术作用和地位的认识，总结过去，从我们领导思想检查，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确实不够。实际做法上也有不少错误的东西，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的发展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二是忽视科技人员的作用，使他们的专长难以施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提高，但真正使它在现代化建设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还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同志进一步提高自觉性，做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应该看到，

现在如果再不理解科学技术的重要，再不把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那就不单纯是一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了，而是能不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事。今后再不重视科学技术，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就要吃更大的亏，犯历史性的错误。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黑龙江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就是要紧紧围绕发挥我省的优势，抓好科学技术攻关，推广一批量大面广、经济效益显著的科技成果，争取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中，使科技进步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第一，**围绕实现农业发展战略，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为了把我省建成以商品粮为主、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基地，要组织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农工商经济调查，科学地制定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依据。目前，特别需要在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制度、改良低产土壤、搞好作物布局、改变化肥结构、实行合理施肥、生产高效低残毒农药、有选择地配套农业机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第二，**围绕工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展消费品生产技术研究。**要迅速调整机械工业的服务方向及产品结构，为轻工、纺织、食品加工和建筑等行业研制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要充分利用我省自然资源的优势，切实搞好木材、甜菜、亚麻、大豆、玉米的综合利用。研究发展以麻、毛、丝、化纤为原料的纺织新产品，尽快攻克染整后处理技术，提高化纤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研制营养丰富、物美价廉的强化食品、方便食品和儿童食品，发展微生物发酵技术和进行食品营养成分的研究。研制新型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提供增产

水泥、玻璃和建筑陶瓷的先进技术。

第三，围绕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积极开展能源开发和节能技术的研究。解决能源问题，从长远来讲，要开发与节能并重；近期则应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我省是国家的煤炭、石油基地之一，要着重研究发展采油新工艺，确保油田持续高产稳产；研究提高煤炭采掘综合机械化水平，大幅度增加煤炭产量。在节能方面，要大力研究和提供节能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发展煤的气化和劣质煤综合利用技术。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是当务之急，要优先加以考虑。首先要组织力量编制缺柴地区农村生活能源区划，按照因地制宜、多元互补、综合利用、讲究实效的方针，种好薪炭林，办好沼气和水电，同时积极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形成合理的能源结构。

第四，围绕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问题。靠技术改造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这是实现工业生产良性循环的战略措施。搞技术改造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可能要求所有企业都采用最新技术，片面追求自动化。要把企业的整体技术改造同部分设备、工艺、产品的小改小革结合起来。技术改造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从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改革产品结构、合理利用资源等方面入手，把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产适销对路产品作为主要目标。要充分发挥我省机械工业的优势，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

第五，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大面积大范围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我省共创造出6,000余项成果，还有一批从国内外引进的新技术，军工生产中也有许多适于民用的先进技术和工艺。这些都是现成的生产力，是已经到手的宝贵财富，只要认真推广应用，就会产生很大的经

济效益。

第六，围绕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搞好技术贮备。在进行生产技术开发研究的同时，相应地安排应用理论的研究。在农业、工业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积极研究采用电子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激光、遥感等新技术，适当开展遗传理论、生长发育理论与控制技术的研究。要争取在特种半导体元件和半导体传感器件、人类生殖生理等研究上取得较大进展。

原载1982年4月5日《人民日报》

充分发挥科技咨询服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经济发展必须靠科学技术，这个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认识清楚了，还有很多人没有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因此缺乏自觉性和紧迫感。

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生产已经日益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物化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起飞必须依赖的决定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一体化”，经济正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因，科学技术是经济起飞的翅膀。这是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美国科学院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讨论会。会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是没有科学技术变化，其他生产要素的物质效用增长值，只能占经济增长率的20%，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的80%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本在战败国的烂摊子基础上，很快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它经济复兴

和起飞的翅膀就是科学技术。日本政府统计资料披露，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二年，每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10.35%，其中6.5%（即60%）是靠科学技术进步取得的。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日本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每年11.6%，其中4.4%，也就是近40%，是靠科学技术取得的。八十年代这个比例将提高到65%左右。日本在总结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中说，集中一点是“技术立国”。据世界经济学家观察，在本世纪前三十年中，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扩大设备、投资和增加工人，到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中已有 $\frac{2}{3}$ 是由于推广了新技术、新工艺及与此有关劳动力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其中40%是由于科学技术力量。战后美国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问题， $\frac{1}{3}$ 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中，美国工业部门技术先进的行业与技术落后的行业比较，前者的劳动生产率高一倍，就业率高八倍，成本只有后者的 $\frac{1}{3}$ 。美国的科技投资每一万美元可收益二十三万美元。由这二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起飞的过程，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当然，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发展科技和经济有自己一套路子 and 政策，但是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普遍适用的。据七九年的一个统计资料，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价值合计为三百八十七亿八千万元，比上海一百八十三亿九千万元多一倍还多，五市职工总数比上海多1.2倍；但是，工业总产值仅比上海多17%，上缴利润，只相当上海的77%，如果按照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总产值来看，上海比五市中最高的广州还高80%，比最低的市多2.5倍；从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利润来看，上海比五市最高的北京还高

1.2倍，比最低的市高5.4倍。原因就是上海的科学技术发达，所以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就大。另外就我国的几个中小城市常州、沙市、襄樊、威海来看，他们的城市就业问题解决比较好，人均收入都已超过1000美元，人民生活提高很快，基本经验就是重视了科学技术，重视了科技人才。我省的牡丹江市一九八〇年抓了九项重点科技项目，当年就创造产值一千二百零八万元，实现税利二百七十二万元，相当于当年全市新增加国民经济产值的11%。每投资一元科技经费，创造产值达26.6元，实现税利3.4元。哈尔滨市粮食研究所研究成功的金波汁，用1公斤豆粕原料经科学泡制生产出成品70瓶，创造价值10.5元，是1公斤豆粕价格的48倍。而利用豆粕中果酸还可生产酸性和中性蛋白乳，最后经分化再生产大豆组织蛋白。初步计算，经过梯级开发，全面利用一吨豆粕可创造价值一万四千元。我所以举上面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说明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开发的。

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认识不够，对经济发展到底靠什么，实际上一直不明确，没有解决好。三十年来，我们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单纯“外延”扩大再生产，也就是主要靠投资、靠扩大工业基本建设，盖新厂房、增添新设备，靠增加劳动力，来发展生产。按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在原有规模重复进行的生产，叫简单再生产。扩大规模进行的生产，叫扩大再生产。一个社会光停滞在简单再生产，就无法前进了。只有扩大再生产，社会财富才会不断积累。而扩大再生产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增加厂房、设备和增加劳动力来实现；一种是“内涵”扩大再生产，这就

是靠技术改造，挖掘潜力，提高生产能力。“外延”扩大再生产，在工业发展初期、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初期是必要的，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了一百五十多项大型工业项目。但当工业有一定规模以后，就必须注意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用科学技术力量去改造现有企业，也就是要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三十年来，我们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外延”扩大再生产上，不重视科学，不重视技术，不重视经济效益，这就是我们国力增强不快，人民生活改善得比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中，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在这个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下，又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方针就是靠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就是要靠“内涵”扩大再生产。搞好现有企业的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革新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讲求效益。而要实现这些就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赵紫阳同志在十大方针第九条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使它真正成为强大的生产力，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原来，这一条是写在技术改造一条里，后来政治局讨论时，陈云同志提议要单独写一条，这表明中央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作用是高度重视的，认识非常深刻，我们应该跟上中央这个认识。这也是经过三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发展经济必须靠科学技术的路子。

现在，向科学技术要质量，要经济效益，要速度，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了。但是科学技术还不是直接现实的质量、经济效益和速度。科学知识是以信息形式储存

在科研人员头脑或图书馆里。技术也顶多以半成品存在实验室或科研成果里。因此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需要开发、转化、推广，需要很多中间环节，也就是说要把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些恰当的组织形式。没有一些恰当的组织形式，科学技术是不能自发地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英国是牛顿的故乡，是近代资产阶级产业革命最早发祥地。按人口平均，英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世界第一位，照理，经济的发展也当该居于世界前列吧，但目前，英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里却是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开发转化工作做的不好。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专家们认为，西欧的知识储备和科学技术水平，并不比美国低多少，但美国的经济却比西欧发达，就是美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结合得密切，科学技术开发、转化得好，找到了一些恰当的组织形式，如“科学工业综合体”、“思想库”、“智囊团”、“咨询公司”等之类组织。科技咨询与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工作不同，它是利用社会上专家拥有的专门科学技术，来解决社会经济和企业事业中的科学技术与企业管理问题，它是运用科学技术更加有效地为社会为生产服务的一种形式。现在已经出现了世界有名的兰德公司、阿瑟·李特尔公司等等。美国全国至少有这样的官方和民间的咨询机构二千五百多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第四产业，每年周转资金额达七亿五千万美元之多，这些机构并不生产物质产品，可是它同样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价值，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由于重视科技咨询，有人统计每投资一美元，可以至少节约三美元。相反由于缺少科技咨询工作，按照主观主义瞎指挥，就会造成重大损失。美国在五十年代，一架价值一千万美元飞机中，包含的咨询、论证费高达十万美元，占1%，六十年

代制造一架 B70 轰炸机费用增至两亿美元，而其中咨询费高达一千万美元，约占 5%，这就说明现代化工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科技咨询这个行业了。

我们国家，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党中央和国务院都非常重视科技咨询服务工作。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多次提到对经济工作要进行论证，尔后再做出正确决策。八〇年，中国科协组织多学科专家对皖西自然资源和两淮煤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考察很重视，赵紫阳同志批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很重要，是科技部门走上社会化的一种形式，要认真总结经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对于科学技术如何同经济建设及社会需要相结合，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我国的科技咨询事业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倡导下发展起来的，二年来，科技咨询服务事业发展很迅速，国务院相继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是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咨询顾问机构，它们和中国科协所属的各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咨询服务机构一起，负责对中央和国务院重大经济政策和技术改造进行论证。各省市科协所属的咨询服务事业也普遍兴起，它们负责对地区、诸如城市建设、交通运输、能源利用、区域治理、环境保护、地区开发进行技术咨询，推广新成果、新技术、组织技术攻关、技术会诊、协助企业解决实际技术难题，转让技术成果等微观经济咨询，当然也负责对省市领导经济技术重大决策的咨询。例如三江平原治理开发，八〇年我省召开了二十四个省学会三十多个学科的一百三十多名专家、学者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科学论证，并提出了八项建议，这对于省委、和国务院的水利部开发治理三江平原提供了科学依据。象佳木斯科协科技咨询服务公司，今年受市政

府和市人民银行委托，对以糖蜜生产味精投资二百二十万元扩建项目的咨询，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技术论证和市场预测，分析了省内外味精产销情况，不宜再扩建，给市政府当了决策的顾问和参谋，防止了工业生产盲目上马现象，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他们的信誉提高了。佳木斯市人民银行又委托他们，对果酒厂、淀粉厂、奶粉厂投资扩建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根据论证的结果，决定银行是否予以贷款。这样，科技咨询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他们还决定，今后凡投资扩建和新建工程项目必须经由科技咨询公司的论证才拨款，这就保证了投资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这个经验值得各地市科协和各地银行借鉴。哈尔滨科技咨询服务公司，自八〇年成立以來，已经签订各种咨询服务合同一百七十多项，完成了一百二十多项，还免费服务了五十多项，深受有关单位欢迎。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咨询形式受到中国科协领导同志的好评。科技咨询服务事业是一项意义很大、前途很广阔的事业。它的作用是：（一）可使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进一步发挥科技人员在经济建设中的参谋顾问作用；（二）可使科学技术迅速运用于生产，促进技术的推广和有偿转让，把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搞活；（三）更好地开发智力资源，发挥科技人员的潜在力量；为他们在四化建设中大展宏图提供广阔的舞台；（四）更好地推动科研设计、生产单位的联系和企业联合；（五）更便于科技人员广泛、深入地接触实际，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三中全会以来，在广大农村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和多种经营，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联产联着心，农民主动寻求科学技术，需求“技术承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热”。在工业、交通、商业等战线，中央实行了搞活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各种产品都要经过

市场的比较,出现了市场竞争。竞争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哪个厂子利用了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来降低成本,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更新换代,竞争能力就强,就能处于优势地位(日本研究中国需要和国际能源紧张情况,采用新技术生产“工具车”,就有竞争力,压过美国),反之就会被淘汰。特别是现在,逐步对全国四十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个技术改造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可以预见,不久,工交系统也必然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热”。只有整个社会的“科学热”蓬勃兴起,我们的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才能有一个飞跃地发展。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对于促进整个社会“科学热”的形成,对于解决重大技术关键问题,推广和应用科技成果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一定要把科技咨询服务工作搞好。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综合化和工业生产发展日趋复杂化,决策、咨询、论证的对象所包含因素往往不是“单因子”,而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不是“静态”而是“动态”,不是自我“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系统;不是处于“线性”,而是处于“网络”之中,而且多是涉及多学科、多部门,多领域的问题,靠少数领导人和少数专家拍板定案往往会因考虑不周而发生较大失误,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也有成功的例子,象在黄海沿岸,建设大型现代化深水港的地址选择,就注意听取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科学论证,最后决定选在日照县石臼所,比原方案可节约投资数亿元。这说明,科技咨询、决策,越来越需要协作,需要集体的力量。正象国外一家杂志所说的:“科学家个人预测的作用正在逐渐让位于集体咨询。”马克思曾经说过,“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来”。他是讲的劳动,那么科学也是一样,智力也需要协作,对于这个协作,谁最有优

势去组织、去协调、去联络和综合呢？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科协的身上。科协是科学家的团体，是各个方面学会的联合，只有科协作这个工作，是最有条件的，谁也没有科协条件多。

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和调动科学家及工程技术人员的纽带和助手。它具有跨行业、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联系的特点和优势，它能把教学、科研、生产联系起来，同时联系着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包括军工在内技术领域的学会、协会、研究会组织，联系着数目众多的科学家、专家、大学教授、工程技术人员，这就使得科协能组织协作，使它在决策咨询时比较超脱，利于发扬民主，便于组织多学科专家，集思广益，解决各种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这些特点使科协系统的咨询工作比较好地做到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统一，这是科协系统科技咨询服务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科技咨询事业富有生命力所在。对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新兴事业，希望政府各部门，各级党政领导同志都要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摆到议事日程上。我们的科技力量少而不均，现在存在着有事没人干和有人没事干的严重状况，有关方面要大力协助和支持这个事业，特别是银行，有些东西没钱也没办法。银行现在还担负中短期贷款的任务，中短期贷款的科学性，这是保证银行不亏本的重要措施，所以一定要很好的依靠科学。大家在可能的条件下多方面的支持，协同科协把科技咨询服务事业搞起来，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省政府提出的在科技工作上力争有新的突破，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中科技进步因素要争取达到 $\frac{1}{3}$ 左右的战斗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广大科技人员，要充分利用这个形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各级科协、科技咨询服务公司要把十大经济建设方针作

为咨询服务的长远指导思想，也要作为当前咨询服务主要内容和方向。各级科协科技咨询服务的机构，要把服务放在面向生产、面向中小城市、面向中小企业、特别要放在帮助企业改造革新，提高经济效益上，这是服务的重点。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发挥我省四大优势，为建设五大基地服务。当务之急应抓好我省工农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三江平原开发论证、三十万吨乙烯原料利用、产品方案的技术论证，对我省畜牧业布局、结构、发展规划的论证，对哈市集中供热技术可行性论证。对我省工业技术改造、节能、提高质量、更新换代、提高效益的研究，这更是当务之急。再一个就是对如何发展我省轻纺、食品工业进行咨询论证。我省有发展轻纺食品工业的充足原料，又有一定科研能力，而且还有很多待业青年。但是现在这些商品市场供不应求，甚至连饮料也供不应求。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这个问题，迫切希望科协和科技咨询服务机构当好技术顾问和参谋。

（本文是作者1982年3月28日在省科协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发展科协组织的作用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整个经济开始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时期，国民经济的速度和效益有一个新的进展。我省的工业形势正处在一个总结、稳定、完善的阶段。一九八一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轻工业比上年增长13.6%，轻工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由上年33.3%上升到36.8%，农业生产尽管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值仍达六十四亿元，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量达二百六十亿斤以上，与丰收的八〇年基本持平；经济作物和各种经营有了新的发展，产值占农业总产值分别达到15.4%和27%；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新的提高，市场进一步繁荣。总之，我省国民经济已经形成一个农促工、工带农、轻促重、重带轻的大好局面，并开始出现流通促生产，生产带流通，生产促科技、科技带生产的新形势。经济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形势好。农业是一马当先，方兴未艾。农业由前一段主要靠政策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已经发展到靠政策的同时，又要靠科学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把整个农业生产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目前，我省广大农村已经出现一个广大农民、干部和科技人员学科学，靠科学、用科学的科学热潮。

农村这股科学热，势必会影响和涉及到城市的工交战线。工业要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城市的工交系统已经出现了科学技术需求的热潮。我们要认清这种形势，要因势利导发挥科技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作用。

第一，要认清科学热潮出现的必然性，增强我们进一步搞好科技工作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当前，出现这股科学热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它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建国以来，我国曾出现过四次科学热潮：五六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取得决定胜利的前夜，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我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当时全国热气腾腾的情景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邀请全国几百位科学家，共同拟定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可惜的是，这个科学热潮被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打下去了。六一年，通过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使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趋于平衡，当时，在聂荣臻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

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六三年三月，党中央召开了农业工作会议，医学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在周总理、谭震林、聂荣臻同志直接参加领导下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使当时科学事业有了发展；但是被文化大革命给冲断了。七八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预告了科学春天的来临。八〇年耀邦同志在科协二大提出了要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号召。八一年中央又制定了科技发展的新方针，这些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次出现的科学热潮是建国以来的第四次，它具有新的特点。一是这股科学热，是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出现的；二是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多种经营”、“技术承包”政策；城市工交企业实行了“扩大自主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这些政策都具有一种强大的经济动力，这就必然调动广大工人、农民学科学的积极性，在城乡兴起向科学技术要增产、要效益的科学热潮。三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改革，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出现了“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形势，这就会内在地焕发出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够把科学推向前进。”可以预见，目前这股由农村开头，进而波及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热潮，随着四化的进程，必然会持续发展，经久不衰。

第二，各级领导要站在科学热潮前面，带领广大群众向科学技术进军。各级领导一定要清醒地认清这种形势，绝不能等闲视之。首先应该解决自己信科学、靠科学、用科学的问题。假若再不把科学技术工作提到头等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我们就要犯历史性错误。这一点党中央认识是很深刻

的，赵紫阳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条条与科学技术有关，其中五条与科学技术有直接关系，特别第九条把科学技术的作用突出出来，这表明中央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是高度重视的，认识非常深刻，我们应该跟上中央这个认识。

大家知道，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已经越来越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一体化。我们各级领导都是负责经济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的，搞经济工作不靠科学，是搞不好经济的。另外还有个决策科学化的问题，为了避免决策重大失误，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都要自觉地解决信科学、靠科学的问题。信科学、靠科学从根本上讲就是信任科学家与依靠科学家，充分发挥科学家积极作用，以充分发挥科学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促进作用。要请科学家对重大经济政策和战略决策提出咨询和建议，要对技术上是否先进、生产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合算、社会上是否合理进行论证。科学家们要把这些事情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央和国务院设有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研究中心，作为国务院和中央财经小组的咨询顾问机构，集中了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负责对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经济政策和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论证。我省最近也聘请了我省农业方面的一些专家建立农业顾问组，负责对我省农业发展战略、商品粮基地建设及其他农业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省农业现代化实验基地县——海伦县委、县政府八〇年聘请农业专家成立了农业科学技术指导委员会，研究全县重大农业技术决策，当县委、县政府的技术参谋。各公社成立了技术指导站，大队成立技术组，小队设技术员，全县上下形成了由四千人组成的农业科技指挥体系，在农业靠科学中起到了很大

作用。但是，还有些领导干部由于“左”的影响和某些糊涂观念还没有彻底解决，在思想深处还没把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仍然轻视知识分子，忽视科技工作，不相信科技的力量，没有从根本上很好解决信科学、靠科学的问题。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这项工作很重视，专门发了中发十号文件。文件指出：“把是否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并取得成果，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和单位领导工作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最近，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关于贯彻中发〔1982〕10号文件，认真检查知识分子工作的安排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通过这次检查，进一步提高对知识分子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解决信任科学家、依靠科学家和重视科学家的问題，在新形势下重视贯彻执行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各级领导要响应耀邦同志提出的“向科学要本领，拜专家为老师”的号召，真正把靠科学的问题解决好。

第三，科技工作者要在科学热潮中大展宏图。科学热给广大科技人员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天地，我省经济建设的发展给我们广大科技人员提供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科技方针，我们科技工作者应该在如何使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作贡献，应当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科技人员要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要主动研究经济建设中各种问题，积极参加经济活动。今天在座的科学家中有很多的人，几年来在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国家和集体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象省克山农科所一直坚持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从生产实际出发，研究解决生产急需的关键技术问题，三十年来提供科研

成果二百二十五项，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有一百七十一项。近十年仅推广小麦、马铃薯、大豆三个作物优良品种就增产六十一亿七千余万元，折合人民币十亿七千二百二十四万元，为我省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我省科研战线上的一颗“明珠”。哈尔滨粮食研究所，研制成功的金菠汁，用一公斤豆粕原料，经科学泡制，可生产出成品七十瓶，可创造价值十元零五角，是一公斤豆粕价值的四十八倍，经过梯级开发一吨豆粕可以创造价值一万四千元，出口一吨却是六百五十元，只是科学开发价值的1/22。这证明，一旦把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在我省应该解决的突出课题是建设五个基地和解决“优势大、效益差”的问题。我省资源丰富，工农业基础比较好，劳力充足，科技力量较雄厚，交通发达，这是我省发展经济的优势。因此在扬长避短的基础上建设五大基地是我省生产建设的重点，但是，工农业生产流通等领域经济效益差又是我省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现实问题。一九八一年与历史最好水平一九六六年相比，我省地方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户数由九百三十六户增加到一千七百四十五户，增加了81.2%，工业总产值由四十点九亿元增加到八十亿元，增长了86.5%。税收当然有增加，但利润总额却由七点三九亿元减少到四点六亿元，下降37.7%（亏损总额由五千一百万元猛增到二万六千万元，增加了4.1倍），企业亏损面高达44.9%。这反映出调整任务仍然很大，还会有很多工作要作，我们一定要尽快解决“优势大、效益差”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搞好我省经济调整，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向合理的经济结构要效益；再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应用于企业改造，向科学技术要经济效益。这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我省长期以来以经营“原”字号产品为主（原粮、原豆、

原煤、原木、原油、原糖、原毛)。一次性加工，因此利润低、效益差。如果发挥我省加工优势，使这些原字号产品经过深度开发加工，扩大最终产品，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优势大、效益差”的矛盾。在农村科普工作，要推广多种经营农业技术，在城市工业技术改造，要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更新换代。总之城乡大力开展技术咨询技术协作等是当务之急。去年大面积推广万亩方田等活动，说明了科技工作的转变，今年要作更大成绩。

当然，做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工作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经济方面的困难以外，还会遇到各种阻力和习惯势力的束缚，需要我们化很大的力气去克服。比方，由于我们体制的不合理，科技人员参预经济生活的积极性就往往会受到“部门所有制”的限制和压抑；还有某些科技人员只重视基础研究，忽视应用研究和发展的倾向；还有政治思想工作不足，科技人员受错误思想干扰，也影响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耀邦同志在科学院会议上号召我们科学家要深入实际找课题，我们应该响应。科学家之所以是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具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不图虚名，不抱残守缺，我们希望科学界长期培育起来的这种作风能够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在座的科学家、学者们、各位科协委员们要能够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同时还要带领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深入思考我省经济建设实际问题，发挥科技作用，努力提高我省经济效益，为争取我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中科技进步的因素达到 $\frac{1}{3}$ 左右的任务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四，在科学热潮中，科协要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当好各级领导部门的参谋和顾问。

党中央在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

理党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这是党和人民对科协及其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的高度重视和极大信任。科协是党团结和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助手。它担负着动员和组织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建设，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同各国科学技术团体进行科学技术交流的任务。这是党给科协规定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几年来，科协在向科学进军中，在四化建设中，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科协的组织建设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学术活动日益频繁；科学普及广泛多样；科技咨询服务工作广泛开展；在智力开发，积极进行技术更新教育，专业培训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成绩应当充分肯定，并且要发扬光大。

耀邦同志在全国科协“二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联合组织，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组织”，是科技工作者之家、科学家之家。要创造一个浓厚的民主气氛，让科技人员到这个家能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一定要避免以政代群，以上压下。更不要“权威”定调，一家“独鸣”，甚至把共同的成果攫为己有。听说，有的医院、学校不允许科技人员参加学术活动、咨询服务和专业讲授，说这些都是不务正业，因而不给公出路费，扣发他们的奖金，这是十分错误的。科协做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科学家之家”，要了解情况，做好工作，帮助大家解决好这些问题。科协要注意发挥每个成员的作用，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鼓励大家深入生活实际，研究实际问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由乱到治，由贫变富的伟大变革

时代。耀邦同志说：“发展科学，发展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门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出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开发，科协在这一方面，一定要发挥它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交给我们的历史重担，我们要激发广大科技人员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爱国热忱，刻苦钻研，自强不息，为繁荣我省的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建设，提高经济效益，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贡献一切力量！

（本文是作者1982年5月8日在省科协二届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加强科技情报工作 为经济发展服务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赵紫阳同志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搞现代化，振兴经济，翻两番，一定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不靠科学技术进步“翻两番”的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就有实现的把握。他这个话讲的非常辩证的。他说我们实现翻两番的条件具备不具备呢？他说，有些方面可以说是具备的，有些情况可以说是不具备的。如果按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按我们现有的能源状况和我们发展的可能性，要是死扣这个账，就是条件并不具备，翻一番差不多，翻两番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要是把立足点放在现在这样的科学技术状况，而是放在一个先进的，不断革新的，引进推广新技术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条件就是具备的。这就把科学技术的因素，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上。十二大文件说，要“力争”翻两番。“力争”，首先就包括科学技术进步。因此，在我们

今后抓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翻番的时候，首先要抓科学技术，要靠科学技术来翻两番。咱们省里不是讲嘛，依靠科学技术的因素，要争取占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头十年三分之一，后十年力争达到二分之一。现在一般国家里，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都占60—70%，70—80%，等等不一。科技情报工作是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科技情报。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不了解情况，怎么打仗呢？打仗是如此，搞经济建设也是如此。搞经济建设，要追赶先进水平，你不了解先进水平，你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赶超先进水平，那你就根本无处着手。科技情报工作包括什么呢？战略性的，战术性的，很多是属于资料工作。资料，就是这一个行业，这一个方面，这一个产品，这一个系统的历史、发展、现状，这个信息是带比较性的，有它的动态，发展趋势，发展的可能。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很复杂的、专门的学问，它是非常博、非常广的。中国有句话叫博大精深。又宽，又广，还要细，还要深。资料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一个科研的前提，科研的基础。

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对科技情报有重大的评价。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情报，象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是国家的资源。准确而有用的情报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就如同氧气对于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那样必要。目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都与情报活动有关。”

苏联有一篇题为“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进程的管理”的文章中，从另一个角度讲：“管理机关对于系统化情报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就象工厂需要动力、原料、金属、燃料、半成品等一样。有效地利用情报并善于分析情报，这种本领已成为现代领导人不可缺少的职业本质……。”苏联是指令

性比较大的国家，也是非常重视情报的。

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也曾说过，“日本有三大骄傲，其中之一是在12小时内就能知道全世界的最新科技消息，日本人抓科技情报工作是无孔不入。它的各个行业，各个资本家，跨国公司更不要说了，它的情报人员像“苍蝇”一样。它用最新的技术处理情报，专门搜集西方科技发展和市场动向方面的情报。大家知道，有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很快，他们靠的是什么呢？他们很大一部分就靠情报工作，把人家的东西了解过来，很快变成自己的。有的人把他们的经验概括为“一抢二偷三买”。“一抢”就是掠夺人家的资源，人家的资本；另外也到处掠夺人家的情报，而“二偷三买”都是与情报有关系。派驻各国大批情报人员，留学人员，参观考察人员等去偷，偷不来的技术就买。千方百计弄情报。它从美国买到缝纫机，汽车的技术，做出产品再向美国倾销。

无论是美国、苏联、日本，以及其它国家，对情报工作都极为重视。苏联到处抓情报，现在，美国特别控制苏联和日本，控制大型集成电路，进行国际上竞争。美国人现在就在电子计算机上卡我们，尤其在重大元器件上卡。所以，谁掌握的情报多，谁就有发言权，谁就能加强它的科学技术发展。所以，科技情报也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矿物、植物、动物，水等自然资源是第一资源，而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知识、经验等情报信息也是一种资源，也应该很好的开发利用，这是第二资源，是在自然资源基础上加工的一种知识资源，智力资源。

国外还把科技情报工作看成是发展生产最经济的手段，发展现代化生产，解决现代化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现在世界上交往很多，现代的通讯技术非常发达，当代的科学技术是在现有的条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可能一个国家都去

从头开始，像我们搞什么东西都从头、从零开始，那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很难再重复这段历史，正像小平同志说的：过去我们有个“拿来主义”，这个主义并不坏。世界上凡是不蠢的人都会搞这个主义。鲁迅也讲拿来主义。我们国家落后，和先进的比有差距，差，我们就学吧，好多东西就可以拿过来直接利用，科学技术这东西，可以拿来直接就用。我们要采取“拿来主义”，也就是说，千方百计的把别人的先进技术拿来供我们用。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节省许多人力和物力。这种“拿来主义”首先就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得先把情报弄来，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把技术变成我们的生产实际。过去，搞闭关锁国政策是不对的，而与外国经济交往中完全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那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只有走少量引进设备，大量引进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情报工作的作用，这才是一条最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路子。正像有人说的“买来的设备是昂贵的，科研成果是高价，只有科技情报才是最便宜的。”这个时期，我们也感觉到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搞了很多的来往，日本人有他们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作生意，要把技术拿来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这就难了，作一次生意很难，三年五年也是它，搞科技往来是最快的。这几年我们也摸到经验了，搞科技交流最得利，花钱不多，他们带些材料和样本来，我们去买点材料和样本，回来我们就用上了。科学技术往来，比作生意容易得多，搞点信息，搞点科技性交流就比较容易。许多事实证明，花很少的钱搞来情报，往往得到的经济效果却是几十倍，几百倍，而且还能赢得宝贵的时间。美国有人统计过八万名化学家的时间分配情况，发现他们平均要用三分之一的科研时间查找文献，搞情报工作，情报工作很重要，我们就要

组织这个工作。现在我们组织得还不好。订外国报刊，没有那么多的钱，还要外汇，搞来之后，有的就躺在图书馆，资料室里不起作用。别人想看捞不着，他们自己还没时间看。还需我们作很多组织工作。将来要形成情报中心。情报要处理。有了材料不等于使用，真正能到专家手里使用还有一套服务和消化工作：编辑、摘要、目录、索引，外文还要翻译，还要交换等等。一个科学家搞科研需要看很多的书和很多的材料，才能完成他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

我们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各级领导作出自己的决策，领导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很需要情报。这方面，我们自己都有深刻地体会，你要决策就要弄清情况，过去讲‘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这是搞瞎指挥，犯主观主义。什么原因？就是情况不明，就下决心了，一板子拍下去了，心里还没有数，“办法多”都是鬼名堂，总是吃亏上当的东西。过去我们是拍脑袋下决心，不是搞可行性研究，结果吃了不少亏。今后我们各级领导班子里遇到的都是专业问题，我们领导班子也需要专业化，知识化，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必须符合科学性，减少盲目性，都必须进行科学论证和可行性研究。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教训，有些重大决策的失误，就是和没有正确可靠的情报有极大的关系。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子时代，就是所谓信息时代。人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各种信息，各种情报。最近报纸上提倡人工智能，就是人的智慧，智力，加上现代科学装备，把人的智力武装起来。过去是大脑加算盘，现在是大脑加计算机。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各种信息，各种情报的处理，出现了不少从事情报（知识）生产的部门，为社会上各种情报需求者提供多方面的服

务。诸如：旅游情报，专利情报，市场动向等等。现在我们提倡搞社会化的生产，面向市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十亿人口的国内市场就够我们测一阵子的了，何况还有那么大的国外市场。总之，情报、信息、知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了。一般的规律是，一个国家经济生产越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也越大，科技情报工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我们国家自从1956年建立科技情报机构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科技情报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务院各专业部都有自己的情报研究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情报研究所，甚至省属的地、市、县也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此外还有全国性的、地区性的纵横交错的情报网。现在全国已经有专职科技情报人员五万多人，这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但照十亿人口来比还很不够。近几年来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国家科委的直接领导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今年第一季度，国家科委向赵紫阳同志汇报工作时，赵紫阳说：“你们科委情报工作要加强，很多部门都很感兴趣，都想要情报所，情报所不能动，归科委，科委要加强情报工作”。这说明科技情报工作已经越来越被更多人所了解，情报工作的社会功能也被更多人所承认。特别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今天，要求科技情报工作服务的范围也必须随之扩大，要求科技情报工作的内容、方法、手段等也要不断地增多。这就要求科技情报工作不但要为科技、经济发展服务，而且也要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服务，要使科技情报工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去。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搞科技情报，而且也要搞和科技有关的经济情报、技术经济情报、经营管理情报、和各种预测情报等等。这就越来越复杂了，情报工作本身也成了专门

的学问，也要搞好多的重要建设。过去搞情报工作坐在家里等，就是翻一翻人家的报刊，或者搞点材料和人家交换，仅有这些很不够了。

近年来，特别是这一、二年，省科技情报所做了不少工作，对推动全省生产和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九八二年只花了一万六千元钱，为我省引进了国外消费样品四百多项，据初步匡算，引进之后，每年可为国家创造产值达三千多万元。国外有许多小商品咱们不知道，你引进大家一看，这我能做，那我也能做，大家回去生产，就出了不少新的商品品种，这样一来市场就充实了，人民的生活就方便了，青年就业了，生产发展了。科技情报工作直接创造的价值是很大的。引进国外消费品样品汇报展览，让人们看到了科技情报转化为生产力的实例，看到了科技情报工作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围绕经济发展战略开展的国外食品工业发展现状和农村多种经营等项目的专题研究，为全省的食品科技讨论会，农村多种经营会提供了许多情报资料，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方面我们确实是大有可为的。此外，为哈尔滨理发工具厂引进的英国电剃子，仅这一项产品八二年一年就为该厂增加利润二十四万元。佳木斯市情报所从外地引进了纺织厂用的清纱器救活了佳木斯电子元件厂。东宁县搞多种经营，引进了木耳，使全县每年人均增加收入16—18元，引种人参的收入更可观，占全县多种经营总收入的20.9%。可见情报工作的重要，也看到情报工作的成绩。这个成绩不仅有大城市的，省一级的，而且还有地市一级和县一级的。情报工作是一种应该得到人们承认的生产力，是一种应该开发的资源。我们情报供应的是不少，但是按我们需要讲还差得很多。经济起飞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经济起飞应该像雨后春笋一样，兴起许多中小型企业。我们的工业远

没有发展起来，关键还是个技术问题。市场过去是卖方市场，现在有点买方市场了。这就需研究市场，研究人们的新需要，改进产品质量，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情报部门技术指导。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有很成绩的，但按经济振兴，市场的繁荣，进一步改善人们生活还差得很远。情报是生产力，应该积极开发这一资源。奖励一批科技情报成果是完全应该的。

现在我们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特别是十二大胡耀邦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号召我们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总的奋斗目标，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如何开创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到二〇〇〇年我们省的工农业年总产值不但可以翻两番——即是由八〇年的337.6亿元达到二〇〇〇年的1,350亿元，而且我们还可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力争二〇〇〇年达到1,500亿元。也就是说到二〇〇〇年力争工农业年总产值达到每年人均均为1,900元左右。为了完成这个总目标，提出了七个战略重点：全国提出了农业、能源、交通、科教几个重点，我省提出了①农业②食品、轻纺③能源、化工④木材综合利用⑤调整重工业服务方向⑥交通运输⑦广泛进行智力开发，抓好科技、教育。省里提出重点也是我们科技工作的重点，也应该成为我们科技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要把国内、外的情况及时传播、收集、整理，提供决策参考。

我们要紧紧围绕省里提出的总目标和战略重点，多提供一些适用的情报资料。

目前是不是应该搜集和提供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的情报资料，这里许多是属于战略性的：

1. 国内、外关于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过去我们搞工业只追求产值，不注意效益，或者只追求产量，不追求效益。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有经验了，现在注意了提高经济效益。十二大提出的翻番任务，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要想完成翻番的任务，提高经济效益是关键、是前提。怎样提高经济效益？国外都有一些成熟的经验，我们需要把它加以整理提炼，供我们借鉴。比如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得较好，日本对企业管理是很重视的，搞了好多企业管理的经验，特别是这一段。苏联的企业技术改造工作也有成绩，据说苏联最近搞了二十年综合发展计划也很好，特别是最近搞了一个二十年食品发展纲要。总之，国外在提高经济效益，加强计划管理等方面比较好的经验（也包括教训），比较适合于我国情况的，应该多多提供。当然，国内这方面好的经验也要多介绍。

2. 国内外关于农业增产和荒地、沼泽地开发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关于改造草原、饲养牛羊和植造人工林方面的经验。

我省的大农业怎样翻番？1981年全省的粮、豆、薯，总产量还不到三百亿斤，计划到二〇〇〇年总产量达到450亿斤，争取达到500亿斤。要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要进行农业现代化综合试验，要开发三江平原，要开垦我省250万亩荒地，要抓提高粮食单产等问题，还要提高全省人民的营养水平，解决肉和乳的供应问题，要大量繁殖牛、羊，这就要解决牛羊的牧草及饲料问题，我们还要造2,000万亩的人工林，争取达到7,000万亩。因此就十分需要农业增产、荒地和沼泽地开发利用，以及饲养牛、羊，造林等多方面的农业现代化情报。

3. 围绕食品、轻纺、木材综合利用等搜集和提供情报

资料。

要根据我省资源特点，搜集和提供国内外糖、乳、豆、薯、麻、毛、丝、化等深度加工和木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经验。

4. 国内外开发新能源和节约能源方面的情报资料。

特别是节煤和煤炭利用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积极介绍关于国内外建设水力、火力、核动力电站及节约电力等方面的经验。还有利用风能、太阳能、沼气等方面的情报。

5. 国内外交通、运输方面的情报。

我们省要进一步发展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需要借鉴国内外搞好交通运输方面的经验。总之，这些方面都是敞着口的，需要情报部门提供资料，供领导部门决策。

为了搞好情报工作，我们要搞好自身建设，把全省的科技情报系统建设好。

摆在我们全省科技人员面前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同时也是很光荣的。要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必须得有过硬的本领才行。因此，我们要努力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当前主要是学好十二大文件，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此外，还要学习好各种有关的专业知识，科技知识；要学好中文和外文，学好搞情报工作的业务理论，要象中国女排一样苦练基本功。总之，要练好本领，要搞好情报干部的培训，搞好智力储备和智力投资。科技情报人员是传递知识的，知识有个老化问题。据说在七十年代的老化周期是十年左右，到了八十年代，老化周期可能会更短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七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工作十年后，他原来所学的知识大部分就有些落后了。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地、多方面地学习新的知识，因此我们都有一个需要重新学习的问题。现在的科学是个日新月异，都要随时注意各方面的形势变化和知识方面的发

展。

除了搞好自身建设外，还要搞好全省科技情报系统的建设。搞好情报工作就得有一个畅通的情报渠道，要把全省的各级专业和综合性情报机构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上下左右、融会贯通的十分灵敏的情报系统。

关于建设全省科技情报系统，我想有这样两个问题需要提一下。

①是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以省科技情报研究所为中心的全省科技情报中心。

省科技情报所本身就是全省的科技情报资料中心。我们情报所有了一定的条件，有了个象样的大楼，有了些现代化的设备和各种科技文献资料。但是现在还很不完备，很不完善，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省情报中心。这是我们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

省科技情报中心应该既是一个科技情报的咨询研究机构，又是一个科技文献的储存和服务中心。既要为全省广大的生产、科技人员储备足够的精神食粮——各种科技文献，又要为各级领导进行重大技术决策提供所需的基本的分析研究情报，回答各种重大的科技发展问题，它应该成为省里领导决策科学技术问题的“情报参谋部”。

建立这样的情报中心，单靠省情报研究所现有的人员和条件是不够的。人员、设备和文献资料也都需要适当地增加，现有人员的水平也需不断地提高。

②是全省各级情报机构也都需要加强和完善。

这里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据说全省很多专职科技情报人员中有不少是新参加这个工作的，情报队伍还不够稳定，一部分同志不安心于情报工作。这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有的单位不大

重视科技情报人员，不把科技情报人员看成科研人员，不按科技人员待遇给科技情报人员晋级，评定技术职称，这是很不对的。情报工作是科研工作的一部分，情报人员也是科研人员。有的情报成果虽然不象科研成果那样具体，但情报成果往往是具有更大的潜在社会效果。情报人员都是知识和情报的“二传手”。情报人员是为大家服务的、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因此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劳动，重视情报工作。

第二是经费问题，各地情报机构的经费除靠省里补助外，主要应该由地方自行解决。情报工作是一种投资少、收益大的工作，各地要舍得拿出一部分钱开展科技情报工作。哈、齐、牡、佳等市的情报部门引进国外新样品，增加消费品品种，活跃了市场，甚至还救活了一些企业。证明情报工作是大有可为的，在情报工作上投一点资还是合算的。我们领导同志一定要往前看，往远处看。有的可能目前看不到效果，将来会见效益，自己得不到效益，别人会得到效益，它对社会、对生产、对科技发展是有很大大促进作用的，我们要大力支持这个工作。

（本文是作者1982年11月3日在全省第五次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附 录

黑龙江省经济学会 第一次经济理论座谈会纪要

四月二十六日，黑龙江省经济学会在省委书记、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剑白同志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经济理论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省计委、省财贸办、省统计局、省物价局、省工商局、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尔滨建工学院、东北农学院和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从事经济工作、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二十一名同志。座谈会本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联系我国我省经济发展的实际，针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记录，我们将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进行了整理。这些意见都是初步的带有探索性的意见，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几个问题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过去，由于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思想和供给制思想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一谈到价值规律就被认为是离修正主义不远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思想有两个武器：一个是“重本抑末”，

或者叫“重农抑工”、“重农抑商”，重农学派在中国一直占主流；另一个叫做“崇俭黜奢”，就是鄙薄物质利益，主张按身份等级分配，少数人的特权加多数人的饥饿平均主义，主张人和人之间的直接支配和隶属，反对商品货币关系，主张安贫乐道。晋朝有个士大夫叫王衍，他以“口不言钱”标榜清高。这种宗法制的封建主义思想，却往往披上了一件薄薄的社会主义外衣出现在理论的宣传中。经济管理中的供给制思想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平均主义；一个是民主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根据地的供给制（类似军事共产主义）措施；再一个是曾经很流行的“半商品生产思想”，主张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只能统配调拨，并且产生了一整套制度和办法，譬如财政上统收统支、粮食上统购统销、物资管理上统配调拨、商业上统购包销等等，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并把这一套认为是真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要从自然经济思想、供给制关系中解放出来。什么是社会主义？只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项确定下来，其它的都可以研究，不能把“一平二调三统”都算做是社会主义。

（二）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人类社会到现在只存在过两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形式和商品经济形式。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形式。计划经济能不能算做一种经济形式呢？对这个问题有争论。但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商品经济形式的社会。要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就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生产社会化就要商品化，没有社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商品化，也就没有社会化。计划经济应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使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三）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形式，反映商品货

币关系的经济范畴、商品货币经济的客观规律的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和起作用。马克思从商品生产开始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做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商品经济将不复存在，当时把商品经济的范畴作为特殊概念来对待，今天看来，实际上商品经济的一些经济范畴是一般概念，是仍然存在的。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但不能走向反面，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我们指出价值规律在私有制条件下自发起作用的后果，不能认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就不相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

（四）过去习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在全民所有制内部，没有不同的所有者，没有所有权的转让，所以，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现在看来，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个在理论上被弄糊涂了的问题，在现实生活里是很清楚的。我们不只把拖拉机等主要农用生产资料卖给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就是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从物质部门到生产部门，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产品的转移都是通过核算、计价，事实上是做为商品来对待的。社会上有分工就有交换、就有商品生产，社会生产越发展分工越细，商品交换是解决分工协作最灵活的方式，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只理解为归谁所有的所属问题。所有制是个广泛的概念，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所有制是由所有权、占有权、管理支配权、使用权、让渡权、物质利益索取权综合形成的。过去的习惯认识，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是从对所有权的机械理解出发的，这也就否定了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权。其实，只要是为了交换，为了通过交换来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都是商品生产，而不必区分买卖双方，是属于不同的所有制，还是属于不同的独立经济

核算单位。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在市场上买卖产品，产品因此变成了商品，在我们当前的经济水平下，生产资料当然是商品。

（五）过去习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不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起这种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制订计划可以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现在，如果我们确认，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都是商品，那我们的计划经济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就应该承认价值规律对整个社会生产起调节作用，我们的计划工作就要以价值规律为依据，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自发地起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要求，通过计划自觉地进行调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是统一的。

（六）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计划经济也有其不灵活之处，由于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计划不符合规律的情况会经常发生。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把整个社会的所有产品及其供求关系上的一切变化，都无所不包地列入计划之内，这是做不到的。这就需要有比较灵活的方式来补充，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可择优选购，机动性强，适应性强，更适合于每个人选取，来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更适合于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安排和改变生产，这正是商品货币关系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对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其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要通过计划来调节，在适应价值规律要求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除此之外，对社会生产的另一部分，则应通过市场来调节，让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改变过去“大一统”的局面。过去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全统”起来，统不了，也统不起，反而把什么都统死了。

（七）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计划调节的同时实行市

场调节，会不会出现竞争？会不会出现象资本主义社会的盲目竞争？商品经济和竞争是分不开的，竞争是客观存在。所有制不同，竞争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做为客观的经济规律，竞争是存在和起作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择优选购的问题，达尔文叫自然淘汰，我们叫择优录取。在私有制基础上，竞争会引起分化破产。在公有制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有竞争，对改进质量、增加生产、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是有好处的。哪些产品允许参与竞争，哪些不允许参与，要慎重考虑。对没有竞争能力的，要调整，要妥善安排。

（八）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就要讲究核算，降低成本，增加盈利。不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就不讲核算，产品质次价高，遭受规律的惩罚，付出学费。我省五小工业，除小煤窑外全赔钱，主要是由于它们的劳动生产率低，产品成本高于同行业的大、中厂。大型化肥厂生产硫酸铵每吨成本二百元左右，售价三百五十元，国家可得一百五十元利润，投产一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而小型化肥厂的吨成本，甚至超过国家规定的售价。当前有些行业生产能力超过现实需要，主管部门在安排生产计划时，往往不是择优安排，而是大厂、小厂、好厂、次厂全照顾到，象撒芝麻盐似的平均分配任务。这就造成大厂、好厂吃不饱，生产能力过剩，形不成生产线，不利于降低成本，小厂次厂却以比较高的成本生产同样产品，从而使整个产品的成本降不下来。

（九）农村集市贸易和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是农副产品中一小部分的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许多事例说明，对这部分产品，用行政办法限制是限制不住的。限制过死会转入地下，形成黑市，抬高价格。各地在贯彻省44号文件之后，注意用经济办法管理好集市贸易和农副产品市

场，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由买卖双方评议价格，上市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所增加，许多品种价格回落，有些已接近或低于国营牌价。这个市场活跃了城乡经济生活，促进了生产，增加了社员收入，可见，利用价值规律在这里的调节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好处的。

（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主要就是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充分利用价值杠杆的作用。为此，财经管理体制要做相应的改革，企业的独立自主权要适当扩大，并且要加强信贷关系，发展租赁关系。譬如，可以考虑由企业自负盈亏，实行平均资金利润率，基建投资改由银行贷款，企业占用的固定资产拿占用费，流动资金拿利息，土地交地租，级差收益以税金形式交给国家，暂时闲置不用的机器设备可以租给其它企业，工资和生产成果直接挂钩，奖金、福利费用从企业利润里出，如此等等。使企业和企业的管理人员、劳动者，都积极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发挥主动精神，促进生产发展。

二、关于物价的几个问题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按着价值规律的要求，我省制定了调价方案，一经批准，到时执行。

目前人们都十分关心市场的物价问题。这次物价调整面宽，加上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和农村集市贸易，估计市场价格变动是不小的。人们担心调整品种这么多，各种商品会发生连锁反映。有人说“风吹水面层层浪”、浪头不小。尽

管中央对稳定物价已经做了有关规定，目前，由于我们的工、农、商业都在整顿，林彪、“四人帮”长期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还正在调整过程中，不利于物价稳定的因素，还没有完全克服，特别是客观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研究价值规律在计划、生产和市场上怎么表现的，人们是个什么观点，如何正确反映这个规律，以便采取正确的政策，解决理论和实际上提出的问题，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增强预见性、克服被动性，这也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学习与探索，弄懂弄通了，我们就明白点，否则就糊涂些。

（二）我们要正确理解利用价值规律，合理调整物价与稳定物价的辩证关系。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整个国民经济是不断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运动过程。物价也是从稳定、变动，又到新的稳定的运动过程。我党一直实行稳定物价的方针。但并不否认，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对一些商品价格作合理调整。经过一定时期，调整价格，是正常现象。事实上，我国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物价指数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四。这是价值规律客观作用的结果。认识掌握了这个规律，就会主动自觉有计划的调价，否则就被动的自发地调节。我们说稳定物价是指基本生活必需品或主要商品的销价，坚决保持稳定，次要商品可以有升有降，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有浮动，它可以促进产品质量提高，品种改进，成本降低，提高商品竞争能力。

（三）物价是个大问题，调整物价首先要安排工农业两大类产品之间的合理比价。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根据其价值决定的。过去对农产品的成本没有很好计算，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这就违背了价值规律。同时也要注意各类商品内部的不同品种的合理比价，有的商品价格长期在其价值之上，

如短线商品，有的商品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如有的长线商品。这都不利于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虽然有可能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实行计划价格，但计划要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基础上，离开了价值规律，主观“计划”规定商品的价格，是违背价值规律的，要受到它的惩罚，要交学费，以亏损为代价。

这里提出了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问题。计划必须利用价值规律。计划工作与各种不同产品发生关系，并把不同部门的产品进行对比，或计算出作为生产基金基础的各种不同产品的总额与作为消费基金基础的其他部门的产品总额作对比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可能的，并由实际生产条件所决定的，计算社会劳动和社会产品的科学方法。而经济计划的内容又离不开社会劳动和社会产品。所以计划必须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以价值规律为依据（还有其它经济规律）。

（四）在商品生产中，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而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个别企业，生产布局不合理，产供销距离远近不考虑，致使产品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要求按自己产品消耗，提高产品出厂价格，这完全违背价值规律。按社会价值决定的价格出售，严重亏损，由财政补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商品的价值其中包括生产该商品所消费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部分。如果企业充分发挥设备能力，同一时间生产出更多产品，平均到每个产品中的这部分价值就少，从而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相应全部或大部分产品都由这样企业生产，产品的价值降下来，价格也会降落。目前我省有的部门生产设备的能力大于生产任务，原材料供应不足，甚至国家重点企业吃不饱，不能搞流水作业。生产同种产品，任务来了大家分，原料不足都摊点，最后谁也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

产品成本降不下来，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违犯了价值规律。结果还是企业亏损，国家补贴，交学费、出代价。

价格合理，正确地体现价值，有利于生产。价格远远背离价值，不利于生产，甚至没有国家扶植，可能破产。我省生产的铁锅所用的生铁，成本价格本该八百元一吨，作成铸件可以按价值出售，作成铁锅要按三百五十元出售，这叫“政策性亏损”。锅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不能涨价，要按“计划价格”出售。这说明政策性亏损是允许的，但不是无限度的，“计划价格”竟不及成本价格的一半，这种“计划”符不符合价值规律要求？价格只能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波动的幅度不能太大，更不能离开价值。价格长期脱离价值，生产就会成问题。有人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这里，企业亏本，不致破产，有国家补贴。设想全国企业都按这种“计划价格”出售产品，国家用什么去补贴？

当前应当大力发展社队企业，要多方扶持，还要认真总结经验，目前有的社队企业生产的砖“核桃酥”质次价高，无人买，积压很多。怎么支持社队企业发展？值得研究。

（五）在流通中，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自发调节价格，或通过正确的计划价格来调节消费。这是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里的调节作用。用行政手段控制价格和按价值规律办事，做法不同，结果两样。

过去，工商部门对集市贸易规定价格：不得超过国营牌价的百分之三十，结果价格越管越高。后来，省下达四十四号文件，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让买卖双方议价成交，结果商品价格回落。有的甚至降到国营牌价以下，如黄烟和粉条。

市场商品由于季节影响，有季节差价。春节期间鸡蛋需求量大，产蛋量少，价格达一元六、七角一斤；三月份春节

已过，又是产蛋季节，每斤回落到一元四、五角钱。

“四人帮”横行时期，曾因政策界限不清，对集市贸易管得过严过死，打击面过宽，商品价格反倒上涨起来，如巴彦县某个生产队土质适宜生产毛葱，一度不准生产、上市，实际由明转暗，非但没管住，价格上涨，原来每斤一角五，管死的结果，涨到七角一斤。所以集市贸易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有人哄抬物价，搞投机倒把，获得暴利，要严厉取缔，予以打击。

国营商业出售的商品，也受供求影响。由于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有关部门不注意研究市场与消费倾向。人们大都喜欢买毛衣毛裤，而大量生产秋衣秋裤，出现库存积压增加，受欢迎的皮鞋供不应求，胶鞋积压。不得不削价处理，给国家造成损失。过去半导体收音机价格高，销量少，库存大，产品成本下降，价格回落后，库存下降，销售很快。

(六) 物价问题关系到国家财政、市场和人民生活，也关系到安定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这就要我们必须做好物价管理工作，特别要狠抓稳定物价的工作。为了稳定市场价格，保证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主要抓好以下几点：

①凡有文件规定销价一律不动的商品，要坚决执行现行的销售价格；

②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般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原料价格提高，成本增加的部分，首先从降低成本，降低费用，减少流转环节，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狠下功夫；国家规定减免税收的，要按规定执行。减少了利润而且税率较高，可适当减少税金，使企业正常经营，保本微利；利润大的企业要适当压缩原有利润抵消原材料提价影响；差价偏宽的要适当缩小。由原材料提价影响出厂价相应提高，销价不

变，减少商业利润；原材料提价后，出厂价格相应提高，减少商业利润解决不了的，扩大经营部门的补贴。通过这些措施，力争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不提或少提。

③适当提高销价。小宗农副产品，一般日用消费品，必须提价的，要把提价商品和降价商品结合起来进行，要有升有降，力求作到降价略大于提价。但不能降价过多，因为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基本生活必需品销价保持稳定，小宗商品一定要根据产销情况的变动，作有升有降的调整，使物价总水平不发生大的变动。要所有商品价格固定起来，不符合价值规律，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没有好处。

④经常做好物价的检查和调整工作。把整顿物价和调整物价结合起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严禁随意提价，变相涨价。严禁用提价的办法来扭亏增盈；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严重违法乱纪的，要抓典型，经党委批准，严肃处理；要严肃物价纪律，加强物价方面的法制观念，要保护合乎政策的价格，取缔违犯政策的部分。

（七）建立科学的物价体系。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价格体系也要有必要改革。回顾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我国的物价体系，主要是“计划价格”。“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这样提法，值得研究。

社会主义的商品的价格，还有历史因素。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后来发展到生产价格阶段，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相联系。帝国主义阶段发生垄断、出现垄断价格、超额利润，但实际社会上垄断价格与生产价格并存，超额利润与平均利润并存。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还起作用。我们就是要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价格体系。

（1）原始价格。即以中等水平的商品价值、成本价作

为价格的基础；

（2）波动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波幅有限，（垄断价格波动大得多，但也有限度）这个限度，也是计划价格的依据；

（3）计划价格。国家按计划经济的任务，根据前两种价格，来调整制定计划价格。

（4）生产价格。即按成本加平均利润率计算出来的价格。

以上四种价格，要考虑到环比和定比可以编制八套；考虑差价和比价，可编制十六套；考虑历史和现实的价格变化，可编制三十二套；再加上中国和世界的价格比较，可编制出六十四套价格来。这个价格体系，可能是繁琐的，但是精确、科学。

编制这样的价格体系是很困难的，因为价格是在千百万次的交换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人工计算出来的，它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累进的基数。

三、研究和探讨的其他几个问题

（一）关于生产关系问题

一般所说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二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三是指人们的分配关系。斯大林和毛主席都说过有三个方面，马克思也提过，列宁提划分阶级时大体也是这三条。斯大林和毛主席是有根据的，都是从不同情况和角度讲的。从实践上看，应该恢复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即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的总和。现在谈生产关系时丢掉了交换和消费，丢掉了流通环节，对流通领域里的生产关系不讲了，因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把它简单地认为是物资调拨关系。第一，不讲交

换，现在流通领域里的问题最多。仅钢材一项全国积压一千五百四十万吨，大体上相当全国一年的产量。一方面积压，另一方面又短缺，影响生产。这与重视不重视生产关系中的交换，关系很大。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本来就很难分开，流通过程对生产有反作用，由于不讲交换关系、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反过来就必然影响生产；第二，不讲消费，无消费关系概念，这就等于不讲生产目的了。这又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没把消费纳入生产关系的概念，对消费资料中的发展资料不讲了、科学智力的投资不讲了，这样劳动力再生产，怎能后来者居上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生产为消费创造物质当作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创造需要当作内在的对象、目的。如果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如果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因此，在讲生产关系时，不能不讲消费，第三，讲生产关系时，脱离生产力，还批“唯生产力论”，“四人帮”是太可恨了。把生产关系的改革，只孤立地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的变革，如搞“穷过渡”等等。

由于讲生产关系时，不讲交换和消费，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少问题。因此，恢复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总和的观点很有必要。

（二）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两个系列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由于商品有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所以形成两个规律系列。

一个是价值规律系列：价值、价格、资金、成本、利润、平均利润、财政、信贷、工资、奖金、经济核算等经济范畴为价值规律系列。

一个是使用价值范畴系列，这个系列主要是按比例规律系列，（但有不少的比例关系也属价值系列）有计划和按比例是两码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有计划是按比例的反映与要求，是否是客观经济规律，得进行探讨。计划要正确反映比例，比例是计划的基础。按比例规律要求发展国民经济要有适当的客观比例关系。比例关系主要有：生产和建设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农业内部的比例、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如钢铁和矿山、动力的比例、加工与原料动力之间比例等）物资和外贸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等，要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比例关系。由于各种原因破坏了适当的比例关系，就会造成比例“失调”，就需要调整。

（三）关于按比例规律问题

发展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只有按比例才能高速度。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都不能搞绝对化了。如果钢铁发展快了，其他跟不上，不适应，不成比例，就会比例失调，不但不会有高速度，还会影响速度。国民经济内部农轻重要有适当的比例。以我省为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轻重的比例约为：农业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工业百分之六十点六，在工业中，轻工业百分之四十点二，重工业百分之五十九点八，比例比较适当。去年我省农轻重的比例约为：农业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工业百分之七十七点一，在工业中，轻工业百分之二十九点六，重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点四。重工业占比重较大些了。根据历年来经验和我省具体情况，农轻重比例为3:3:4比较合适，有利高速度发展经济。重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也要有适当的比例。如发展重工业，只发展加工工业，不注意发展燃料、动力和原料工业，就会使加工工业成为“无米之炊”，当前各地电力不足就是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以

什么为纲不能绝对化了，要按比例，就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同时，为了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还要注意发展那些投资少，见效快的经济部门，轻工业部门有个报告说：“以轻养重，以短养长”，要注意发展来钱快，为四个现代化积累和换回外汇多和快的经济部门。

（四）关于对计量经济学、统计和计算工作的认识

过去我国对经济学研究的不够，对计量经济学更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一直把计量经济学当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来批判。经济学离不开科学的计算，加强对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很有必要。

现在我们统计工作中有的统计数字不准确，不真实。这与我们对统计工作重视程度有关。应该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工作不但能反映生产，在一定意义上讲还能指挥生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簿计”工作，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统计工作，用了相当多的人力做这项工作。由于受自然经济思想影响，（还有手工业思想，手工业木匠中流行有：“差一尺，将就使，差一寸，不用问。”）我们的经济工作中还缺乏精确的计算、科学的比较，以致给经济工作带来损失。西德一个大资本家，要进口一台价值一百万元的龙门刨床，他找人计算了一年半，从各方面进行计算和比较，认为合适才决定进口，进口后果然赚钱。我们进口设备和搞经济工作，也必须有准确的统计、精确的计算、科学的比较，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五）关于基本经济规律

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过去教科书中只解释使用价值方面，没有讲价值概念。因为斯大林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承认在生产领域内价值规律

起调节作用，但从实践上看，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是说不通的。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可以算作商品，那么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中不仅要有使用价值的概念，还应该有价值的概念。

（六）关于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指标问题

现行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对企业占用国家资金一项没有考核。企业可以无偿占用国家资金，核定的企业流动资金不交利息，这不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有的企业虽然八项指标完成的很好，但资金占用的数字也相当可观。因此，在考核企业的经济成果时还要考察资金占用情况、利用情况。企业不能无偿占用国家资金，应负一定的经济责任。

（七）关于奖金问题

奖金问题很重要。现行的奖金按工资总额提取，从理论上讲，应按利润多少提取奖金。可是，利润是否是衡量企业经营好坏和经济成果的综合指标唯一标准呢？例如，同样是燃料工业的石油工业和煤炭工业，从总的看，煤炭工人并不比石油工人劳动强度小，但石油工业利润很大，煤炭工业还有亏损。这又涉及到调整价格问题。现行价格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既然现行价格不合理，就需要进行改革。怎样改革？石油价格就是较高，国内国外都如此，国家主要靠石油积累资金和换回外汇，石油不能降价。那么，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怎样把按利润提取奖金问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际中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原载1979年14期《学习与探索》

